

韶關文史資料

第四十四輯

風雨三十年

姚良宗 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韶关市委员会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二〇一六年八月

《韶关文史资料》编委会

顾 问：李石保 贝抗胜 兰 茵 陶学权

主 编：沈妙光

副主编：杨 溯 孔庆红 黎阳升 肖南贵 宋良锋

编 委：丁兆鹏 王焰安 刘 东 刘 杨 刘素云

刘新强 冯国辉 何 露 李飞燕 李良生

李步德 吴 斌 邱韶东 罗 炆 罗楚忠

陈忠旭 张娣英 张嘉异 郑红双 曾令成

黄世平 黄明奇 彭晓虹 董书俊 王心钢

车万里 刘炎生 刘照丁 吴达明

编 辑：陈 军

编者的话

本辑为姚良宗同志的个人回忆录。回忆录中所述经历，主要集中在上世纪的1950至1980年，即新中国建立后的前三十年间。

姚良宗同志是1950年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参加革命工作后，长期从事粤北地区党政部门的秘书工作，其工作的范围又主要集中在农村方面，经历了“土改”、“镇反”、“剿匪”、农业生产合作化、农业生产技术改革、粮食统购统销、“审干”、“肃反”、“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等新中国建国后的前三十年的历次重大政治运动与历史事件。而作者长期从事秘书工作的特殊身份和经历，为我们了解和认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从这个独特的视角，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那段不同寻常的历史风云的变幻，政治运动的激荡，个人命运的沉浮，人性善恶的裸露，以及身处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由此能让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社会主义新中国成长壮大的曲折历程和今天改革开放大好局面的来之不易，为我们认识了解研究粤北地区党和政府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农村工作及这一时

段的粤北农村状况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作者具有较深厚扎实的文字功底，整部回忆录结构严谨细密，内容厚重饱满，选材主次分明，叙述条理清楚，语言朴实流畅，不仅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同时又具备较强的可读性，实在是一部难得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史料。

2016年8月

目 录

一、家境变迁	1
二、解放前后	4
(一) 初闹学潮	4
(二) 两度解放	6
(三) 初试锋芒	9
三、南大学习	13
(一) 赴校途中	13
(二) 教学概况	14
(三) 两大收获	17
四、土改岁月	19
(一) 英德出战	19
(二) 北江小结	41
(三) 清远漩涡	45
(四) 花县跃起	54
五、粤北磨炼	62
(一) 农业合作化	63
(二) 农业生产	73
(三) 粮食统购统销	88

(四) 审查干部历史·····	94
(五) 机关内部肃反·····	100
(六) 县省第一次党代会·····	102
(七) 巫大杰被安排工作·····	103
(八)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调研·····	105
(九) 随马甫书记常驻连县·····	106
六、反右浪潮·····	111
(一) 反地方主义·····	111
(二) 反右派斗争·····	112
七、劳动改造·····	114
(一) 在报批前后所见的“大跃进”·····	114
(二) 在白石坪监督劳动·····	115
(三) 在马坝场强迫改造·····	117
(四) 在西联摘掉右派帽子·····	119
八、出山入场·····	121
(一) 我的心跌了下来·····	121
(二) 鞠躬尽瘁愿为牛·····	122
(三) 农业生产力调研·····	123
(四) 调查纠正单干风·····	126
(五) 健全经营管理工作·····	127
(六) 调研发展红花子·····	132
(七) 患血吸虫病留医·····	133
(八) 下放示范场劳动·····	134
九、“文革”风云·····	138

(一) 满堂大字报围攻·····	138
(二) 戴高帽游街·····	140
(三) 衔命归乡学种田·····	141
(四) “文革”烈火燃韶城·····	142
(五) 三个女儿改姓冯·····	143
(六) 重归故里生活·····	144
(七) 触目皆是“红海洋”·····	148
(八) 插秧收割逗心欢·····	150
(九) 两大奇遇·····	151
(十) 重返连县求复职·····	153
(十一) 炮声中送七叔治病·····	161
(十二) 全家团圆共渡难关·····	162
(十三) 适应环境克服困难·····	164
(十四) 县社帮扶安居乐业·····	166
(十五) 省地督促复职归队·····	169
(十六) 风雨过后又晴天·····	183
十、平反改正·····	186
(一) 连县县委落实办通知·····	187
(二) 韶关地委落实办通知·····	188
(三) 知遇图报愿为牛·····	189
(四) “先满足你权小职低要求”·····	191
(五) 急令回部主持工作·····	192
(六) 评分调资皆大欢喜·····	194
(七) 处理分队的方针·····	196

- (八) 全面推行劳力分口粮改革·····198
- (九) 李显扬问题获解决·····199
- (十) 林名勋书记获平反·····201
- (十一) 张安养恢复政治名誉·····202

一、家境变迁

1930年9月17日，即农历7月25日，我生于广东省惠州府城六角亭。故取名为惠宗，随父姓姚。

父亲姚挥尹，字定基，先后工作于惠州中学和惠州禁烟局。其原籍是广东省今梅州市平远县大柘镇岭下村石灰塘自然村。

母亲阳丽霞，祖籍广西省桂林，排行第二，自幼丧母，被生父卖给人作养女；十二三岁，又被养父卖给优伶学唱，以流浪卖唱为生。年十五，被我父亲相中，经她本人同意，赎出为妻，小于父亲14岁。

我排行第二，前有大我2岁的琼英姐，后有小我3岁的云英妹和小我6岁的玉英妹。父母还抚育大我5岁的养女杨冬喜。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出兵全面侵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父亲带着全家回原籍居住。他此前已汇款给其胞兄接尹修整好祖屋九房一廊，又买了典当田30余亩和5亩多永业田。他的妾谭瑞圆和小女宝英及两个养女陈桂妹与徐春喜，则留在惠州生活。

翌年春节后，父亲又带全家返回惠州六角亭居住。8月，他独自返原籍处理家事。10月，惠州沦陷。

母亲带我们跟邻居到惠州麻庄避难。在一片密林的山脚下，雇人搭“人”字形茅寮遮雨，但挡不了风，吃卧在地上，常捱饥挨冻受湿的折磨，导致我们日后患了难治的风湿病。

一天夜间，日寇来犯。我们随大流摸黑上山避难，“哨蓬”声声，枪响不停。我仅有5岁的云英胞妹，因掉鞋而赤脚行走，脚底磨烂出血，忍痛不敢声张。有一家婴儿啼哭不止，在难民威胁下，生母忍心以掌掩其口，不幸窒息而亡。我还常听大人谈论：日寇残杀百姓，轮奸并杀死妇女，劫掠财物，宰杀牛猪，烧毁房屋等等暴行，令人既愤恨又惊慌！

12月的一天，父亲忽然赤足跛脚出现在我们面前。他说，身上所携财物，甚至穿着的新鞋，全被土匪抢走。当天晚上，他冒着寒风带我到附近水井洗身。第二天，他患了重病，不省人事，没过多少天，就不幸离开人间，只有40岁。

不久，年仅二十六的母亲含悲忍恸，毅然带着我们（又增添了父妾家的桂妹和春喜）向平远大柘行进。经过许多惊险、磨难和曲折，终于在1939年春节前回到原籍老家，母亲却大病了一场。

此后，伯父按族谱字辈排列，把我改名为良宗，先在景清小学读完三、四年级，又在芝兰小学读完五、六年级。除高秋一因代人补考被开除而转学石正中学外，初高中共五年半都在平远县立第一中学（简称平中）就读。

1944年下学期，我在平中读初秋二（平中是解放前开办了初、高中的老牌中学，每年2月、9月考录新生入学编班，分

别简称为高春一、高秋一和初春一、初秋一），集体参加三青团，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也没有参加任何反动活动。

在1949年解放前三年，先父买的典当田被陆续全部赎回，自己只有5亩多永业田。桂妹与云英胞妹早已出嫁，由冬喜、春喜通过交工换工及临时雇工耕种，母亲担负家务工作。1950年8月征粮，以家庭成份中农计征。1953年土改，因母亲没有参加主要劳动，被划分为小地主家庭成份，母亲被划分为地主分子，她与玉英从此自食其力。云英则在同年不幸病逝。此前，春喜已出嫁，冬喜与姚良干结婚，另立炉灶。1956年，母亲被摘掉地主分子帽子，参加农业社成为社员，享受公民权利。原籍乡、区政府批准母亲到广东省海南岛，帮琼英姐照顾小孩并做家务。翌年，玉英妹来韶关我家，复读初中二年级。

我的社会关系主要有二：一是我表兄陈干光，后改名陈采，1943年冬在平中初中毕业后，因家贫无力升学，经人介绍去广东省吴川县政府工作，获得县长赏识，于1949年解放前夕一起逃亡台湾，工作于国民政府国防部二厅，后调至教育部工作。1989年10月回原籍探亲，病逝于1998年4月，享年75岁。二是同宗伯父姚锡祺，与我父亲世交，先后在惠州和原籍平远大柘等地以中医为业。抗日战争期间，约1944年出任大柘乡长一年余，仍结合行医。1945年抗战胜利前已辞去乡长职务，专事中医。抗战胜利后，又先后在广州与韶关市当中医生。1957年10月病逝，享年68岁。

二、解放前后

（一）初闹学潮

1948年6月26日，星期六下午，烈日西照，天气炎热。在广东省平远县大柘乡岭下村赤楼下，一片干高枝繁、绿叶婆娑的鸡屎果（又名“拔子”）树下，就地围坐着近百位平远一中读书的各班青少年学生，中央放着一张八仙桌，我站在桌边，慷慨激昂地宣讲《声讨丘民立檄文》，揭露他贪污公款，聘任劣质教员，降低教学质量，轻视差生，封锁校门办学……等罪状。姚良禄、姚良森分别站在我左右身边。我边宣讲，他俩边轮流带头带动全场高呼口号：“打倒丘民立！丘民立滚出去！”“吐出贪污款！努力办好平中！”“优差生一视同仁！提高教学质量！”……

我时任平中学生会文娱部部长，读高秋二，学习成绩一向居全班前三名，在全校中享有一定威信。因此，经我和良禄、良森等人会前秘密串连发动，各班就有许多人签名参与闹学潮。我之所以联络良禄、良森带头闹学潮，是除受鲁迅《呐喊》等作品的影响，不满于社会现实外，还受几个月前中共收复延安、全面解放东北和刘永生部潜来梅南活动的鼓

舞。但这只能深埋心里，不能也未曾说出口。

我宣讲完后，群情激愤，同学们纷纷站起发言，提意见，直到夕阳西下，才由姚良禄作总结性发言。宣布闹学潮的目的是：敦促丘民立校长辞职，解聘不合格的教职人员；其手段是：坚持学生罢课，劝告老师不上课；其守则是：坚持动口不动手，不破坏公物。每人拿到几份《檄文》，就各自离场而去。

第三天早晨，良禄、良森来我家中，告知国民党驻军张营长率兵包围了学校，周围分散架着八挺轻机枪，叫我暂时躲藏，千万不要去学校，免被逮捕。晚饭后，他俩又来告知，丘民立校长请求我们三人到他房中商谈，什么意见都可提。并告知张营长在上午来校开师生大会训话，说什么省府宋子文主席有指令，驻军不待奉命或邀请，都有平伏学潮，解送学生的权利！我们分析了当前形势，取得了共识：以退为进，与丘民立谈判，实现某些目的。

夜黑天低，四周死寂。我们从石灰塘家出发，行了二华里多路，入校到达丘民立房里。看见他坐在办公桌边，桌面放上一支左轮，压着《檄文》。他满脸堆笑，起身招手，表示欢迎，诚恳地说：“请坐！”他又说了一通好听的话后，就请我们对办学提意见，保证虚心采纳。我们按《檄文》所述，与他逐条对话。他除否认贪污公款外，其他都表示考虑改进。最后，他保证不处分、开除任何一个参与闹学潮的学生，我们也表态会协助复课。

学潮从此而终止。当时，我写了一首七绝《述怀》：

“漫云出路太艰难，自有雄心不复殒。豹隐南山藏利爪，他年得志誓除奸！”

后来，即1950年10月，我在广州石牌南大学习时，去附近省党校拜访原平中校友、平远县长陈克平（原名玉堂），承告知在平中闹学潮期间，他曾带人摸黑到平中警告丘国立，不能开除处分学生。

（二）两度解放

1949年5月上旬，国民党兴梅地区专员公署专员李洁之和驻军团长曾天节举行起义，所属各县和平解放。

5月22日，阳光灿烂，平中广大师生集会欢迎游击队领导陈克平及其部属陈超贤等，先后听取了他俩简要报告。报告过程中，掌声雷动；报告会后，掀起了报名参军热潮。

5月25日，平远县军管会成立，并建立了县、区人民政府。姚良禄出任大柘区副区长。据说，姚此前一年12月加入平中地下共产党，过了四个月，陈超贤离校参加游击队后，姚接任平中地下党支部书记职务。

对于当时县区建政庆典盛况，我写了一首七绝《庆和平解放》加以描绘：“爆竹震天锣鼓喧，秧歌扭舞彩旗扬。笑容绽放欢声沸，万里晴空挂艳阳！”

我喜购了毛泽东主席著作，如《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埋头勤学起来，并认真写笔记，加深理解和记忆。

但好景不常。7月5日，平远和邻近几个县都被国民党胡璉兵团所占领，老百姓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我担心因带头闹学潮而被缉办，除埋藏毛泽东主席著作外，又常开卧室后门，深居简出，埋头读书，借以度日。胞姐琼英则天天在街门口厅堂编织毛衣，充当警戒，一有风吹草动，即急报我离家出走。

7月中旬，墩子树下有个姚冬士，在外地当白军逃跑回家已有多时，只缘穿着旧军装去十多华里外的河头乡探亲，竟被胡军枪杀，使我更痛恨白军并提高警惕。有一天，吴德敬学友来家邀请我同赴兴宁县城，考读胡璉开办的龙蟠军校，乃拒之，并劝阻。他走后，我成诗《应变》一首：“触目云烟血泪多，凌霄壮志半消磨。且听丛竹鸟鸣唱，岂怕讥余念弥陀！”

8月末一天上午，家姐急报邻屋兵营子有胡军拉伏，我立即冲出后门，绕路进入慈埔山林里躲藏，同屋的姚玄秀、姚若煌等随后赶到。片刻，我们从森林稀疏的空隙向下望去，发现一支白军在对面山脚的路上，由北向南行进，忽然俯伏地上，开轻机枪向我们藏身处扫射，弹哮枝折，同伴惊动起来。我连忙摇手细声制止：“快卧倒！莫惊！莫惊！这是火力侦察，不会上来搜索的！”

这队白军过去不久，一队队后续白军似蚂蚁那样，接连不断地走过，直到日头偏西才走完。

我愤喜交集，饥渴交迫，悻悻带着同伴回家。走了七八华里路，到达兵营子屋边，听到哭声，循声看见黄二姆蹲在塘

阶上洗血衣。我想，半月前被张秉宏（平远联防主任，解放后被处死）诱捕的姚良禄肯定惨死了。

当晚，我悲愤交加，写成《悼良禄》一诗，并借以自警：“虎狼岂可祈饶恕，血训铭心启迪明！”

9月3日，平远全境第二次解放。我挥锄挖出毛主席著作，又开始埋头潜心学习，并认真复习功课，备考大学。

9、10月间，平远县委工作队进驻大柘区，以岭下大村为重点，先后开展了减租、减息、反霸、清烟赌和征借军粮等工作。清烟赌，是禁吸鸦片烟和禁开赌馆聚众赌博。

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县委工作队主持对姚程尹、姚俊秀先后开展了清算斗争，取得了预期胜利。前者在1953年土改中划为地主，因解放前任大柘乡伪乡长多年，负有参与杀害姚良禄等人血债，被判处死刑。后者也在土改中划为地主兼工商业资本家，畏罪上吊自杀。

工作队阿洪姐多次来访谈，都是东拉西扯，显得随便自然，真诚坦率。如谈论古今历史和文学作品的人物事迹，个人兴趣愿望，从中涉及当地社情风俗，谚语趣事，群众意愿，等等。

有一次，她谈论我考读大学的事，认为不现实，还是先参加革命工作为好。她摆出五大理由：（1）现全国全省还未完全解放，估计大学不会招生；（2）即使以后全国全省解放了，也未必立即招生，还有紧急的工作要做；（3）与其等待，倒不如先参加革命工作为好；（4）即使以后读上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也是为国出力，为民服务，与先参加革命工作

没有什么区别；（5）你的家境未必能负担得起读完大学。她说，可以介绍我去县军管会做秘书工作，透露她的爱人是现任县委书记兼县军管会主任陈悦文，大家叫他阿华哥的。最后，她说：“请你再三考虑后回复我。”

过了几天，她又来访谈。我回复说：“还是先考读大学，后参加革命工作为好。”她叹了一口气，说：“那好！尊重你的志愿。但有一件事求你，我想在乐英学堂开办妇女夜校，只是在夜晚上课，并不影响你复习功课。你看，能否帮忙？”我爽快地回答：“鄙人乐于从命！”

当时，我认为，国民党已丧失民心，兵败如山倒，全省全国的解放指日可待；国家建设需要人才，必然经济和教育先行，很快会开办新的大学和复办老校；文化技术知识越高，对国家建设和为民服务的贡献越大；我虽然家境欠佳，难以完全负担读大学，但可通过自己努力，争取免费和奖学金补助，也可借债读书。

她听了我的想法，理解了我坚持考读大学的本意，笑逐颜开，连声说：“谢谢，谢谢！真是多谢你了！”

从此，我过着“昼修马列试题课，夜授图文乃绘鱼”的半工半读生活。

（三）初试锋芒

1950年1月中旬，我接到石正中学校长谢立猷的聘书，聘任我为石中附小教员。我考虑，全国全省大学都停止招生，与

其赋闲在家，倒不如暂去教书，能进可退，一举两得，不像正式参加革命工作那样受束缚，难以自由行动。于是，我欣然接受聘任。

谢校长是我读平中的老师，思想进步，倾向中共，常在授地理课时，讲解国共两党的战争形势，给学生以思想启蒙。平远第一次和平解放后，出任县教育科科长。

石中附小仅有三位专任教师：教务主任谢岳义、教员林敦举和我，主讲五、六年级的语文、算术等，体育、音乐、图画等则由中学教师兼任。我每周除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休息外，天天排满了课程。晚上还要家访和参加社会工作，如配合党的中心任务，下乡宣传，写贴标语等，几乎没有多少时间备课，只能先过目一下，做到心中有数而已。但学生和家都反映良好，校长和教务主任也表示满意。

因此，在当年“五·四”青年节前，我被接纳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团员，无候补期，并在“五·四”宣誓入团仪式上，代表全校新团员致辞。7月间，我就接到了谢校长的聘书，聘任我为石中附小教务主任。此聘书，在我考读南方大学前退了回去，并上函致歉。

7月中旬，我参加平远县中小学教师进修班学习，地点在仁居，是老县城。

我报到后，就承县委书记兼县军管会主任陈悦文接见，指定我为进修班学委会主任委员，他亲自兼任班主任。同时，指定我准备作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的学习报告，命我先写提纲，给他审阅和互相讨论后，再起草报

告，并呈他阅改。这样一来，就使彼此加深了理解，谈话也显得随便自然了。

8月初，县进修班全体学员近五百人参加各乡征粮，我又被陈悦文书记指定为东石乡征粮工作队队长。在该区区委的直接领导下，超额完成了征粮任务，受到了表扬。我随即带队返回县进修班。

8月末，陈悦文书记动员号召全体学员自愿报名投考南方大学。通过初试，选送了13人赴梅县城复试。主要考文、史、地、数、理、化，并经过体检。通知录取名单要七天后在《梅江日报》上公布。

于是，我和姚天士、林振西等学友步行回家。在长田路上，巧遇赶往梅城想追我返家的慈母阳丽霞。

她突然惊喜又悲伤，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在大家劝慰下，虽冷静了下来，但一路近三十华里都默不作声。抵家稍事休息，她又含泪对我说：“阿宗！求你念在阿妈年青守寡、吃苦受难带大你的情份上，就在石正教书吧，不要离开我啊！我要靠你养老啊！”

我一时语塞，不知怎样回答。忽见一只老母鸡进房觅食，几只雏鸡跟进来。老母鸡倏忽掉头追赶乱啄，把牠们赶了出去。我灵机一动，恳切地说：“阿妈！您带大我的恩情，绝对不会忘记，也会终身报答。但您看，那个老母鸡为了带大的鸡仔独立寻食生存，又忍心一个个赶了出去，您又何必舍不得我离开您呢？家里还有琼姐、玉妹陪伴照顾您，我以后也会同您一起生活啊！”她颤抖了一下，用手巾抹去眼泪，平静

地说：“好吧，阿宗！你就安心出去吧，但要打理好自己，不要分心牵挂我！”我高兴地说：“哈哈！您真是我的好妈妈！”她展容笑了起来。

三、南大学习

（一）赴校途中

1950年9月中旬，我获悉被南方大学录取后，在一天清晨，我们背着行李，从平远大柘乘车到梅县城集中，约汇合三百人，再转车向广州南大进发。傍晚，到达龙川县老隆，又换乘轮船并拖拉一条有篷的大木船前进。两条船的头尾都堆放着沙包，多挺轻机枪架在沙包上，下面伏着解放军战士，手持枪把，机警地注视着前方，准备随时战斗。每到险要处，都先招呼我们卧伏在船板上，以防国民党残兵袭击。

第二天傍晚，船到惠州码头，宣称暂休三小时，允许乘客自由活动。于是，我约天士、振西等人上岸到惠州城游览，意欲寻觅六角亭故居。

我们漫步在惠州城的街道上，边行边看，边看边想，边想边觅。忽听见惊喊：“哎呀！快八点了，快回去！”大家急转身走回头路。我没有觅见六角亭故居，怀着失落惆怅的心情，垂头丧气地跟着他们回到船上。坐下不久，船就起锚开航了，一路顺利到达广州码头。我们随即列队，一个个踏上客车，装满约十辆车间隔地向南大行驶。

（二）教学概况

南方大学坐落在广州石牌，即今华南师范大学校址。

当时，南大仅有几栋二层楼房和一排排平房；还有一间可容纳数千人听课的竹柱支撑、杉皮盖顶的大礼堂。广大校园杂草丛生，一片荒凉。

南大创办于1950年1月1日，我就读第二期，校长是广东省府主席叶剑英兼任，副校长陈唯实主持校务，副校长罗明掌管后勤。

在正副校长统一领导下，设行政单位处（室）科，有教务处、总务处、秘书室、校刊编辑委员会、建校委员会、干部学习委员会、文艺工作团、图书馆、疗养所等；教学单位设部（学院）、系（班）、组。有第一部文教学院，第二部行政学院，第三部财经学院，第四部政治研究院，第五部工人民族学院，第六部华侨学院。

全校约共三千多教职学员。除组长是学员兼任外，部、系（班）都是由各级干部组成。如系或班设主任、助理、干事若干，负责领导组织学员的学习和生活管理。

校内还建立了党、团委员会和党、团总支部或支部。学员中党、团员，除参加学习外，还要在夜间轮流持枪放哨护校。

校内还建有群众组织。由学员选举产生校、部、系或班的学生会，又成立校、部妇女工作委员会或分会。

南大以“实事求是”为学风，以“忠诚、团结、朴实、

虚心、勤劳、勇敢”为校风，坚持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教育方针，教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中国革命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等。

教学以全校上大课为主，以组为单位讨论。以陈唯实副校长、李又华教育长和专任教师主讲，并先后有叶剑英、陆定一（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方方（广东省府副主席）、萧向荣（华南分局宣传部部长）、尤金博士（苏联驻华大使）等来校演讲。

在上大课前，每个学员都从辘架床边拿起一张矮木凳，按校统一规定，凳面朝前，四脚朝后，用右手托抓住朝下的凳面边缘，平放靠身，以避免互相碰撞；接着，走到班舍前空地排队，在班会值日员的指挥下，按编组号先后排成两列纵队，一直走进大礼堂就坐，井然有序。讲台上有人指挥唱歌，都是当时流行歌曲，如《东方红》、《民主青年进行曲》、《解放区的天》等等。不管有无到齐人，都准时开讲。

每天开膳两餐，也在此大礼堂内进行。凑齐六个人，围绕四盘菜，形成一个圆圈，蹲在灰沙筑成的地面上吃。米饭任吃饱，吃饭不要钱。因伙食办得很好，常吃牛肉煮马铃薯、猪肉煮豆腐或芹菜或冬笋及各种蔬菜，大多数人在到校三两周内，就增加了体重。每位学员一到校，学校就发给两套蓝色的校服，11月份又发给青绿色的棉被一张，棉衣夹裤各一件。不发零用钱。

每逢星期天都放假，学校准许学员外出自由活动。有校

车搭乘学员出广州市区，不收车钱。但因候车时间较长，多数人都选择徒步出城。

我是南大二部九班的学员，在二个多月学习期间，学校组织了自查历史与思想、报名申请参加抗美援朝、参加广州市庆祝国庆大会与游行、抢修白云飞机场、劳动建校（打泥砖）等重大活动。其中，除抢修白云机场外，其他几项我都亲历其境。

自查历史与思想，是以组为单位，以个人自愿自报为原则，民主提意见，无须表决通过。这项工作，是在10月中旬，先后听取了《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教育方针与教育方法》、《论作风》、《怎样做好小结》等报告之后进行的。学员们提高了政治觉悟，放下了历史与思想包袱，都觉得身轻胸畅，学习更积极，干劲十足。

10月下旬，先后听取并讨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史》报告；11月下旬，抢修白云机场与打砖建校。抢修白云机场的学员，在11月24日暴风雨的袭击下，仍坚持工作；留校学员，则冒着风雨抢运泥砖。大家不怕苦累、不怕生病，表现出大无畏精神，先后获得省、校首长的表扬，并被拍成影像播放，对社会干群的影响很大很好。

尤其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各部同学赴白云机场参加抢修劳动时，我去见我们班的班主任，请求批准参与。林主任说：“你这精神可嘉！但你要安心留校帮班抄写学员简历，还要在夜间轮流持枪放哨护校，白天打砖建校，以后又有更重要的任务交你去完成！”接着，他嘱咐监视邻床的吴某，防止他

进行破坏活动。

吴某是与我同组学习，在此前自查历史与思想的过程中，一直默不出声，抑郁烦躁，似隐瞒了重大历史问题，故林主任嘱我防范其破坏行动。

于是，当天夜间，吴某起床大小便，我都紧跟不舍。第二天夜间，他去大便，我又跟着去，蹲在厕所隔离。他恶狠狠地说：“警告你！别盯梢了！留心你的脑袋！”翌晨，我向林主任报告实情。林主任笑着说：“你被发现了，就到此为止吧！”吃早餐时，不见吴某来吃饭，我告诉林主任，他回答说：“他逃跑了，算了！”

（三）两大收获

通过南大学习，我喜获两大收获。

一是树立了科学世界观与革命人生观。我学通了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了全面客观看问题与分析处理问题。分清了敌我友，学会了阶级分析方法，培育了“甘当勤务员，甘当小学生”精神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增进了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人民的感情，立志决心参加革命到底。

二是培养了“南大精神”，即学风与校风相结合的精神。我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与作风，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弄清事物真相，全面客观冷静地分析问题与处理问题。坚持做老实人，办老实事，不虚浮造假。不卑不亢，

不骄不淫，不怕吃苦，不怕牺牲，既不裹足畏前，又不怯懦退后。摒除患得患失、苟且偷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错误思想。力求做到有一分热能发一分光，做一天和尚撞一日钟；能进可退，能贫可富，能贱可贵，随遇而安。并且力求做到遵纪守法，乐道慎独，勇于创新。

以上两大收获，基本上成为指导我一生的行为准则。

四、土改岁月

（一）英德出战

1、奉命出发

1950年12月1日，我们南大150名学员背着简单行李，出发参加英德县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即简称“土改”。

当晚，从广州乘火车北上，坐船渡过北江，又步行到达了英德县城（英城）。在一间大屋里地铺上，睡到半夜，忽被阵阵枪声惊醒。后来听说，刚解放不久，粤赣湘边纵队北江第一支队（简称北一支）第八团进剿“粤北反共救国军总司令”梁猛熊驻黄花部队，竟然被匪帮伏兵打败，从参谋长以下官兵，不幸壮烈牺牲过半。英德县人民政府也被匪帮围攻了两天三晚，直到驻穗解放军一个师赶来进剿，才得以解围。这次全县土改，华南分局特调两个师解放军进驻剿匪，以保证运动顺利开展。

翌日，我们与省地县属机关共1千多人，一起听取了英德县委领导作“学习土改政策”的动员报告，并书面宣布混合编组名单，我被委任为一个学习组的组长。

过了两天，县委宣传部部长王士英（省政府副主席古大

存的政治秘书），召开十多个组长参加的座谈会，征求如何作“消除畏惧匪害思想”的动员报告。我第三个发言。讲完后，王部长即询问我叫什么姓名？怎样写的？他记下后，继续启发其他人发言提意见。

又过了几天，王士英部长率领约二百人，其中，南大学员约三四十名，在一个营解放军的护送下，步行到一区望埠住宿；翌日，再跨越重岭密林的百断石抵达第三区（英东）黄塘乡搞土改试点，重点是雅塘村。王部长兼任第三区区委书记，委任我为三区土改委员会调研组组长，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

2、土改入手

这时，英东尚存“粤北反共救国军副总司令”曾镜与杨策雄统率的若干股匪帮在垂死挣扎。我们每个土改队员配备一支短枪自卫。在匪情严重的地方，则配备两件：短枪和步枪，个别人还加带一枚手榴弹。又特别安排了一个营解放军和80多名区中队及各乡组织的一支三四十名武装民兵进行剿匪，以保证土改运动的正常开展。

英东虽是北一支长期开展游击活动的革命老区，群众基础较好，斗争积极性较高，但一向未搞过土改，故英东也与新解放区一样，是依据中共中央“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路线精神而开展土改工作的。先从扎根、串连、诉苦，组织阶级队伍，建立新基层入手，进而开展“清匪、反霸、退租、退押”八字运动。

但在匪害较严重的乡村，不可能如此有序地进行土改工作。群众早已受到恐吓、抢劫、打杀等威胁，不敢接近土改工作队；工作队又面临打冷枪、绑架、吊打、暗杀的严峻局面；而旧基层往往不纯，既不能完全依靠，又不能一脚踢开；土改队员既要与他们周旋，又要提高警惕，防止其中混入的坏人捣鬼，并要另起炉灶，开展个别扎根串连工作，把防匪、查匪、剿匪摆在重要议事日程上。

3、一触即发

1950年12月下旬，我与苏方松从雅塘起程，拟到英德县土委参加调研会。苏前我后，相距十余步，各持子弹上膛的手枪，眼观四方，一路无言脚步轻。忽然，在百断石一处险要的路边，苏卧伏路边，我急跑靠拢伏倒，问：“怎么回事？”答：“前面有匪敌！”我俩伸枪瞄准。俄见有人三面登山，军装闪动，很快形成了包围圈，这才频频喊：“举手投降！”我俩静观不出声，判明是一个排的解放军后，就站起收枪，缓步前行，并大声呐喊：“我们是土改队员！”有一个军官紧握手枪走来，查看了我俩胸章后，伸手与我俩紧握，并和蔼地说：“误会了，对不起！前边路上有一具尸体，枪口仍在渗血，被我们掩埋了。你俩千万要警惕小心啊！”我俩异口同声说：“谢谢！请珍重！”便昂首挺胸进入森林深处，阔步向前走去！

县委第一书记兼调研组组长林名勋主持调研会。他简要致辞后，就由全县6个区调研组组长分别汇报工作。他认真倾听，并不时记录。由县调研组副组长布置下阶段工作后，他又

作总结讲话，强调调研工作的重要意义，勉励有加，令人深受启迪和鼓舞。散会后，县土委办干部李杰，退还快慢制驳壳枪给我时，真诚地说：“林书记表扬你呢！说你很勇敢，工作很细致。”“谢谢，请代为致意！”“好，一定转达。”“谢谢！”我心里甜滋滋的。

过了20多天，林名勋书记又召开了一次全县6个区调研组组长会议，汇报前段、布置后段工作。散会后，在一个班精锐武装的护送下，他约我一起先从水路乘船，又转陆路步行，抵达英东检查指导工作。一路天南海北地交谈，彼此更了解更熟络了。

4、王许交接

王土英部长在黄塘乡及其重点雅塘村开展了“八字”运动和第二次大规模搜山剿匪活动后，即于1951年1月中旬，带了一名警卫员和两位土改骨干调往一区接任区委书记，负责搞土改去了。他叮嘱我把档案材料移交给中南土改队许建业后，即去一区报到工作。

许建业是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处处长，兼任英德县委第三书记；第二书记是广东省商业厅厅长丁兆祺；第一书记是北江区农民协会主任、原北一支政治部主任林名勋，是英德三区横石水镇江古山林屋村人。

许处长与于科长（兼任英德三区区委书记）到雅塘村后，即召开三区土改委员会工作人员与驻黄塘乡及新到来的中南土改队员约五百人的战地动员大会，作了全区分批土改的部署。当时，全区辖桥头、黄塘、鱼湾、溪板、文光、青塘、洪

象等乡。宣读了分去各乡工作的队长、村组长及队员名单。没有安排我做任何工作。

会后，我请示许处长与于科长，我保管的档案材料移交给谁，并说明遵照王部长所嘱，要去一区报到安排工作。

许处长进一步问清具体情况后，即命我打电话给县土委找林名勋书记。

在通话中，他首先问林：“县委关于人事安排的决定要不要执行？”听他继续说：“王士英带走了两个骨干蓝立尚与陈廷坤，又要带走区土委办公室的姚良宗。这不行！带走的两个要回来，未走的不能走！”听他又说：“不行，要按县委决定办！”过了一会，又听他说：“好吧，就通融这一次，下不为例。”他放下话筒，继续用北方口音对我说：“你仍保管档案材料，负责搞办公室工作，有时帮我做翻译。”我平生首次看见这种场面，思想震动很大，便连声说：“好，好，遵命！”

翌日，许处长与于科长带着6人（我是唯一的广东人），在一个班解放军的护送下，向三区区委会和区政府的所在地——桥头进发。

5、“雅塘事件”

我们离开雅塘村几天后，就发生了震动全省的“雅塘事件”。

据跑来区委汇报的董连长（土改组长）说：黄塘乡十二村的民兵、群众三十多人，来到雅塘村对地主进行退租退押斗争，有个地主婆暗中煽动肥水不过别人田，财物不给别村

人，导致两个村民兵、群众从吵架开始，乃至于发生械斗。土改队员苏方松等加以劝告阻拦，竟然被雅塘民兵缴枪并吊打。董连长看事态失控，便乘乱溜走，企图向区委汇报求助，被几个民兵发觉后，竟然开枪示警，并紧追不舍。幸得董连长是打游击出身，跑得快，才得以脱险。

经区委派人平息事件，并调查核实，判处挑拨农民械斗的不法地主婆死刑，立即执行；判处缴枪并吊打土改人员的为首分子三年徒刑。

6、围剿股匪

英东革命老区群众深受匪敌烧杀虏掠的迫害，有的全家数口只幸存孤身一人，阶级仇恨深，政治觉悟高，一经发动起来，几乎倾村空户出动，男女老少都紧握各色武器，如柴刀、菜刀、匕首、扁担、竹杠、木棍、铁棒、锄头、铁耙、长矛、刺刀、长短剑、大关刀、火药枪、绳索，还有猎狗，争先恐后，紧跟解放军、区中队、土改队和武装民兵，先后共三次开展了大规模的搜山剿匪活动。我身历其境，感受很深，终生不忘。

第一次，约在1950年12月，靠近黄塘百断石的崇山峻岭之间。最终与两股曾杨匪帮对峙交火。但可惜没有完成包围圈，在夜幕的掩护下，匪帮偷偷地溜走了。

第二次，约1951年1月，在黄塘境内某几个山头。与上次不同，采用全面包围，逐个山头搜索推进的战术。从早上搜索到下午三四时，终于发现了匪情，接上了火。

枪声就是集合号，枪声就是冲锋号，搜山队伍从四面八

方包抄了过去，很快形成了较小范围的包围圈。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

这时，我事先奉命带领黄塘数十名武装民兵，跟随解放军马班长一个班，正扼守在制高点上，平安无事。我们的任务是：“誓与阵地共存亡，不准离开阵地半步，坚决堵死匪敌逃路”。按马班长的部署，分两线防守。高峰下一个较矮的山头，由两名大军带领十多个民兵驻守；其余大军和十多名民兵，由他带领，防守顶峰。他使用一支手提冲锋枪居于山顶中间，紧挨他身边的，左有正副机枪手和一挺轻机枪和弹药，右有手执德国造快慢制驳壳枪的我，其余分散在两侧，由他指定的防守位置上。主要是利用地形地物作掩护埋伏，除少数大军略加改造地形外，基本上没有修整防御工事。

约打了个把钟头，果然，不出指挥员所料，股匪数十名，在对面山头一挺轻机枪的猛烈扫射下，向我们阵地第一防线冲来。很快，防线就被冲溃了，向山顶撤退，多数民兵乱了套。古小说描写“兵败如山倒”的景象，蓦然在我脑海里闪过。但马班长镇定自若，立即命令机枪手先打掉敌机枪，起码压住其火力，掩护一线退兵。在我机枪猛烈扫射下，敌机枪忽然哑了，而股匪却已冲至崖下死角。马班长喊一声“站起来打”，率先站起向崖下敌群扫射，机枪手也托起机枪猛扫，所有人都站着开枪。崖下躺着死尸，没有死的连滚带爬地退了下去。“卧下打！”马班长又发出口令。我刚卧下，就听见“哧哧”声响，并听见马班长大喊：“快撤！”我脚被用力一拖，身体溜了下去，恰好落在马班长身边。说时迟，那

时快，我刚才埋伏的一小丛灌木，被连发的机枪子弹连根带叶翻起。马班长在我耳边说：“你看，多险！撤慢点就报销了。”他指着吐火舌的敌机枪位置，对机枪手说：“看见没有？在我们第一防线那棵大松树脚靠右边。”“看见了。”机枪手把机枪向前架好。马班长说：“瞄准——打！”愤怒至极的轻机枪，又“哒哒”地呼啸起来。马班长兴奋地说：“好，好！打中啦！打死啦！”又发出“站起打”的口令，站着向崖下反扑的匪敌开火，机枪手也急起身猛扫，股匪除死的以外，再次滚溜了下去。

这时，我军追兵赶到，“杀”声震天，“冲”声四起。股匪向四面八方溃逃，各自保命去了。

溟濛的夜色，笼罩着山头。我们豪情满怀，依然坚守在阵地上。

第三次，约1951年2月，战斗发生在黄塘至桥头的几个山头上。

夕阳傍着山顶，已近黄昏。向山顶搜索的二名大军，随着一声枪响，一个被击中持枪的右手，另一个立即伏下还击。枪声打破了四周的死寂。

此刻，我正跟随巫大杰区长（兼区中队队长）和他4个警卫员在一起吃饭。他急忙丢下碗，拿起挂在脖子上的哨子猛吹，连声高呼“集合”！80多人的队伍，按班排（小队）的编制，迅速站好。他手指枪响处说：“跑步前进！”他从一个警卫员手上接过缰绳和马鞭，迅即骑上马，跑在队伍的前面，几个警卫员和我追了上去。进入阵地，他下了马，布置2个小队

分左右隐蔽包抄过去，他带领一个小队，从正面出击。

我们中路人马分散冲至半山坳。这里有一条路通往桥头，头顶上有一片森林遮掩。巫区长停了下来，命令小队队长带队继续分散匍伏前进。匪机枪在点射，时而连发，变着花样。这是匪首曾镜使用机枪射击的特色，看似打向背面接火的山头。巫区长兴奋地说：“牵制住曾镜了，这次莫让他溜走。老姚，你骑马到营部搬兵去，请他们从桥头包抄过来。”

“我没有骑过马，怎么办？”

“没有关系，等一下，我教你，很快学会的。马识路回去，不用担心。营首长认识你，这样，他不用考虑是否是曾镜的诡计，就会立即派出机动兵力参战。”

“好，让我试一试。”

他突然站起身，命令我“立正”！威严地说：“命令！你立即骑马尽快到营部搬兵，从桥头包抄过来！除非牺牲，负了伤也不准下马！马打死了，也要继续前进！复令！”我复令后，他和抓马缰的警卫员扶我上马鞍，进行摆正、夹马背、伏鞍、扬鞭、扯马头、勒缰绳等一系列示范动作后，说：“只要平安冲过前面山坳，就可望大功告成了！”命令两个警卫员手持软树枝，分站马屁股两侧，候令鞭打。我完成他发出一系列“坐稳”、“伏鞍”、“扯高”、“鞭打”等口令后，马嘶鸣着，四蹄翻起，飞驰而去。我听见枪声突然密集起来，觉得飞弹在身边发出“哧哧”声响。然而，“哧哧弹飞挡不住，枪声渐小杀声稀”，险关闯过去了。我忽然觉得腰酸腿痛，稍为抬

头伸腰，继续纵马迅跑。一堵白墙蓦地迎面挡住去路，我突然醒悟到了营部，急忙松开缰绳，马停了下来。我想下马，但腰酸腿痛，浑身乏力，没有成功。这时，营长与教导员已跑了过来，一边一个抓住我的手臂，浑身打量，异口同声地说：“幸好没有挂彩，是疲劳过度。”扶我下了马。我打起精神，立正，敬礼，传达了巫区长关于出兵包抄的请求。

营长回答说：“好好，我们已整装，列队，待发。”营长先命令两位骑兵尽快与巫区长取得联系，再回马与他在路上相遇，报告最新战况和巫区长的意见。我请求让我骑马带路。教导员说：“你已完成任务，今晚就留营休息，睡营长的床。”

我早晨醒来，人们奔走相告，罪大恶极的匪首曾镜被击伤后自杀。股匪死的死，逃的逃，已溃散了！只是便宜了“反救副总”杨策雄，不知去向。

两个多月后，是一个阴雨黄昏天，在一区一个山村独户人家，来了一个蓬头垢面的人，向户主讨饭吃。户主以热饭佳肴香酒接待。客人吃着，喝着，好不快活！忽然，两手被两人反缚，他腰间插着的快慢制驳壳枪被抽走，几枝枪口对准他胸膛。他就是匪首杨策雄。原来主妇招待他吃喝之前，已派儿子从后门溜出，向土改队报信。不久，杨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英东剿匪战斗，至此以圆满的胜利而告终。

7、“抢粮事件”

在第二次搜山剿匪，打散了曾杨股匪后不久，即1951年

1月的一天黄昏，有一个自称革命老区某山村的村长来区委报信，说附近粮仓被匪帮抢劫，管仓员被绑，库存粮被抢光，主动请求带路去剿匪，以雪耻辱，以报前仇。

许处长找我密谈，说要用怀疑眼光看待他说的话，叫我带他到区府吃饭，同房邻床住宿，进一步摸清他的底细和当时抢粮经过，明晨回来向他详细汇报，再作处理。

当晚，我转弯抹角地查问他的家庭、工作情况和山村群众生活状况。谈着，谈着，他竟在谈话中鼾声大作，进入梦乡去了。

翌晨，我乘他还在熟睡，就回到隔壁区委会，向许处长与于科长汇报昨晚的谈话情况。

许处长果断地说：“来客极可能是曾杨匪首派来的‘诱饵’，伏兵偷袭，我们不能受骗派部队去，先派你空身去侦察如何？在他们诱计未实现前，肯定会平安无事。”我以顺口溜回答：“探明埋伏要持枪，应变周旋心不慌。事发还枪争脱险，完成任务保安康！”

许处长笑了笑，又问：“你现在带枪没有？”“有！”我解开棉衣胸襟，露出驳壳枪。“唔，看不出带枪。”他自言自语道。“你有多少发子弹？”“十零发。”我回答说。

许处长即令身边警卫员说：“给他十多发最好的子弹！”又对我说：“你先回去区府招呼客人吃早饭，然后带他来见我。”

过了一会，许处长对来客说：“姚同志跟你回去察看粮仓情况，你要保证他的安全，并亲自送他回来。”来客拍着

胸膛说：“保证做到，请放心好了。”“那好，会表扬奖励你！”

我跟着他向东北部某山村革命老区进发。一路朔风迎面吹，两边芦荻啸声奇。我有意保持一定距离随后跟着，眼观四方，阔步疾驰，防止突袭。约走了8个小时，来到一个小村，已日薄西山，天色昏黄。我赶上他说：“村长，我脚底起泡疼痛，到前面村里过夜再走吧！”他回答说：“快到家了，我扶你走吧！”“不！我很累又很饿了，走不动了！”他无可奈何只好答应。

我找到驻村土改队员，安排好食宿。等他上床后，我又请来几个老实农民开会，查清了他的底细和前晚匪帮抢粮的情况，并获悉村长等群众也担了粮回家。我终于消除了猜疑，如释重负。

早上醒来，我催他上路，开诚布公地商谈防匪袭击和清账归仓的事。他直言不讳，自己和各户群众都担了粮回家，原因是断了口粮。出于活命，他同意平均每人每月留50斤谷，计至夏收，多余的担入粮仓。留粮数量先作为借贷，经请示批准后，就作为赈济。

我约村长顺路先到粮仓探看。我与管仓员密谈了当晚匪帮抢粮和群众担粮以及损失的情况。我要他清仓登记库存数和损失数；此后还要登记群众借粮数和归仓数，对比实际损失多少，造册给我带回区委、区府审处。

我跟着村长到达山村，举目一望，看见不是茅草房，就是烧剩的颓垣断壁上面盖茅草，满目疮痍，一片狼藉，顿生荒

凉凄惨的感觉！

我跟着村长逐家探望。看见他们衣衫褴褛，睡低矮的木板，盖禾草蓑衣，用烂缸煮食，并获悉他们十有七家是烈士，为革命做出很大贡献，又顿生崇敬热爱之情，并更加痛恨曾杨匪帮的残酷！于是，我改探望与慰问兼施，说明游击队离村入城后，因忙于支前（线）、剿匪、反霸、土改等工作，故没有过问解决大家的生活困难，表示道歉！并保证向上级反映，尽力扶难解困，渡过难关，从而取得了群众的理解与谅解。也有个别群众首先发难，故意奚落说：“同志，你被山蚊叮过多少？”我如实说：“没有！我是来向您们学习的，学习宣传您们的革命牺牲精神，促使发扬光大！”他转讥为喜，紧握我的手说：“原谅我直说，莫怪，莫怪！”我俩相视而笑。

当晚，在布置武装民兵放哨的情况下，召开了全村群众大会。首先，由村长带头诉苦和揭发曾杨匪首抢粮并“赈济饥民”的阴谋。他讲到家人被杀、房屋被烧、牛猪被宰、挨冻受饥、无家可归的动情处，不禁泪流满面，全场应和哭泣，一片悲愤景象！村长收住泪水，悲愤填膺，高举右手，大声呐喊：“决心报仇雪恨，誓与匪帮战斗到底！”他顺便传达了许处长的叮嘱：“要保证姚同志的安全，并护送回区委。”又说：“请姚同志讲话！”他带头鼓掌。

我情真意切地表扬了他们的革命精神和牺牲精神，恭敬地弯腰一鞠躬！并说：“谨向死难烈士一鞠躬！”边说边弯腰。村长带头鼓掌回敬。我又重复了个别慰问时说的话，表示

致歉！同时，宣布上述清账、留粮、归仓，并请示上级作为赈济的事。群众皆大欢喜，一片热烈掌声！

接着，由村长带头自报从粮仓担回多少，应留粮借粮多少，应送回入仓多少，再由群众评定。然后，各户照此自报公议评定。事先已指定人记录、造册，并拟送仓库存查。当场共同商定明天送粮归仓，统一送粮行动。

第四天，村长组织了十多个武装民兵送我回区委。村长坚持要敲锣打鼓送行，我只好勉强同意，但在路上要停锣息鼓，至桥头后才敲打起来，表示报喜送喜就行了。

许处长与于科长给予热情接待。在听取了 my 汇报后，许处长向村长等人说：“谢谢你们对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值得我们表扬学习！决定全村借粮作为赈济，并赠送被帐棉衣等物，每人担回去分送给全村群众，以表示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慰问！”随即交带我进行落实，并安排食宿等事宜。翌晨，他们兴高采烈、敲锣打鼓地回去了。

8、对付散匪

在基本消灭股匪后，驻乡村的土改队员的主要精力，就是集中搞土改和对付散匪了。

我们通过当年的实践，总结出几点经验，作为各乡村打基础和自我保护的参考。

在个别扎根串连中，着重抓好两头：一是逐个审查旧基层和武装民兵。在查清情况的基础上，通过整顿，首先把基层组织和武装民兵掌握在政治可靠的人手中。二是逐个摸清潜在地富反坏和通匪者及其亲属密友的情况。通过阶级分析和具体

分析，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布置根子进行分化瓦解工作，并秘密监视重点打击对象的日常活动。把这两者任务具体落实到人，经常进行检查督促，保证完成任务，并防止发生意外事件。

与此同时，土改队长或队员亲自出马，在召开乡民或村民大会上，对潜在的地富反坏和通匪者提出严厉警告，“约法三章”：不准搞破坏活动，不准造谣惑众或恐吓威胁群众，不准勾结、接济、包庇上山的匪徒，否则，从严处置。如本乡本村出了问题，实行连坐承担责任，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这起到一定震慑作用。如曾发生匪徒在夜间潜入会场，在拔枪瞄准讲话人的瞬间，被坐在侧边潜在“约法”人发现，连忙出面制止，晓以利害，避免了流血事件的发生。

在食宿方面，不固定在一家，三餐轮流。晚上睡眠，一晚一换，甚至一晚住两四处。发现特殊可疑情况，不住根子家，秘密跑到山上靠树而打瞌睡，也便于监视匪徒的活动。

在出入行动方面，坚守严保秘密，有意声南走北，向东折西，来回不走相同的路。在险要地段，独辟蹊径，弯山路走。夜间走路，不亮手电，轻步慢行。走村内栉比房屋的街道，注意靠墙根；在转弯抹角处，先有意原地用力踏步，没有动静后再前进。两人以上同行，各相距十余步，分散走。

在开会时，选择较安全的地方，尽可能保密，布置武装人员放哨。多开小会、短会，少开大会、长会。总之，要时时处处提高警惕性，并以临战防袭的状态，从事各种活动。

在对敌斗争中，要时时处处注意严格区分敌我矛盾，灵

活运用“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这样做了，就往往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门园太乡是一个著名的封建反动堡垒，长期被邓翰香等反动头子把持统治，武装较齐备。仅轻机枪就有8挺，其他长短枪、手榴弹等不计其数。十多岁男孩就学会使枪。该乡土改工作队，经过深入细致的分化瓦解工作，促使受骗上山为匪的贫雇农弃暗投明，登记自新，概不追究，从而使匪首邓翰香陷于孤立无助的境地。同时，发动匪首邓翰香仅有十来岁的小弟，供出其藏匿的山洞。事先定出计谋，由其弟带领大军、土改队、民兵等十余人，静悄悄地包围了洞口。其弟像平常那样入内送饭，邓翰香吃着饭，其弟忽然拔出没有子弹的驳壳枪，指着他说：“不要动！”在匪首喝斥“开什么玩笑”声中，便被冲入洞的几个勇士一下子活捉了。邓翰香为了活命，把埋藏的轻机枪、弹药等武器如实供出，还供出其他匪首的活动规律等。

9、公审大会

1951年2月4日，除夕前二天，区委召开全区公审大会，有万余人参加。

在英东中学附近四周的山上山下，区中队约70人分头持枪站岗放哨警戒。在一座临时架搭的露天台上，挂着“三区公审大会”布质横幅下面，“一”字形排站着五花大绑的12个罪犯，面向台下广大群众，他们每人背后站着全副武装的区中队队员与民兵共二人。台上左侧落座的有许处长、于科长和我，我负责记录。台上前排中间面向台下群众站着的是区长兼法庭庭长巫大杰，逐一宣布罪犯的罪恶事实。罪犯邓尚廉昂头

挺胸，被按下又昂起，背后站着的区中队队员火了，用驳壳枪照额头拍了一下，鲜血淋漓。许处长立即对我说：“你快去制止，不要再打了，群众会有想法的。”我照办了。巫庭长宣读完毕，从桌上拿起毛笔，蘸上红水，在布告上面边打“√”边喊：“立即执行枪决！”全场人头涌动，高呼：“好，好！该杀，该杀！”也有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人潮涌向山上的刑场。不久，行刑枪声响起，连续不断，很快沉寂了下来。

我回到区委、区府后，听到观看行刑的干部传说：“陈国光的头被斩了！”“邓尚廉一身都是刀痕，肠肚流了出来！”“邓翰香的手脚都斩断了！”……我从中获悉，斩陈国光头的人，是五兄弟中被杀剩的一个，提头回去祭奠四兄弟。可见，广大群众对这帮匪寇恨之入骨！

公审大会后，我写了两篇报导：一是《英德三区公审大会纪实》；二是《“剥皮根”的罪恶发家史》。前者被《北江农民报》采用；后者被《南方日报》发表。这是我写的方块字变成铅印的第二、三次。首次是刊登在1948年《平中校刊》上。“剥皮根”是在公审前上吊自杀于牢中。两报先后寄来稿酬，我都写了一封信，将稿酬退了回去。理由为：一是我在办公时间写的；二是给县土委的工作报告。但两报都再次寄回来，附信说：“按规定，是应该发领稿酬的。”可见，那时公私观念截然分明，毫不含糊！

10、划阶级 分田地

1951年约4、5月间，英德三区各乡土改工作陆续转入划

阶级成份，没收，征收，分配田地，分配物资。

（1）划阶级成份

划分阶级成份前，发动干部群众学习掌握划分阶级成份的精神实质。先弄清楚划阶级成份的重大意义，是分清敌、我、友，及其享受不同政治、经济待遇；再弄清楚构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各个阶级成份的主要标准，是生产资料的有无与占有多少的情况，尤其是土地占有与使用（出租、自耕、雇人耕种），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有没有参加主要劳动。每讲过一个阶级的标准后，就联系本村的实例试划，使干群容易理解与掌握。

在此基础上，以村为单位，先划地主、富农，后划雇贫中农。

评地主、富农前，在农协内部作好酝酿准备。边讲边算待划地主的剥削账，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在内部取得一致意见后，就开村民大会，叫地主到场，进行自报公议，展开诉苦、讲理、说法的斗争，防止吊打，使之口服心服。评富农的主要标准，是在其参加主要劳动的前提下，其剥削收入超过总收入25%。先自报，后公议，用摆事实，算剥削，讲道理，说政策，加以最后评定。划雇贫中农成份，一般在农民小组会上进行自报公议评定。

评定各阶级成份后，在村代表会或农协委员会综合审查出第一榜。再召开一次农民小组会，让群众讨论，提不同意见。

在此基础上，以村（较大的村）或以乡为单位，召开乡

农民代表会讨论通过，出第二榜。收集不同意见，评议后，报区政府批准，出第三榜。如有不服者，可申报区法庭调查判处。

（2）没收征收

首先，在乡农民协会领导下，通过群众选举，成立登记保管组与调查组。其次，进行纪律教育，由群众制定若干条公约，如不乱拿东西，不装自己腰包，不违犯政策，不损坏财物等。同时，进行政策教育，使干群明白限于没收地主的田地、耕牛、农具、多余粮食、多余房屋。地主的金银、衣物、家具等不应没收，但可抵交其应赔偿农民的损失（如应交出多余粮食、应退出的地价、牛价）。

在此基础上，组织群众进行没收工作。一般做法是：先没收大地主、恶霸地主，再到一般地主的出租田与公尝田（农村先祖遗留后代子孙共有的田产，有专人管理，其收入用于祭祀先祖，分别定额奖励子孙就读中学、大学等，下同），后征收富农的出租田与公尝田。一面责令地主自报应被没收之财产；一面召开农民协会会员大会与小组会，依法进行清理，并审查其自报数目，展开反隐瞒、反分散与追回田契的合理合法斗争。

对富农、公尝田、学田（农村先祖遗留后代子孙共有的田产，有专人管理，其收入用于分别定额奖励子孙就读大中小学、支付办中小学经费等）的管理人，则可召集开会，宣布政策，令其自动交出应被征收之田地与田契。

在没收地主耕畜、农具、多余粮食、多余房屋时，要开

展反隐瞒、反分散的合理合法斗争。对一般守法小地主，先留后分。对不法的大、中地主与恶霸地主，先全部没收。

对物资的保管，一般统一集中到村农民协会，便于自然村之间的合理调剂分配。同时，选举公正老实负责的雇贫农担任保管。有的村选举三人当保管，每人配一把不同的锁匙，仓库房门用三把不同的锁，三人到齐才能打开。这对防止贪污、偷盗、浪费起到良好作用。

在没收征收的同时，搜查并收缴地主、富农的私藏枪械、弹药。

（3）分配田地 分配物资

首先，召开雇贫农代表会、农代会与小组会，严格掌握分田地、分物资的三大原则：一是满足雇贫农要求；二是利于发展生产；三是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绝对不准采用抽签、抓阄、按户平均分配的办法。关键是组织雇贫农为骨干的评议分配委员会，对干群进行互助互让、团结对敌的思想教育工作，使之树立“天下农民一家亲”的思想与风格。在分配方法上，先分田地，再分耕牛、农具、粮食，一律采用小组自报公议的办法。

分田地的具体办法：一是由村代表会或评议委员会讨论决定分田人口，主要是核实剔除非农业人口；讨论决定如何分田，劳动力及单身汉可多分；指定专人登记田亩，查劳动力情况，在小组会上自报，大家讨论评定。典当田如何计算，也要确定下来。二是确定分配单位。一般是以乡为调剂单位，以村为计算分配单位。也有的以自然村或小组为分配单位的。三是

根据应分田地水平，在原耕基础上抽补调整。多数采用以自然村或小组为单位，连抽带补，在小组会上自报公议评定的办法。少数采用在全村范围内，先由原耕农民将超过应分得数的田地抽出，然后再用自报公议补入的办法。个别采用评委会先征求群众意见，抽补调整好，再依据上述三大分配原则，搭配好各户抽补方案，向群众宣布，由群众提意见、修正、通过的办法。

在分配田地中，根据上述分配三大原则，搞好乡村组之间与富农自耕间的典当田地问题；特别重视搞好山林、鱼塘的分配。一般习惯于全村公用的柴草山，使之有专人管理。对竹木山、冬菇山和鱼塘，一般按产量折田，分给原来善于经营而又需要的人。如面积过大，则由其抽出适当的自耕田作为抵换。

生产资料分配的具体办法：一是耕牛。先评定每条耕牛的劳动能力，再通过自报公议评定。由雇贫农缺牛户自由结组，据田亩多少确定每户分得耕牛的比例，专人管养耕牛，按比例使用。如耕牛少，不够分，可多分地主赔偿的现款去买牛。二是农具、房屋、粮食。都是由雇贫农小组按质定等，再由雇贫农缺少户自报公议，缺啥补啥，多缺多补。犁耙等大农具跟牛走，由分牛户合用；锄头、镰刀等小农具归个人。房屋、粮食，按雇贫农的困难情况，分到户，在小组会上自报公议评定。三是家具、衣物。由雇贫农看物后，自报公议，缺啥补啥。

11、急驰韶关

1951年7月初旬，我参加英德县委扩大干部会议，听取了林名勋书记所作《关于英德县土改初步总结报告》。晚饭后，林书记派警卫员找我去谈话。

首先，询问许处长最近有什么工作设想？

我说，他给中南局写了两个报告。一是提议建神前滩拦河工程，既可发电，又可建成大水库，有利于英东的生产发展。二是建议成立英东办事处，为英德将来分成英东、英西两个县作准备；并建议巫大杰任主任，文光乡坚持地下斗争20多年的党支部书记任副主任，我任秘书。

林书记听后，笑了笑，意味深长地说：“许处长的计划真长远，是很难实现的！不过，你可马上实现当秘书。决定调你上北江地委工作，你意见怎样？”我说：“服从组织安排。但不知什么时候走？”“马上走。”“我工作还没有交代，而且有些衣服用品留在英东，怎么办？”“我已给许处长交代了，材料全留在英东，不会成问题。衣服用品不要了，会发新的给你。你马上去收拾行李来这里，越快越好！”

于是，一辆吉普车载着林书记、警卫员、佟玉文（后成为林妻）和我，向北江岸边驰去。我发觉沿路都有武装在站岗放哨，直至岸边。

我们站在渡船上，船劈波横渡彼岸。我蓦然听林书记说：“今晚月色真好！”我举目望明月，忽有久违的感觉。“许久未观明月夜，尽心追剿逐山游”。此时此月，长印心间，从未消失！

(二) 北江小结

1951年7月上旬，我被调至北江地委办公室工作。林名勋同志原任北江农民协会主任，新任北江地委秘书长兼农协主任。我们仍住在农协会内。“我们”，是包括林、警卫员、佟、邝桂英、韦英杰、我，还有一个忘了姓名。主要任务是讨论总结亲历的土改工作，负责写三个文件，即：土改入手做法，划分阶级成份，乡村农协组织法，指定由我执笔拟稿。之后，都以北江土委办署名的形式，发表在《北江土改通讯》上。

北江地委书记伍晋南莅临看望了我们，并送来一瓶外国奶粉和一盒饼干，作了慰问与鼓励的讲话。

林秘书长给我们以关怀照顾，规定7月份内，上午讨论，下午休息；8月份后，进行全天讨论或工作。

8月，在抗美援朝中，我随伍晋南、林名勋两位领导及两个警卫员，多日分乘两辆吉普车，先后到达帽子峰、莲花山、芙蓉山、皇岗等山脚，接着步行登山，勘察山形地貌，准备在英德截击美蒋军从沿海登陆入侵。上午登山，下午休息。

9月，我又随伍、林首长及两名警卫员，先后两次到曲江县南华寺会见虚云大师。

当时，南华寺作为解放军存放枪械弹药的仓库。我们一进门，即交出枪弹和打火机、火柴等，然后，才引去会见虚云大师。

虚云住在面向正堂大殿右侧中间的一座套房里。内有小天井采光，天井底层距台阶很深，伏着两只大乌龟。天井旁是一间厅堂，接连排着两间卧室，虚云住内间，另一个四五十岁的和尚住外间。来开门的正是此人。

虚云坐在近卧室厅堂有靠背扶手的椅子上，见我们进来了，马上起身相迎。他们可能不是初次见面，没有互相介绍。

林秘书长礼让伍书记坐在隔茶几的另一张靠背扶手的椅子上，与虚云平排，自己坐侧边的单人木凳，我与他平排坐着。两名警卫员则站立在闭着门的两边。

开门的和尚奉上每人一杯浓茶后，就进自己的卧室去了。

虚云大师说：“这是峨眉山送来的上好绿茶，请各位品尝，看味道怎样？”

伍、林首长呷了一口，异口同声地说：“好茶！好茶！”

我感到一股清甘味从喉咙进入肚里，直到下午还有甘味回旋。我一生饮茶，仅此一次为最好。

伍书记问道：“大师，您今年高寿？”

“一百零三岁。”虚云答。

“哎，高寿，高寿！还像九十左右，满面红光，精神奕奕！”

“不敢当，过奖了！”

“我们这次来拜访，是接到周恩来总理的电报，敦请您

上京主持佛教工作。”

虚云沉默不语，思考了片刻，说：“老朽年高体弱，在南华寺住惯了，不想搬迁，恐难从命。”

“周总理是真心实意请您老上中央工作的，请再三权衡利害得失后才作决定吧！我们改日会再来拜访。”伍书记说罢起身，又话锋一转：“天井的两只大乌龟，养了多长时间？”

“几十年了。我来住以前已有了。请不妨行前看看。”虚云起身招呼我们走向天井。

乌龟一大一小，大的体形像大脸盆模样，小的略小一些。

“乌龟这么大，气力怎样？”伍书记问道。

“气力可大了，龟背站两个人不成问题。”

伍书记示意两个警卫员站上去。

“哈哈！气力真大！老姚，你也上去！”那时不管年龄大小，职务高低，在姓的前面一律尊称“老”，或称某同志，很少称职务。

我先踏上一只脚，与龟背上两人互相抱着，乘势用力站了上去。

伍、林首长“哈哈”大笑起来。我们就在笑声中互相握手告别。

过了几天，伍、林首长又偕两名警卫员及我，分乘两辆车同往南华寺会见虚云大师。

虚云一见我们进门，就马上站起身，趋前迎接，比上次

热情多了。

伍书记开口道：“周总理又拍来电报，坚持邀请您上京主持佛教工作。”边说边递去电报稿。

虚云接过电报，认真看着，又边递回电报，边说：“难得周总理的关怀信任。我想过了，从命就是了。”

他们三人就接着商量上京的具体事宜。商定了由虚云定出上京时间后，就由地委派车接虚云到广州，再转乘飞机抵京，此事由地委联系解决。到京后，则由周总理负责接待安排。

伍书记又问：“还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

虚云很快回答：“我本人没有什么要求，只是为南华寺众僧请命，不知是否可以？”看他似早经考虑，成竹在胸。

“请说，什么都可谈。”

“是这样：在三月中旬曲江土改中，寺里二十多名和尚和尼姑庵十多个尼姑，平均每人分到二亩六分田耕种，自食其力，再不能像过去那样收田租过日子了。他们一时不习惯不适应，减少了收入，生活有些困难，政府能否临时帮扶一下？”

“可以，我们回去后马上研究解决。还有什么困难？都请讲。”

“没有了，谢谢关怀和信任！”

伍、林首长先后伸出手，与虚云大师握手告别。虚云大师主动伸手与我握了一下，说：“你很年轻，前途无量！”

“感谢大师的关怀与鼓励！”我激动地回答。

上车后，林秘书长愉快地说：“终于完成了周总理交来的艰巨任务！”“是啊，可以交差了！”我回答说。

10月，我们参加进行内部审干。先由林秘书长作动员，后由各人在小组会上交代家庭状况、社会关系及个人经历。林秘书长自始至终都参与指导。

我交代了有关历史情况后，林秘书长说：“老姚的交代已达到基本清楚的要求。只有征粮划中农计征值得斟酌。因你母亲有劳动力而未参加主要劳动，所以，应划为破产小地主较恰当。”我立即表态同意，小组也通过了。之后，我上函北江地委办公室，表态与地主家庭划清思想界线，并请求将此信转给原籍平远县委审处。

（三）清远漩涡

1951年10月下旬，北江地委召开干部动员大会，批准地专机关干部230人下乡参加土改。除林秘书长与警卫员外，我们5人都名列其中。佟玉文与我被安排到北江地委土改重点——清远县四区（源潭）。

佟玉文安排在地委副书记张根生与地委组织部部长兼清远县委第一书记周明先后蹲点的台前乡工作，我被任命为新龙乡土改工作组组长；不久，又升任为源潭片5个乡的单元副组长，仍兼任新龙乡组长。

1、最初难忘的三件事

在新龙土改入手工作时，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如下三件

事。

一是清查出地主隐藏的一支左轮手枪，配有十余发子弹，区委批准配给我使用。

二是我率领武装民兵二十多人上山搜查暗藏散匪与逃亡地主。民兵队队长温惠一枪命中一头大野猪，重约二百斤。见者有份，枪手优惠先得猪头，其他由每人平均分了。我当然不沾边。

三是在连续搜山无果的情况下，温惠于一天的半夜来报，说发现了两个形迹可疑的人进入某村。我叫他马上分头通知武装民兵集合，自带一条白毛巾备用。我作了动员讲话之后，宣布“约法三章”：（1）一切行动听我指挥；（2）每人左手扎条白毛巾，作为标志，避免误伤；（3）子弹不准上枪膛，进村守纪律，不准拿群众一针一线。

队伍进入该村旁边后，我指挥四面包围埋伏，听候命令。我叫温惠伏在我身边，便于商议联系。

不久，温惠就提出冲进村。我说：“不行！先埋伏侦察，天亮后才见机行事。”过了一会，又提出冲进村，我不同意，他讥我怕死，自称有指挥权，被我制止。我从此怀疑他动机不纯，提高了警惕。天刚黎明，我看见一个老人打开大门，径直走向厕所；不久，又有一个妇女担木桶去挑水，目不旁视。温惠再三提出冲进村，我拒绝了，即令一个个组长接话转述：“就地埋伏，不准妄动！”

我果断地收起左轮枪，要温惠一起进村找村长。他迟疑了一下，不得不跟着我进村。我叫醒村长后，发问：“昨夜有

无陌生人进村？”他摇摇头，说：“没有！我带你去搜查所有柴草房就明白。”我们一间间查过了，什么人也没有。于是，我辞别了村长，叫全体民兵集合，宣布就地解散，各自回家去。

早饭后，先后有三个乡干部异口同声告诉我：“昨夜好险啊！差点闹出大事！”原来，温惠与该村长有世仇，企图借机报复。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并取得区委同意，宣布撤销了温惠民兵队长职务，另任一个忠实可靠的队长。

2、后来难忘的三件事

在划分阶级、没收征收、分配田地、分配物资时，使我难忘的也有三件事。

一是我患胸痛逐步恶化，当地医生疑患胸膜炎或肺结核，出证明给我请假去广州照X光。但刘存国区委书记不同意，要我等待并审批完新龙、秀溪两乡划阶级成份后才去广州。我转告并要求医生给药治疗，但被否决，非先要查明病因不可。这导致我胸痛加剧，连上单车、步行及说话都感疼痛难忍。只能用手压胸，缓步去源潭参加区委汇报会。周明书记参与听汇报，并在会后留我谈话。他诚恳地说：“你情绪低落，说话声音小，是什么原因？”我告知上述情况。“还有什么原因？”“没有了。”“好，我批准你去广州照X光。给假三天行不行？”“行，如顺利，两天就回来了，让我去报告刘书记。”“不用了，我会告诉他。”当天下午，我乘火车到广州堂哥良兴处住宿。翌日，觉得胸痛减轻，但仍不能挺胸。照完X光，医生问清我在搞土改，睡眠很少后，就说：“胸肺很

好，什么病也没有，只是胸神经痛，不用吃药，安睡两天两夜就不痛了。”说也奇怪，一出医院门口，就觉胸痛大减，也能挺胸走路了。可见，精神力量的神奇！当天下午，我回到源潭向刘书记报到后，就回新龙工作去了。

二是省土委巡视组来到新龙乡检查工作，住了几晚。走前告诉我：“划阶级、分田地、分物资，都做得不错。但正如你自己所说，有的村还未能最大满足雇贫农要求。”

翌日，我去向刘书记汇报，还未开口，他就责备说：“你为什么要向省巡视组汇报工作缺点！？”我无言以对。他又讲了一些不满的话，不要我汇报了。

三是有一天清晨，秀溪乡工作组组长叶某，行色匆匆，一见到我就说：“不好了，出事了！”原来，该乡有一位大军韩凤山，住在一户寡妇家，与母女两人通奸，被群众发觉，叫喊捆绑他，打死他！韩跑去别村找到叶，叶把他藏了起来。问我：“怎么办？”我说：“此事，我处理不了。你直接去找刘书记吧！”他说：“我直属你管，不去找别人！”我说：“那好，我就同你一起去找刘书记，但由你汇报。”他答应了。

于是，他向刘书记作了汇报。刘说：“把韩调到最偏僻的山村去，但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我与叶同韩作了谈话，转达了刘的意见，他表态同意。我即叫叶于翌日黎明前，派可靠的人护送韩到一个偏僻的山村去工作。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3、整顿土改队伍

不久，1952年4月中旬，北江地委召开全专区乡组长以上参加的扩干会议。我参加了。北江地委副书记张根生作《北江专区土改试点总结及今后土改运动部署》的报告。广东省土委秘书长赵紫阳也在会上作了《整顿队伍，放手工作》的报告，开展土改整队。

这次北江地委扩干会，是以总结土改试点经验、部署今后土改为内容，以整顿土改队伍为手段，以达到搞好今后土改工作的目的。

这次整顿土改队伍，是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端正土改立场、观点和工作作风为主，也可自觉自动交代放下家庭和个人历史包袱，着重以县委、区委书记为整顿对象，带头“下水”（自我检查批评错误），接受其下属干部揭批和决定是否“上水”（是否通过检讨）；然后，按此方法，与会人员分组逐级展开检讨，人人接受批评通过，从而着重克服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错误思想，大胆放手工作。对于一些犯严重错误，未能通过“上水”的人，按组织管理干部的原则制度酌情处理。

据我所知，县委书记一级“下水”捱整的，有南雄蔡雄，连山成崇正，等等。清远是整县公安局局长许克。

我在讨论会上，再次交代了读初二集体参加三青团，家庭成份在1950年征粮以中农计征，按土改政策，应是破产小地主。我挨了一番批评后，就“上水”了。

散会后，清远四区召开扩干会，全体机关干部和土改队员参加。先由刘存国书记联系本区实际，作了传达报告，

分组讨论后，继由黄超林区长“下水”检查，结果未能“上水”。后分片由正副单元组长检查。刘书记兼任源潭片单元组长，没有带头“下水”，他指定我在单元大会上作检查。我讲完后，首先“放炮”的是韩凤山：“你这个臭知识分子，把我调到深山小村土改，不依靠大军！”举拳冲来喊打，被其他大军拦着、抱着、劝着，而坐在身边的主事人刘书记却一声不哼。我既不能与刘、韩当面争执，也不能当众解释，叶某也只能保持沉默，“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不难想见，只能落得“浸水”的结局。但令人费解的是，凡是开全片大会，刘书记却要我继续主持。而在全区总结大会上，刘书记却宣布给我以行政撤职，降为乡副组长，并给予留团察看一年处分；但又要我主持迎嘴乡全面工作；并发回左轮枪给我使用；而我却从未参加团支部会议听取讨论通过处分。

我思想苦闷，但仍积极工作。几天后，周明书记找我谈话。他诚恳地说：“你主动改报家庭成份，是不应处分的。刘存国先斩后奏，使县委陷于两难境地。为了维护刘的工作威信，只好将错就错，委屈你一下了。一个人既经得起表扬提拔，又受得起委屈处分，才能有大作为。你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党绝不会忘记你的。”我表态遵照执行，就互相握手告别。

在我受处分的同时，还有一批知识分子干部，上至区长，下至乡组长，不是受处分下台，就是被调整为副手（职级不变），全区基本形成以大军挂帅的格局。

我土改所在的迎嘴乡，地处粤汉铁路两边，解放前，几

乎所有男劳力都参与了“飞轮党”偷盗火车上的货物；解放后，土改前，有一个首领带枪上了山，不知去向。因此，迎嘴乡一向被称为“小台湾”。

我带队到迎嘴乡后，在区委领导下，深入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以苦引苦，提高根子的阶级觉悟；同时，调研“飞轮党”、原来基层干部及基干民兵的情况，分别适当对待。我依据毛泽东主席“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把飞轮党的“党首”、“惯犯”与“偶犯”的群众区别开来，宣布自新登记后，仍作贫雇中农看待，从而扩大了阶级队伍。在此基础上，进行挖匪根、断匪粮、追匪踪的工作，并整顿组织一支二十余人的武装民兵，多次搜山抓匪首。很快，把那个匪首抓获，立即送区府关押，免生意外。从此就打开了迎嘴乡局面，发动起群众积极投入土改运动中来。

1952年7月间，我在迎嘴乡划分完阶级成份、没收征收、分配田地、分配物资后，广东省土改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子元带队来调研，对于迎嘴乡分化瓦解飞轮党等土改工作给予肯定，写出调查报告在《华南土改通讯》上发表。

接着，我被区委调至联塘乡搞土改入手工作，仅十多天就打开了局面。

刘存国书记在全区总结土改工作的扩干会上，宣布撤销对我的行政处分，恢复副单元组长职务，留团察看一年改为半年，调十四区（龙颈）安排工作。还有几十人同我一起调去该区搞土改。

4、任十四区调研组组长

1952年8月初旬，清远县委任我为十四区土委调研组第一组长，龙宝贤任第二组长。区委书记是广州作家华嘉，区委委员有黄超林、孟庆云等。

安排我住区委会的卧室，原是姓叶的同志住的，他在二十多天前被冷枪击毙。原床位正对窗口，我把床移至侧边。只求安全，不图凉爽。我是唯物主义者，既不信神，也不怕鬼。

我首到水东乡调研土改入手做法，写出调查报告，并附区委批示，送华嘉书记审批。他阅后，提出修改意见，叫我自己改。我改后，他批示：“同意印发至各乡组参考仿行”。

华嘉还告诉我，他同吃饭同劳动的那家青年妇女，就是他将来创作小说的典型人物，叫我注意观察她的行为细节，经常向他汇报。四年后，我在韶关市新华书店看见他写的《冬去春来》小说，高兴地买了一本，反复阅读了几次，觉得主人公确有那个青年妇女的影子，学到了一些创作技巧。

我也与另一家“二同”，不同住。三餐吃“擂茶粥”，即把鲜茶叶擂烂与一些大米煮成粥，粥稀，茶水多，水面可照到人影。粥带苦涩味，很难吃。吃完不久，就觉得肚子饿，很难受。过了几天，皮带缩小两个眼，身体瘦削了。

8月下旬，我到清远县土委参加区调研组组长会议。晚饭后，我在大院内散步。在几棵大树下，看见张根生、周明两首长各坐在有靠背的木椅上乘凉聊天，各人手上拿着一把葵扇。我趋前与他俩握手问候。周说：“老姚，你这样快就来

了？”我答：“我昨天到，今天参加了调研会。”“啊！原来不是接到调花县的通知。”他看出我满脸愕然模样，就继续说：“李祥麟县长调花县任书记，张政委与我决定调你去搞办公室工作。今上午打电话通知你来报到。你意见怎样？”我说：“服从决定。”周说：“那好，我带你去见李海涛书记。”

李书记住在一座绿树成荫的楼房底层，看见我们进来了，马上起身让座。周说：“张政委与我拟调老姚去花县跟李祥麟搞办公室工作，看你意见怎样？”

李面向我说：“你现在还当单元组长？”我答：“现任十四区土委调研组组长。”“有没有副组长？”“有个第二组长。”“是谁？能否胜任？”“是省府办公厅的龙宝贤，完全能胜任。”“好，我同意。”李面向周说。周起身告辞，我也点头示意，跟着出去了。

我俩回到张根生身边。周告知李同意了，就面向我问：“什么时候动身？”我说：“明天开完会，就回去传达，立即起程。”周说：“那可同吴克一起走。”“好！”我回答。

第三天清晨，我与吴克登上滨江一叶小渔船，向小北江驶去。

吴克闷闷不乐，老是唉声叹气。我也默不出声。过了一会，他忽然说：“你的左轮给我看看。”我拔出给他。他边看边说：“好枪，是‘白金龙’。你从哪里搞来的？”“是从源潭一个地主家挖出来的。”他提枪走向船头。我莫名其妙，也起身跟着。他忽然举枪向天射击。我边抢边说：“请手

下留情，子弹金贵！”回到座位上，他“唉”了一声，说：“老姚，你就好哇，提升了！我降职降权了！一个区委副书记，竟去花县县委当组织干事！唉！”我劝道：“想开些，以革命以身体为重！我没有考虑提不提升问题，就心安理得了。”“你说的也是。舍身打游击都过来了，还计较什么个人利害！不谈了，谈别的吧！”

渔船通过小北江，到达英德连江口，上岸乘火车到广州车站，再坐汽车到平山花县县委会报到。

（四）花县跃起

李祥麟书记、孟丽茹组织部副部长夫妇，带着警卫员和姓赵的团县委书记先抵花县，吴克与我后到。县委食堂把我们当作贵宾招待，另桌吃饭，佳肴美味。李书记边吃边说：

“这种做法不好，特殊化，脱离群众。从下餐起，各自拿个磁盆去食堂打饭。老姚，你通知食堂照此执行。”“好！”我回答。

第二天，召开6个县委常委会议。由驻花县的42军军部民运部部长兼花县县委书记主持，介绍李书记与各位常委互相认识，并要大家向他提临别赠言。大家发言完毕，李书记作简要谈话，顺便介绍我是到县土委办公室工作的，会议就到此结束。

县土委办与县委会各占一幢楼，只有一巷之隔。李书记住另一栋小楼，与县土委办公楼斜对，可大声对话。县委秘书

尹琪兼任县土委办主任。我负责审阅各区汇报，向上汇报联系，并编辑《花县土改通讯》，还有收听电话、刻字印刷、通讯联络等方面的工作人员。一个多月后，尹琪不兼任县土委办主任，宣布我为县土委办负责人，主持全面工作。过了一段时间，调来刁纪文负责编辑《花县土改通讯》，又宣布我为办公组组长，负责办公室全面工作。

1、李祥麟书记的信任

李书记全面审阅各区汇报和我综合向上的汇报，并经常听取我对当前工作的意见。他不论召开哪一级小型干部会或大型全体干部会，或全县农民代表大会，都不用我写报告或讲话草稿，只要我提供综合具体材料和对工作的意见。他自己写个简要提纲，就扼要精辟地娓娓道来。其中心内容突出，大小标题显眼，前后连贯，一气呵成。我全部记录下来，整成文字，送他审阅后，就刊登《花县土改通讯》，用以指导全面工作。更令我惊叹的是，他是安徽芜湖人，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却能用粤语作讲话或作报告！

李书记对我的工作非常信任和支持。交代我说，刊登《花县土改通讯》的文章，自己有把握的，就可以签发。用县委、县土改委、县土委办名义写的批示或按语，就要送他审阅批改。群众来信和各区工作请示，有把握的，也可直接发出。有一次，他下乡去了。我发现第二批土改单元30个乡，在分配土地过程中，发生了某些偏差。我用电话向他汇报了，建议用县委名义发文纠正。他表态同意，叫我认真写，多改几次，就发出去。我写好后，与他联系，要读给他听。他说：

“不用了，你就发出去吧！”文件发出后，我改成文章，题为《花县在分配土地中的一些教训》，寄给《南方日报》，很快就在该报1952年10月23日刊登。他看后，表示很高兴！

李书记还交代，凡写有他名字收的信件，除写“亲收”或信角上有某“O”符号的以外，都可以拆阅。如有私人信件，转给他就行了。若是工作报告，由我自行处理。但凡属有参考价值的报告，我都用县委或县土改委或县土委办的名义写按语，送他阅改后登《花县土改通讯》。

2、土改复查入手做法的争议

1952年11月，广东各地土改工作将告陆续完成，省委派出工作队进驻花县第四区进行土改复查工作试点，以摸索取得经验，部署并指导将铺开各地的土改复查工作。

在该试点进行工作二十多天后，我奉李祥麟书记之命，提前两天去了解情况，然后参加四区区委，听取省委夏处长入手工作总结报告。

在区委讨论报告时，全场寂然，无人开口。夏处长为了打破僵局，指名要我发言。我心直口快，对花费20多天进行“重新扎根串连”提出异议。我认为，要肯定土改成果，经过审查，就要大胆放手依靠基层干部进行工作。话未讲完，就马上受到夏处长截断并斥责：“下车伊始，就咿哩哇啦指责，以此主观主义指导革命，指导工作，无有不失败的！你必须作深刻检讨！”我默不出声，以此抗争。

停了一会，县委常委兼四区区委书记于新立，声色俱厉地说：“我完全赞成老姚的意见！不但把区委以下作为旧基

层，连我也作为旧基层看待！把我一脚踢开。什么都不让我知道，哪有这样工作的！？”

此言一出，像炮弹炸开，全场轰然。区委们七嘴八舌，久积心里的愤气，突然爆发，什么难听的话都倾吐了出来。

“我完全同意老姚的意见。他妈的！老子南征北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竟把老子当作旧基层看待！”“我老子好歹也革命了几年，还把我当作敌人对待！”……

夏处长面红耳赤，气喘吁吁，拿起公文包在桌上拍了一下，大声喊：“散会！”斜眼盯我，指着我的脸，恶狠狠地说：“我要在县委常委会上提出处分你！”昂头而去。

于新立书记在我肩头轻拍了一下，说：“咱俩进卧室去谈。”

我跟他进入房中，房外乱哄哄的，他关上门，让我坐下，他也在对面坐下了。低声说：“闯祸了，你马上骑单车回去，向李书记汇报，让他有思想准备。明天上午开县委常委会议，李书记来电话叫你下午回去。”我说：“好！”就骑单车回去了。

我一五一十向李书记汇报事发经过。他听后说：“好，我会处理，你不要去想了。今晚写个全县近况的综合材料，明天开县委常委会议前交给我。你也列席会议。”

在县委常委会上，夏处长作了土改复查入手做法的汇报，讲得头头是道，眉飞色舞。末了，话锋一转：“但是，县土委办姚良宗，不经调查研究，就给予全面否定，弄得区委开会开不成，严重影响今后工作的开展。我建议给他以纪律处

分！”

李书记接着说：“夏处长做了大量工作，给我们今后土改复查工作做了尝试，我们表示感谢！至于老姚提出不同看法问题，我认为，既然是试点，就应允许有不同声音，请夏处长带回去向省委汇报。谁是谁非，由省委决断，我们县委无权讨论决定。看大家的意见怎样？”个个表态同意，夏处长无可奈何，垂头丧气。会议进入前段工作汇报和讨论后段工作部署。最后，由李书记作总结发言，宣布散会。

散会后，我起草省委试点的调查报告，署名花县土委办公室，送李书记审阅。李阅后，问我：“你写此报告的用意是什么？”我答：“我担心夏处长不如实向省委汇报，想寄去省土委和北江土委。”他说：“可以，但要用你自己的名字。”我便写了一式三份，分别寄呈省、地土委和自存。

不久，省土委对我的调查报告给予肯定，加按语登在《华南土改通讯》上。

《北江土改通讯》率先发表原件。之后，我调去粤北区党委工作，张文才告诉此事的始末。原来，她送审我写的调查报告，张根生书记写个“阅”字，口头交代不要发表，待省土委表态后再作决定。她拿回放在办公桌上，就看病去了。魏兆楼不知内幕，便付印了。张书记看到查询此事，张以实相告，提出是否作更正？张书记说：“算了，一更正，更引人注目，反为不好。”

3、围歼首批空降敌特

1952年12月的一天深夜，美蒋敌特首批空降花县境内。

电话员叶婉萍收到县武装部的通报，拍开我的房门，惊吓得讲不出话来。我安慰说：“莫惊，莫惊！镇定一下，究竟出了什么事？”

我获悉后，交代她坚守岗位，就连忙穿好衣服，从床头提起左轮挂在肩上，跑去拍李书记的房门。他披件棉衣出来，看见我挂支左轮，就问：“老姚，哪里搞来的手枪？”我答：“是清远带过来的。”“啊，我真是兵僚主义！出了什么事？”我告知敌特空降的事。

李书记连忙入内穿好衣服，同我一起急步到县土委办公室。门口已有警卫站岗，县武装部的通讯员安好步话机，将话筒交给他。他与武装部部长交谈后，就说：“好，由我直接指挥。”他不时与进击的部队联系，听取汇报或作指示。我坐在他身边，听候派遣。

清晨5时后，陆续报来搜山情况。“发现目标，好，尽量抓活的！”“注意安全，保护自己！”“好，顽抗就击毙！”李书记先后发出口令。

我们获悉先后击毙了两名敌特。到下午4时，发现有一个敌特躲入山村一户人家的碓房内顽抗。李书记发话：“尽量抓活的，喊话投降！”时间一分一分过去了，敌特非常顽固，死不投降。太阳西照，黄昏逼近，李书记只好下令：“死不投降，就歼灭他！”回报已用手榴弹炸死了。

第三天晚上，林奕龙县长打电话给我，说：“老姚，请你来吃未见过尝过的东西。”我去到他房中。他拿出一块东西给我看，似火柴盒大小，包装精美，一层层剥开，把里面的东

西放在玻璃杯中，冲上开水，马上融化，端给我喝。我呷了一口。他问：“什么味道？”“像新鲜牛肉味。哪里来的？”“就是那晚的战利品呗！还有鸡肉味道的。已经没有了，否则，也给你尝尝。”

又过去了半个月左右，听说逃去广州的两个空降敌特，也被活捉了，县土委办同志都很高兴！

也是1952年12月的一天晚上，有几个军部的干部来到县土委办公室，同我打招呼后，说声借看地图，就走到挂在墙上的中国地图面前，指指点点，细声交谈，时不时侧头看我，很神秘。我好奇地行前去，他们向北指点的手，立即移向西，说：“离西藏多么远啊！”“是啊！”“是啊！”翌日，42军军部撤走了，星期六晚上没有放露天电影了。我心知肚明，他们肯定是北上抗美援朝去了。但只能藏在心里，没有对任何人说。

4、参加集训等待安排

转眼到了1953年4月，花县土改复查工作基本结束。县委组织部忙于调整干部的去留工作。李祥麟书记夫妇请假去安徽芜湖老家探亲。前县长谢光从省党校学习回来休假。他同我说：“李祥麟返乡前告诉我，他将出任粤北行署工商处处长，我任副处长，你任秘书。他有没有跟你说？”“没有！”“你心里有底就行了，要保密。”我答：“你尽管放心好了。”

不久，花县召开全体干部大会，进行土改总结工作，表扬先进，宣布干部去留。调出三百余人到粤北区党委安排工

作。我是其中13个区（科）级干部之一。

我们花县三百余人先到粤北区党委党校集中，与其他县调出的干部约数千人一起参加学习。首先，由粤北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党校校长林名勋作动员报告，动员“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然后，由各县分组讨论。

花县区（科）级干部13人为一个组，除我是南方人外，都是北方南下干部。讨论报告时，“北干”多数意见很大，说什么“野兽尽，良弓藏，猎犬烹”；“自己辛苦种树，别人遮日乘凉”；等等，牢骚满腹，出言不逊。我很少发言，没有牢骚话可说，常被讥为“受益者”，“摘桃人”。

一天晚上，我去拜访林名勋校长。他询长问短，关怀备至。他告诉我，张根生书记已嘱他安排我到粤北区党委办公室工作。他又询问了我所在组的讨论情况，我以实相告。他说：“很好！已达到放包袱，泄不满，轻装前进的目的了。”

五、粤北磨炼

1953年4月下旬，我被调至粤北区党委内部刊物——《粤北通讯》编辑组工作。

此刊，名义上是粤北区党委办公室主编，实际是附属于区党委农村工作部。因为，粤北区党委以农村生产和合作化为中心，由研究科副科长梁蕙兼任编辑组组长，何欣林与我任编辑，张文负责校对与发稿酬，发行工作则由地区邮局负责。约半年后，宣布梁蕙不兼任组长，由我负责。

《粤北通讯》基本出两个版本：以发至区委为主，发至县委为辅；有时发至一般干部，看工作需要而定。

这时，粤北区党委书记是伍晋南，云广英任第二书记兼行署主任，张根生任副书记，主管农村工作。

1953年11月后，张政委（张根生同志的习惯称呼）常带我下乡调研。翌年11月中旬后，云广英任第一书记，主管行署；张根生任第二书记（1955年1月后任第一书记），主管农村生产与合作化，要我兼做他的秘书工作。在他办公室的外间，放了我一张办公桌和一部电话机。他交给我的任务是：

（1）负责起草通知、指示、批示之类的文件。他的报告或讲话，他自己动手，只需我提供具体情况与事例。（2）处理各

县书面报告与各类信件。所有报告信件都允许我先行拆阅，可登《粤北通讯》的，我加批示或按语送审后发出；有参考价值的，转他审阅；否则，一律由我签字存档。（3）提供工作汇报的综合材料。（4）上承下达，接待来访者。（5）跟随他下乡调研。（6）兼任区党委警卫排的政治教员，定期上政治课，甚至曾一度搬去同他们邻屋居住，便于做思想政治工作。

出于工作需要，中央与省委的有关文件，张政委也会批给我阅看。

我为了适应与搞好工作，利用一切时间，先后学习钻研合作化与经营管理、农业生产技术与文秘一类的文件书籍，以增长专业知识，提高工作质量。

农业生产与合作化密不可分，征购粮与反胡风、肃反等临时工作中心，也与之结合进行，难以分割。但为了叙述的方便，姑且分开来表达。

（一）农业合作化

1、互助合作运动

我通过学习，领会到毛泽东主席吸取了苏联办集体农庄的经验教训，把农业合作化作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由之路，并视为防止两极分化，共同富裕的关键，一向抓得很紧很紧。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

议（草案）》，要求遵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

1953年2月，中共中央把上述“草案”改为正式决议公布，要求全国各地普遍试办初级农业合作社。

这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通过总结办社经验，进一步指明引导个体农民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是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

在这年春耕生产中，粤北区在完成土改和去年底建立17881个农业互助组，入组89925户，占总户数17%的基础上，各地进一步发展了互助合作运动，建立健全临时互助组与常年互助组，进行交工换工，解决了生产困难，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为此，到1954年3月，全区农业互助组发展到80294个，参组户占总农户45%。

1953年1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列席了各县县委书记会议，听取了区党委副秘书长郑星燕传达毛主席《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引用孔子“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批评了有些干部“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论述“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要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

当晚散会后，我们一班青年同事相约去韶城建国路一家饭店“吃面条”。翌日起床，我发现不见了笔记本，急忙一路

觅去，结果扑空。怎么办？向机要科报告，还是隐瞒？经思想激烈斗争后，我执笔疾书，报告失落经过，并请求给予处分。

上午10时左右，机要科科长张连奎找我谈话。

首先问：“思想近况怎样？”我说：“准备接受组织任何处分。”他笑着说：“你这种态度很好！但组织决定免于处分。”他拿出笔记本交给我：“是不是这一本？”我喜出望外，边接边道谢。他继续说：“是一个清道工拾到，交给市委办一个同志。这两人都是党员，已交代不得外传。组织上考虑到失密程度不大，你又主动交代，故免于处分。你以后不要再出错了！”

2、试办农业初级社

1953年11月下旬，在粤北区党委书记习从真的领导下，举办全区试办农业合作社干部训练班，决定明年1月试办农业初级社。

1954年1月上旬，粤北区党委决定由农村工作部牵头，从农林水工青妇等单位抽人组成工作队，由副秘书长郑星燕带队，到曲江县一区阳岗、龙岗两个乡试办了阳岗上何社、龙岗上厂社和红星社。这是全区最先办成的三个农业初级社。共计曲江县试办了15个社，各县则试办了1至2个社。全区在春耕前共建起第一批50个农业初级社。初级社不同于互助组，是土地入股，比例分红；耕牛、大农具折价入社，逐步偿还；生产统一经营，劳力统一管理，按劳动工分计报酬。

1954年3月至8月，粤北区党委命我到曲江一区龙岗乡蹲

点，任工作组组长；阳岗乡工作组组长是叶治举。这时，原广东省府副主席方方，因犯“错”化名为陈文芳，带着各一名秘书、炊事员和4名警卫员，到龙岗乡蹲点，常携药箱走村串户，搞社会调查，群众称他为“陈医生”。我受区党委嘱咐，常与他联系，帮助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龙岗乡习惯于单纯种双季稻。我为了改变生产结构，发动了上厂社带头挖塘养鱼，又冬种胡豆。结果，鱼养肥，胡豆长势也好，但因未拌种根瘤菌而不结荚，只能作为绿肥使用。

我又帮助上厂、红星两个社建立健全经营管理制度。实行五天生产计划，包工到组或到人，检查质量后记分，从而改变了过去天天排工，开工打大捞，底分活评，重量轻质的不良状况。同时，进行生产技术改革，比前多犁耙一次，多积肥施肥，试行小科密植，等等。结果，这两个社都增产三成多，起到示范作用。其他常年互助组也因解决了互利问题而得到进一步巩固。

我又与群众一起劳动，改善排灌系统，进行查灭钉螺和消灭血吸虫工作，从而染上慢性血吸虫病。

龙岗乡的老干部杨良忠、杨良招，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与妻子冯汉珍调至韶关师专工作后，仍来校联系叙旧。

1954年9月中旬，粤北区已建立193个农业初级社，分布在106个区和163个乡，占总区数82%，占总乡数8%，计划年底前新办1700个社。全区已建互助组约10万个，基本实现了互

助组化。此外，全区已建401个信用合作社和47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又建起生产供销社1个、生产小组338个。手工业劳动者已有一成以上组织起来了。

3、大办农业初级社

195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认为应基本控制发展，着重于巩固。但到7月底，毛主席在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认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批评“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哪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走快了”，“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主张“必须认真地做好建社以前的准备工作”，“要有全面的规划，还要加强领导”，“使全国农村逐步地完成合作化”。

因此，粤北区党委于1955年3月上旬，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会议，通过总结去年农业合作化与农业生产运动，决定今年合作化与农业生产计划等。在实施中，特别加快了合作化的步伐，计划再三加码。到9月初旬，全区已发展2777个农业社，共78573户，占总农户9.3%。其中，只有164户，占千分之二退社。计划秋前发展至3603个农业初级社。计划今冬明春发展到11000个社，即新建8230个社。同时，老社扩大规模，全区入社农户将达25万户，占全区总户数50%或更多一些。

1955年12月中旬，张根生书记于上午亲拟一个通知，要求全区入社户达到总农户70%。另全区试办农业高级社30个，其中，曲江6个，清远4个，英德3个，仁化、始兴、南雄各2

个，其余10个县和韶关市各1个。他命我组织电话员立即发至各县。这天晚上12时，我又被警卫员叫醒，来到他住所厅里。他正在收听中央广播，示意我坐在他身边。我听到广播说，哪里（忘了地名）办社达100%，哪里也是100%合作化……他关了广播，递给我二页纸的通知，说：“你听到中央广播了。我们今上午发的通知思想右倾了，要求太低了，我再写了一个通知，看你有什么意见？”该通知要求全区入社农户达到100%，全面实现合作化。我一向很敬佩他，心口一致地说：“没有意见。”“好，你马上去叫醒电话员，做好她们的思想工作，漏夜发去各县。”我遵命照办了。

4、大办农业高级社

1956年，粤北各地普遍进行农业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其主要特点是取消土地分红，全按劳动工分分配。同时，进行并社，扩大社的规模工作。到年底止，全区已建起农业高级社3929个，初级社82个，共计4011个，基本实现了农业高级合作化，参社569949户，占全区总户数95.76%。

1956年底，韶关地区也基本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办起高级社864个，21127人入社，占其总人数88%。同时，完成了农村私商的社会主义改造，即：纳入改造的小商贩8842户、12295人，分别占其总户数89.2%、占其总人口数87.02%。全区私营工商业也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全区145户私营工商业全部参加公私合营；私营商业1737户参加公私合营，占总户数八成多；小商贩、手工业者、船工、船民等，基本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

在1956年底，常驻马坝的炮兵师邀请林名勋书记作报告，介绍韶关地区的农业合作化情况。他取得炮师领导同意，由我代劳。这是我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参观炮师环境，印象深刻。全场五千多官兵听了我的有关合作化情况介绍后，师领导也许出于礼节，表示满意并致谢。

据1957年12月下旬统计，全区4885个农业生产高级社中，仍有206个初级社。地委要求明年春耕前转为高级社，同时进行并社，扩大规模，使之全区实现农业高级合作化。

鉴于后期农业合作化的步伐过急过快，工作较粗糙，各地都出现或多或少的农民退社或闹退社，经营管理赶不上生产要求，发生一些混乱现象。为此，1957年2月上旬，韶关地委农村工作部发文提出意见：全区所有农业社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畜牧业、渔业、副业、林业等实行“三包”（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减产处罚的办法；对部分生产较稳定，“三包”基础较好的农业社，可试行包工包产，按产计酬的办法，从而大大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与社员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各项生产的发展。

1957年1月上旬，林名勋书记带领我们十余人，到曲江县樟市群星农业高级社蹲点调查，总结了该社去年在遭受严重旱灾的情况下，仍然获得全面增产增收的经验，如水稻增产31.9%，花生等经济作物增产106.6%，其他粮食作物增产181.5%，副业收入增加3.45倍。我写出题为《群星社的一年》，经林书记修改后，用林名勋署名，先后在《北江通讯》和《南方日报》发表，对全区各业生产与经营管理起到很

大推进作用。

5、两支插曲

这里，有一支插曲值得一唱。我们由此可见，当时上下级关系与领导风采是怎样的。

粤北区召开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之前，即1955年2月下旬，因会议文件多，粤北印刷厂不堪重负。我带了5张盖有粤北区党委大印的空白信笺，到广州找印刷厂付印。跑了三间印刷厂都落空。我问第三间印刷厂属哪个单位管？回答是省教育厅。我灵机一动，借电话打给原粤北区党委副书记、现任省教育厅厅长的梁威林，正好他接电话。我说：“有要事求您帮忙。”他答：“你马上来，我在办公室等你。”

我到达时，工作人员都下班走了。梁厅长说：“无事不登三宝殿。老姚，找我有什么事？”我告知印文件的困难。他说：“这好办。但你要老实回答我提出的问题，行不行？”“行，您说吧！”“我先问你，找到爱人没有？”“没有。”“为什么？”“没有人爱我嘛！”他“哈哈”笑起来，说：“你这就不老实了。要老实回答才行。好！我又问你，某某（姑隐其姓名，下同）很爱你，你为什么不爱她？”我震动了一下，想：不老实回答不行了，他已获悉信息。就回答说：“我嫌她脸大鼻扁，不好看。”他笑得更欢了。“好，算你老实！那末，某某也很爱你，你为什么不爱她？”我回答说：“我嫌她脸皮粗，又不白净。”他又“哈哈”地大笑。笑完，正经地说：“这就是症结所在了。你知道吗？美有两种：一种是外表美，另一种是心灵美。你偏重了外

表美，而忽视了心灵美。你认为对不对？”我表态同意。他又说：“恋爱有个经验，就是胆大，心细，脸皮厚。你是心细，但胆小，脸皮薄。这是你难找意中人的原因所在。是不是？”我也表示同意。他接着说：“好了，愿你早日找到如意爱人！”就拿起笔疾书，写了一张条子递给我，说：“你去找厂长，问题就解决了。”我高兴地起身与他握手告别。

这次党代会结束后，《南方日报》驻粤北记者站约我写报导，我照办了，很快见报。

这里，又有一支插曲值得一唱。我们由此可见，上下级关系与领导风格又是怎样的。

1957年7月上旬，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携秘书、记者等随行人员9人，到曲江县白土农业社搞整社试点工作。试点结束后，由欧阳山等署名，在《南方日报》发表题为《严重的斗争——白土之役速写》的文章。陶铸又在韶关地委、专署直属机关科级以上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由我记录整理，林名勋书记阅改，加上“未经本人审阅”，打印发至各县委，并寄呈省委和陶铸本人。后省委电告：“整理稿与原稿讲话有出入，已发出的全部收回销毁”。

陶铸在韶城期间，有一天，我送文件到招待所找林名勋书记审阅。陶铸看见我就问：“你是不是魏日朗？”林马上回应：“他是我们地委办公室的姚良宗同志。”陶“啊”了一声，伸手同我握了一下。我把文件交给林后，就走了。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吃完午饭后，就去林书记住家，询问陶铸误认的那一幕是怎么回事。原来，陶在白土二十多

天，区委书记魏日朗没有去拜见他，从不过问整社的事，使陶很生气，要魏来面训。如何训斥呢？我就没打听了。只知道，不久，魏调任马坝区委书记。

11月上旬的一天，地委第二书记左铭嘱咐我：明天早餐后，带车到招待所接中央农业部林副部长和秘书去参观南华寺，再到马坝区委吃午饭；马上打电话给魏日朗，要吸取陶铸训斥的教训，做好接待工作：一是亲自汇报；二是准备马坝油粘和以鸡为主的午宴。特别嘱咐我，要全程记录林副部长的谈话，向他一一汇报。

翌日，林副部长要先到曲江县委。由马植田县长汇报。上车后，林副部长获悉马明天就要到花县任书记后，大加赞叹。

我们参观南华寺回到马坝区委会。出迎的是吴思浪区长，使我感到意外，作汇报的也是吴，更使我生疑。我装作去小便，迳直拍魏日朗的房门。果然，魏来开门，并抢先开口，说昨夜迟睡了。我说：“你不按左书记叮嘱办，我很难交差。”他问：“怎么办？”我说：“只好将错就错了。你装作下乡刚回区委，从大门进去，向林副部长道歉并表欢迎。吴讲完后，你作补充汇报。”他表示照办。我又问他：“油粘米和鸡准备了没有？”他答：“都准备了，你放心好了。”

果然，导演成功，林副部长没有看出破绽。但对汇报表示不满，说具体事例太少。尤其对冬种小麦缩手缩脚，试种面积太少，只会算经济账，而不会算政治账：“粮食是宝中宝，是稳定大局的关键嘛！”林副部长总结说。

五年后，我遭厄调连县县委农村部工作，魏日朗调任连山县委副书记。一次，在连县车站相逢。他向我致谢，说：“多谢你保了我过关。”我说：“那是小事，并非原则问题。我一直认为，何必要小题大做呢？！”他点头称是，激动地说：“对对！你说到我心里去了。我一直对迎来送往很反感，有点反潮流精神，应给我表扬才是啊！你说对不对？”我开玩笑说：“不给你处分已够好了。”我俩相视而笑。

（二）农业生产

1953年3月上旬，我还在花县土委办公室工作时，已获悉粤北区党委、行署联合召开粤北区农业生产会议，布置今后工作重点，从土改转到生产上来，组织个体农民开展生产互助运动。

这年4月下旬，我调至粤北区党委工作后，知道区党委已从有关单位抽人组建了一个农业生产指挥部办公室，附属于区党委农村工作部之下，专门领导全区农业生产。我几乎每天都去看电话汇报，以了解掌握情况，加强《粤北通讯》对各地工作的指导性。

8月上旬，发生了曲江县东粉乡与乳源县新民乡因争用陂水而准备械斗，各自组织了百余人参加的事件，粤北区党委以副秘书长郑星燕牵头，协同该两县领导前往该地处理。经过调研和做群众思想工作，终于平息了械斗，并解决了两乡延续70多年的水利纠纷，皆大欢喜。

粤北区党委领导全区农业生产，主要抓三个方面：一是打好生产物质基础，如兴修水利，使之旱涝保收；搞好种、积、制肥工作，并适当使用化肥。二是进行耕作制度改革，如单造改双造，扩大冬种作物等，从而提高复种指数。三是进行生产技术改革，如各地成立技术推广站和建立国营农场，使之起示范与推进技改的作用，并进行农具改造与推广，等等，从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上三者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分清主次，并互相结合进行。

1、打好生产物质基础

（1）兴修水利

主要修建山塘、水库，开圳引水，搞好排灌系统等。如1953年开建连南瑶族自治区南岗和庙坑水利工程，建造曲江县江湾水库，等等。又如1956年，全专区完成了大小水利工程28500多宗，稻田受益面积125万多亩。其中，清远县良洞水库蓄水790万方，灌溉3万亩；英德县金门水库土坝高达32米，为当时全省之最；乐昌县廊田水圳虹吸管长达320米，为当时全专区之冠。

（2）搞好种、积、制肥工作

如在连南、乳源等少数民族地区，建厕所、牛猪栏，以堆积家肥；各地大积沤制绿肥与推广稻秆回田；推广冬种红花子、苕子、萝卜青绿肥；推广适量使用化肥；等等。

2、耕作制度改革

（1）改制概况

据历史资料记载，粤北原有水稻单造田130万亩，占全

区水田总面积33%。按其耕作制度来划分，主要有早禾、大禾、晚禾三大类型。早禾田多分布于连县星子，乐昌坪石、梅花，连山太保，还有新丰、英德一些乡村，共约35万亩，占全区单造田总面积26%；大禾田是以仁化、曲江、乳源、连山永和、乐昌九峰、始兴青化、南雄上龙、付竹、大坪等地居多，共约73万亩，占全区单造田总面积55%；晚禾田主要分列于北江中下游，即清远的清东、清西、清北的围田和英德沿河一带，共约22万亩，占全区单造田总面积19%。

在此三类单造田的地方，也有少数形成了一年两熟甚至一年三熟的优良耕作制度。

构成早禾田、大禾田的原因很多，或因自然条件（主要是水利、气温、土质）所限；或因田地多，劳力少，肥料不足，力不从心；或因以林业、副业为主，把农业置于次要地位；等等。晚禾田形成的主要原因，则是地处低洼，北江于“小满”前后泛滥，暴发山洪灾害，稻田常处于浸淹状态，难以种双造作物。尽管单造田的成因不一，情况复杂，但有一点相同的地方，就是土地利用率很低，耕作较为粗放，增产潜力很大。

单造区乡在陆续完成土改复查，转入以农业生产为中心之后，都或多或少地开展了单改双试验。据单造田较多的连县、乐昌、南雄、连山统计，1955年单改双共82475亩，估算全区单改双共约17万亩。

全区单改双试验，大都获得了成功。

1955年，据乐昌、南雄、始兴、连山的不完全统计，水

稻田单改双共1863.88亩，全年总产9263.5担，亩产497斤，比上年增产50%，比原单造增产21.7%。

1956年，全区单改双共58万多亩，占原单造田面积44%。其中，双季稻382324亩，占改制面积65%；种一稻一杂20万亩，占改制面积35%。在“百年大旱”的袭击下，仍然获得增产。据曲江、乐昌、始兴、连山、连县、连南统计，共单改双208454亩，增产28万担，亩产比单造田增加133斤。仁化单改双36000多亩，增产的有九成半；翁源单改双18000亩，有七八成增了产。

但是，1956年在全区单改双中，仍约有20%比单造田减了产。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约有8000亩没有从实际出发，把不适宜改的也改了；二是约有4000亩错过了季节，加之下肥少，或种子混杂等；三是约有2000亩遭受旱虫灾害。

（2）受挫前进

在全区单改双获得成功的背后，也曾经历过困难和挫折。

连县星子区的改制情况，就可加以说明问题。

1955年，星子单改双2251.91亩，总产量为9007.65担，平均亩产400多斤，与原单造水稻比较，总产略增，而亩产却稍减，劳大利小，事倍功半，当地干群出现思想反复，擂响了“退堂鼓”。当时，县委和区委领导产生思想动摇，打算收缩单改双试验面积。县委书记王文秀给我打电话，要我转达请示时任粤北区党委书记张根生酌定。张书记记我从农业处和连县农业科抽调十多名技术人员到星子调研，提出可否建议，再作

决定。

我们在星子分头走遍了单改双较多的乡村，勘察了自然条件和少收或失收的晚禾标本；又深入与当地干群座谈了解，搞清了早晚造从犁耙田、浸播种到抽穗扬花、收割或失收的一系列整个耕作管理过程及其具体情况；还派人到县气象站收集到星子区和其他区历年逐月的温度、阴晴、雨量、刮风等统计资料；然后，结合水稻的生长特性，进行综合分析，从而作出相应的结论。

我们认为，星子区的平原和丘陵地带的自然条件，包括水土、气温、日照、无霜期、刮寒露风的时间等，都适合于种双季稻。连年晚稻之所以少收或失收的关键，在于当地干群不重视晚稻生产，耕作粗放，管理不善，特别是没有从早造改起，适当提早浸播种和选用中熟种，致使晚稻抽穗扬花未能避过寒露风。因此，1956年的单改双，要先从改变提高干群的思想认识入手，要坚持大改，要从早造改起。围绕“早”（早造惊蛰浸播种，立夏前插完秧；晚造芒种浸播种，立秋前插完秧；两造都选用中熟良种为主），“细”、“多”（一年两熟或三熟）做好文章，并提出一系列精耕细作的技术要求。终于获得了星子区委、连县县委和粤北区党委领导认可，付之实施。

1957年2月中旬，我受韶关地委第一书记林名勋的指派，又从农业处和连县农业科抽调了十多名技术人员到星子总结单改双的经验，刊登在《北江通讯》第167期，加以推广。

1956年，星子单改双获得成功。全年种双季稻16764亩，

比上年扩大64.4%；总产58674担，比上年增产55.13%；平均亩产为475.8斤，比上年增产18.9%，比原单造亩产420斤增长13.2%；同时，种一稻一薯12500亩，总产稻谷37500担，对比上年面积和总产均增加25%；番薯总产15万担，比上年增长66.6%。还推广一年三熟（冬种绿肥为主）25000亩，比上年扩大66.6%。

1957年，星子计划种双季稻26764亩，比上年扩大37.4%；一稻一薯25000亩，比上年扩大31.5%；并适当扩大一年三熟面积。

（3）实事求是

从粤北农业改制成功经验和在挫折教训中不难看出，农业生产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各项目生产之间，存在着各种客观内在的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因素。如果我们加以正确认识并掌握利用其规律的话，那末，就能促进农业生产向前发展；否则，就会被其内在规律所反制，甚至促退农业生产。

具体地说，单改双要具备如下条件：①水利：一般常年不受旱，年降雨量在1300毫米以上；②温度：一般年均温度在摄氏16度以上，4月份平均15度，10月份平均17度以上，全年无霜期不少于250天；③日照：平均每天日照6小时以上；④土质：非属湖洋田、烂漚田、锈水田等，平均每造每亩施肥（优质家栏肥）不少于15担；⑤劳力：平均每个主要劳力负担约5亩双季稻的耕种。凡坚持上述条件的，则改制必成，否则，必败。上述条件不够具备的，改种一稻一杂（含杂粮、马蹄、莽菇等），也可获成功。待改善条件后，再改种双季

稻。有条件的，还应实行“一年三熟”制。

在耕作技术上，坚持从实际出发，适时浸、播、插、管、收，不耽误农时；精耕细作，适当增加犁耙田、耘田除草的次数，及时施肥、除虫、抗旱；科学排灌；选用中熟良种为主，适当搭配早熟良种，尽量不用迟熟种，不断选留优化良种。

与此同时，领导要正确组织指挥，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大力引用先进农业技术，使此三者密切结合，互相促进，也是改制成功必不可缺的条件。

3、农业生产技术改革

粤北各地的水稻生产技术改革，主要有：一是普遍选用良种，把原用迟熟种改为以中熟良种为主，早熟良种次之。二是普遍提早一个节气，即惊蛰前浸播种，随之育好秧。三是小科密植，把原来科距1尺×1尺，改为5×7寸；每科从30余株改为10余株。如曲江马坝等区乡，因此而获亩均增产230多斤。四是科学排灌，普遍从长水深灌，改为视秧苗长势，实行浅水排灌与适时晒田。五是精耕细作。犁耙田和耘田除草，由一次增至二三次，并且多施各种肥料。六是改良农具。如试制推广单车式抽水机、解放式水车、打禾机、五一步犁、双轮双铧犁、中耕器，等等。这些都有利于提高工效，有利于生产。七是及时除虫、抗旱、排涝。如1956年遭受百年大旱，全区13个县受灾，晚造禾370万亩中，有150万亩严重受旱，全年仍获得增产。

连平县官陂乡，1955年由于采取了上述以提早季节和小

科密植为中心的生产技术改革，全乡882亩双季稻，亩均年产量达1013斤，该乡红星农业社则高达1113斤，成为粤北区第一个亩产千斤乡、社。

总之，由于抓了上述三方面的生产改革和发挥了农业社的优越性，1956年全区水稻比1952年增产2万万斤，年产递增4.9%，农民人均收入比1949年增加一倍。1957年全区（今市辖境内）粮食总产达71.23万吨，又比1952年增产25.8%。

1955年3月下旬，粤北各县已完成造林面积32万4400多亩，主要种的是松、杉、油茶、油桐、竹等，完成年任务72.4%。

4、下放乐昌工作的教训

1955年3月，我随粤北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张廷槐下放到乐昌县工作。他任县委第一书记，我任县委办、县委农村部、生产指挥部综合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县委常委、县委农村部部长付南安兼任主任，具体工作交给我去负责完成。

工作伊始，我看到张廷槐书记寝室的外间，是作为办公用的，只有一木桌、二木椅。他身体瘦弱，公务繁重，辛苦极了。我对原主持工作的副主任郑天华说：“是否买一套软沙发给张书记用？你去落实一下。”下午，张书记叫警卫员通知我去房里，问：“这沙发是不是你搞来的？”“是我叫老郑买来的。”他叫我低头看沙发底部，问：“看出问题没有？”

“没有。”他说：“椅底一尘不染，可见是别人正使用着的。夺人所用，必引起不满，怎么能团结人搞好工作呢？你去告诉老郑，从哪里搬来的，就搬回哪里去！”我边应边走。他

说：“且慢！你房里弄到沙发没有？”“没有，就是你上午看见的那三件桌椅。”“好，值得表扬！”我查问老郑，获悉是从两个常委——陈仲舒与付南安房中抽出来的。我马上登门道歉，承担责任，做善后工作。当晚，我感赋题为《一套沙发》七绝两首。其二云：“一番教训记心头，事必亲躬避隐忧。巨祸常从微错始，毋忘众利不私谋。”

这年9月初，我忽接粤北区党委办公室副主任陆一清的信，批评说：“你无组织无纪律，张政委三次要你回来工作，你都置之不理。接信后，立即回来，不得拖延！”我莫名其妙，把信交给张廷槐书记看。回答说：“这由我负责，我没有通知你。因为，我要求留下你工作，张政委只是笑了笑，我以为他同意了。你回去向他解释，我也会打电话给他。还是按原来决定，你先到坪石主持开该片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传达落实县委工作部署后就回去。”

我回到粤北区党委，向张根生书记说：“你三次要我回来工作的事，张廷槐主任没有告诉我。”他忙插话说：“张廷槐打电话告诉我了，是误会，请不要记在心里。”我向陆副主任解释，也回答说：“知道了，是错怪了你，请原谅。”

5、纠正清远割青禾

1955年10月下旬，张书记叫我组织人去清远总结秋收快的经验推广。我一边打电话给农林水单位抽人，一边同清远县委办主任联系。他建议我们到县重点洲心区调研总结。

第二天，我带十多人到清远洲心区。先由县委宣传部部长兼区委书记陈国生汇报，后选择秋收快中慢三个乡调研。我

与三人到收割最快的乡。听取乡党支书汇报后，又按三类分头到村。我留在秋收最快的乡府所在村调研。

夕阳还未下山，田野有人忙于收割，我急步走去。远处传来骂声：“只顾头上乌纱帽，不管我们农民生死。雷公劈死他们！”“对啊！劈得他们断子绝孙，全家死绝！”……我靠田边一看，大吃一惊！所割的禾只有五成熟。我下田同他们谈话，了解情况。他们干脆放下镰刀“罢工”，不割禾了。他们七嘴八舌，越骂越起劲，越骂恶语越多。我从中了解到秋收快的真相。

当晚，我先找队长，后找党支书谈话。党支书交给我区委的电话通知。我说：“记录本借用一下，以后还给你。”就与区委办主任联系，请他通知陈国生书记明早回区商谈工作。

翌晨，陈一见到我，就问：“发现了什么问题？”我说：“普遍割青禾，五成熟也割，是怎么一回事？”他答：“县委指示。”我拿出本子，说：“你看，是你们区委发的通知。”他不接本子，侧头对区委办主任说：“拿出县委的电话通知来。”我接来一查对，除头尾署名不同外，一字不差。我考虑了一下，就说：“我立即去县委。可能回来，也可能回不了。这里的工作由某人负责，请代通知。县委的通知借用一下，乡的记录本请代交回。”

我到县委后，找到县委书记胡明，是在他卧室的外间见面的。我先肯定秋收进度快，做了不少工作。但普遍割青禾，五成熟也割。顺便汇报群众的咒骂。我建议立即停止割青

禾，改为边秋收边冬种，以挽回经济与政治损失。胡明不哼声。我一看手表，还来得及赶到源潭乘火车回韶关，便起身告辞，赶乘汽车去了。

我回到粤北区党委，忙于洗澡、吃晚饭和搜集整理材料。晚7时，我来到张根生书记住房的厅里。他一见到我就发问：“怎么这样快就回来了？”我作了简要汇报。

他听后说：“胡明是搞农村工作出身的，怎么会愚蠢到割青禾？你的看法怎样？”我答：“胡明是全区倒数第二年轻的县委书记，有魄力有干劲，这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弱点。粤北的自然条件，北冷南暖，北多单造禾，南皆双季稻，因而，早造插秧收割都是南快受表扬，北慢挨批评；晚造北中造禾先割，南下造禾迟割，因而北快受表扬，南慢挨批评。胡明从阳山北边调至清远南边工作，深明此理。他为了争先进受表扬，便作出‘割完禾后才冬种’的决定，并推行‘快割有奖，迟割受罚’的措施，强迫区乡执行，因而造成割青禾了。”“啊，原来如此！我还不知道其中奥妙。你有历年上下造收割的统计数字吗？”“有，我带来了。”便随手呈上历年报表。他逐年审阅后，气愤地说：“胡明这个人，工于心计！聪明反为聪明误！你马上回去写个批评通报给我。”他看了一下手表，问：“9时前能交卷吗？”“可以。”我起身走了出去。

我提前交卷，坐着等候。他阅改后，批示：“即用电话发出，并打印发各县。”我问：“我带去清远调研的人，是否通知回来？”他答：“可以回来了。”

6、山区、半山区与平原区的经济调研

1956年3月中旬，林名勋任韶关地委第一书记，左铭任第二书记，李祥麟任地委第一副书记兼韶关专署专员。

林书记对我说：“张政委要带你去省委工作，经我请求，留下来了。你继续担任秘书工作，并任《北江通讯》编辑组组长。”他交代我担任秘书工作的任务，与张政委的嘱咐基本相同。

林书记上任后，即组织地委常委与地委办同志，经过近一年山区、半山区与平原区的经济调研及争论，终于形成了《关于韶关地区发展山区生产的几个问题》的地委文件下发，并召开了全区山区生产会议贯彻。此文件刊1956年12月3日《北江通讯》第124期。此前已打印呈报广东省委。同年12月中旬，《南方日报》全文登载。几天后，省委书记陶铸从北京拍来电报，指令该文件停止执行。同月下旬，《南方日报》寄来稿费，林名勋书记夫妇邀请该文件执笔人：萧少麟副秘书长、蔡思义科长和我，在国民酒家共进晚餐。

该文件之所以夭折，是因为与当时全国全省实行“以粮为主”的生产方针不合。不合在于：该文在论述山区不同于平原与半山区的自然、生产等条件特点的基础上，对于发展山区生产的方针指出：“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地区：一种是现有林木多的林业区，应以林业为主，结合发展农业和农林业的多种经营。一种是现有林木少，农业比重大的地区，应以农业为主，结合发展林业、畜牧业和农林业的多种经营。一种是农林牧副均占有同等重要位置的地区，则应分别以农林并重，农副

并重或农牧并重。”同时，强调：“粮食是开发山区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山区粮食生产总的要求是：大部分地区达到自给，少部分地区应争取少销。”

7、仁化烟竹乡调研

此前，即1956年9月下旬，我带队到仁化县董塘区烟竹乡调研经济状况。

从董塘圩步行至烟竹，约花费7个小时。从平原至半山区再到山区，越行越山，山路被两边森林遮蔽，举头看不见天空。两只画眉在路上翻滚争斗，难分胜负，难解难分。我们边坐下休息，边观看欣赏。这算是山区一景，平时难得一见。

该乡是解放前游击战争老区，一向盛产茶叶、香菇、木耳、油茶等山货。油茶不是矮干开白花的品种，而是干高枝繁、开红花的另一类，一树可收二三百斤茶果，已是很稀少，当地仍以前者为主。近两年办农业初级社以来，贯彻“以粮为主”方针，粮食增了产，而那些山货产量与收入却下降了，并出现荒芜迹象。县粮食局在此处设有征购粮站，有两个管仓员，存有十几万斤稻谷，已开始发霉变质。山高路远，靠人肩挑，难以运出去，成了一个大问题难以解决。

第三天晚上，我要去另一个村开调研会。乡干部竭力阻止，说有虎害。我固执己见，他只好派了两个武装民兵，一前一后护送。爬了一山，又过了一坳，前行的民兵跑回来，急拉我的手向后拖。我站住不动，问：“发生了什么事？”“前面有两只老虎拦路，快跑！”我说：“不要怕，一般老虎不伤人。咬人吃人的老虎只有两种：一是饿虎；二是受过伤的

虎，我要去看看。”就挣脱他的手，转身前行，两个民兵只好持枪上膛跟着。在夜幕下，依稀看见山下路上，有两道蓝光像电筒那样射向对面，对面山腰也有两道蓝光射过来，但看不见虎的形状。不一会，两个民兵就拉着我的手往回走了。这也算是山区一景，平时难得一见。

烟竹调研结束，我带队去仁化县委向邓振华书记汇报。邓是老红军，很稀少了。我谈到解决霉变稻谷的办法是：用以加工米粉运出去，既有利于当地农民养猪，增加收入，又便于外运，少花运费。邓书记说：“我同意，请你签字。”“不，我无权签字。”邓马上吩咐县委办主任打电话给林名勋书记。林接话后，邓来个突然袭击，把话筒递给我，我只好向林书记汇报此事。林书记说：“我同意，你就代我签字。”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8、英德岩洞乡调研

1956年10月上旬，我带队到英德县岩洞乡调研经济状况。

该乡四周石山嶙峋，巉岩起伏，稻田极少，人均不过二分多，旱地分散而细块，种植包粟、高粱为主，过年喜庆才能吃米饭。

解放六年多来，粮食逐年增长，生活改善，猪肥牛壮屋翻新。但是，还有的人吃不饱，穿不暖，衣衫褴褛。脱贫还要多斟酌，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应多发展药材、花生、黄豆等经济作物；多养猪，多养当地一种体型很大、速生快长的特产鸡——英阳鸡，母鸡带护的小鸡，还未生齐毛，已重二三

斤，有一只老公鸡约重10多斤，昂头可啄食八仙桌面的剩菜剩粮；只有这样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农民才能逐步富裕起来。

9、阳山和尚岭调研

1956年10月中旬，我带队调研了阳山县岭背乡和尚岭贫瘠山村的经济状况。

尖削的石山耸伏，环绕村四周。山上草木不生，光秃如和尚头，故名和尚岭。

村人挑水，要爬山过坳，走去四五华里一个山头半腰，有细丝那样的泉水冒出往下滴，人们排队守候约两个小时，才能挑回一担水，供全家食用；以供煮食为主，供用为辅；先洗菜，后洗衣服，再用以煮猪饲料；清洁以毛巾湿水抹身为主，长年极少洗澡；故有“一水用重贵似油”之说。

农业以种包粟、高粱为主。村民点播种子的情景是：“耕地细丘似笠麻，东西南北各开花；杂粮播种几山后，迢望西边出晚霞。”因此，村民都盼望迁至耕作条件较好的地方去生活，迫切要求党与政府支持帮助。

经过近一年调研，形成了关于发展山区生产几个问题的地委文件。此文件的执行虽受省委的干预而夭折了，但经初步贯彻后，却获得各地干群的欢迎。1956年间，乐昌县九峰沿溪山的清代贡品——白毛茶恢复种植了八百亩。该县九峰、坪石等区，发现了约二万四千株栓皮栎树（其剥皮经加工，具有防水、隔热、隔音、不传电等特性的软木），已做好保护与管理的工作，进行采种大量种植。清远县种桑养蚕，已种下桑苗六千亩、育桑苗一千二百亩，可供五万亩桑田种植。1957年间，阳

山县开始大量推广种植“洞冠梨”，该县农艺场已接枝四千多棵，等等。

10、消灭“四害”工作

与1955年进行农业合作化的同时，粤北各地响应中央、省委的号召，积极起来消灭蚊、蝇、老鼠、麻雀“四害”工作。

其中，搞得最好的是乐昌县九峰区歧乐乡歧乐农业社。从1952年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以来，逐步做到了人畜分居，厕所加盖，饮水消毒，天天打扫，户户用公筷，家家有痰盂，人人讲卫生，形成了制度化，当地群众也养成了讲卫生的风气习惯，从而基本消灭了蚊子、苍蝇、臭虫、跳蚤，制止了痢疾、疟疾的发生，对消灭老鼠、麻雀的工作，也做得不错。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结束前，韶关地委第一书记林名勋，因乐昌歧乐消灭“四害”出了名而列席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发言。他说：“消灭‘四害’，歧乐乡是韶关第一。”周总理插话：“是广东第一，又是全国第一。”毛主席插话：“是世界第一。”他回来传达，说得眉飞色舞，高兴极了！他先后两次领队到歧乐乡调查总结经验，在全区积极推广。

（三）粮食统购统销

1953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11月中旬，又作出《关于全国实行

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后来，国家又对棉花、棉布实行统购统销。

1、首次起草区党委指示

1953年12月，粤北区党委书记张根生，命我先到英德调研县委常委之间的意见分歧问题。一天深夜，我回到招待所，警卫员黄佳告诉我，张书记已到，患了感冒，已服药休息，叮嘱明天才汇报。我想起前几夜打冷枪的敌情，便去找找到县委书记兼武装部政委陈遐瓚，议定调来一个班轮流放哨到天亮。这在黎明前被张书记发现，向我查问情况，我如实相告。他以脱离干群、未必安全为由，命我下去撤走警卫。

翌晨，我向张书记汇报县委陈遐瓚书记与任金钟县长之间的意见分歧问题，互有是非，但陈书记的意见较为正确。早餐后，张书记分别找陈任两人谈话，下午开县委常委会议，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初步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团结问题。

第三天，下乡调研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情况，跑了几个区乡，花了几天时间，就乘火车回韶城，叫我起草《粤北区党委关于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指示》。我买了一包“美丽”牌香烟，几乎抽完了，捱到近黎明才完成文稿带回卧室就寝。一觉醒来，不见了文稿。邻床的何欣林说：“是张政委拿走了，吩咐不要吵醒你，让多睡一会。”这使我既感动又感激！

上午下班前，黄佳叫我去见张书记。张抖着我的文稿，说：“你写的稿子还算观点分明，条理清晰。缺点是带有片面性，没有面面俱到。你要认真看哲学书，学好辩证法。我初次

起草的指示，也被首长改得一塌糊涂。你千万不要泄气，多写几回，就好了。你抄好后，再送给我看。”我拿回一页页细看，认真琢磨为什么改，如何改，句斟字酌地研究，学到了不少东西，获益很大。此后，我自觉积极学哲学，学辩证法，学毛选有关文章的写法。我写的文稿逐渐被改得少了。

2、在习书记手下工作

接着，萧少麟副主任、蔡思义副科长和我三人，调到粮食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习从真书记兼任指挥。

习书记规定每周两次向他汇报各县粮食统购统销情况。首由萧汇报，被问得语塞，答不出来，受到一顿训斥。次由蔡汇报，也被问得口哑，受到了批评。第三次由我汇报，对他的提问，也无从回答，但他没有指责，而是指导如何掌握情况。从他二楼住所的厅里走到地下门口，萧对我说：“他对你印象好，今后由你汇报了。”蔡表示赞成。我无话可说，只好勉为其难。每当我觉得电话汇报不详细，就亲自与县联系，搞清楚了情况，再向习汇报，从而避免了上述尴尬的状况发生。

1954年11月中旬，习夫妇北上探亲回来。他夫人在办公室通知我说：“习书记有事找你。”

我来到他住所，厅门大开，他坐在会议台边首先开口，说：“小姚，来，坐，请你吃北京葡萄。”台面一串葡萄又大又黑，光滑闪亮，前所未见。我坐下摘了一个，放进口里，嚼了一下，说：“真甜！”“那就多吃一些。”他答。我问：“习书记，找我有什么事？”“没有什么事，咱俩聊聊。我

来这里工作一年了，下面有什么反映？”我毫无思想准备，在考虑怎样回答。“小姚，照实说，不必有顾虑。”我说：“下面反映您博学多才，做报告长篇大论，引经据典，大开眼界。正因如此，所以，下乡调研少了些，主要靠听汇报指导工作。”“好，说得好。还有呢？”“有人反映，你有时过于严肃，批评人过多。没有了。”他笑了笑，说：“你讲了实话，对我帮助很大。”

过了几天，他夫妇离开韶城，他调任广东省政府计划委员会主任。

3、从化一区的争论

从此，我又跟随在张根生书记身边工作了。

1954年11月下旬，我奉张根生书记之命，带了几个人到从化县一区调研粮食统购统销工作。

几天后，我参加区委会议。区委委员各自汇报工作后，由县委宣传部部长兼一区区委书记陈迟作总结性讲话。他强调继续发动群众，力争粮食统购更大超额。区委们都表态赞成。最后，陈请我提意见。

我说：“目前，全区粮食统购工作出现三种情况：少数乡超额，多数乡完成任务，个别乡任务未完成。全区统计，则略为超额。据此，我认为，当前全区工作应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检查有无购过头粮，避免以后又要返销，劳民伤财；二是对未完成的乡，要检查分析原因，是否任务过重？如过重，则要加以调整，量力而行。如有能力完成而属思想不通的，则要搞通思想，力争完成任务。”

陈提出反对，坚持继续超额。

我摆出两个材料：一是卖过头粮的实例；二是区粮站的市场调查，粮食交易逐圩减少的数字。

陈因此而哑口无言，终于表态按我的意见办理。

我回到粤北区党委，写出调查报告，并以区党委名义写批示，送张书记审阅。张阅改后批：“同意用电话发至各县，并登通讯发至区委。”

4、改进农村领导方法

1954年12月上旬，我随张根生书记到英德县调研乡的领导方法问题。花了五天时间，跑了几个区乡，他最后在英德县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依靠支部领导进行工作是改进当前领导方法的中心环节》。讲了三个问题：一是乡任务重，以互助合作为主的农业生产为中心外，还有许多临时性突击性中心，各部门工作都落到乡去完成，农业社又越办越多，而乡干部人手少，不堪重负。二是怎样克服困难搞好工作，除了县区两级把过去派出工作队的“一揽子”领导方法，改成分战线领导之外，就是代之以加强和依靠农村党支部进行工作的新方法。三是论证这新方法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这个讲话，经我记录整理，并经张书记阅改后，刊登《粤北通讯》，随后被《南方日报》摘要发表。

5、开展粮食“三定”工作

1955年5月下旬，粤北区召开县委书记、县长和农村工作部部长会议，传达华南分局扩大会议精神和讨论布置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及巩固农业社的工作。

会后，粤北区党委决定，以行署财政处牵头，成立粤北粮食“三定”办公室，统管此事。《粤北通讯》也以此为中心进行报导。

首先，全面开展查田定产工作。一般按水利、阳光状况和土质肥瘦分四、五等，在原基础上进行调整，并以常年产量为标准，定出等差，划片并等，化繁为简，并注意调整乡与乡、区与区之间的平衡合理，从而把工作做得又好又快。然后，在查田定产的基础上，进行订购、定销工作，以提高农业社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55年12月2日购粮统计，粤北区只完成全年任务80.7%。原因在于中农卖粮过少，只占任务35%左右。统销问题更大。去年第三、四季销了九千万斤，今年11月底，就销了1亿2千万斤，到12月5日已占统销任务数的39%。

6、“这是自杀政策”

1956年12月上旬，韶关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出席。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布置粮食统购统销工作。

我列席作记录，坐在林名勋书记与赵紫阳书记旁边，仅一个台角之隔。

会议期间，机要员甄立仙用讲义夹送文件给林书记看。林看后，又转给赵看。赵看后，把讲义夹用力拍在台面，生气地说：“这是自杀政策！”林签字后，将讲义夹交甄拿走。

午饭后，我出于好奇，到林书记家中，问明了情况。原来，会前，赵以韶关地委名义，请示中央：“粮食统购统销拟

用包干三年的办法，是否可行？”中央复电不同意，赵因而表示不满。

（四）审查干部历史

1954年12月下旬，粤北区党委成立审干办公室，开展审查干部工作。

1、全盘歪曲我的历史

1955年2月，粤北区党委审干办公室马遇笑找我谈话，要我书面交代历史。我照办了，详见我“一、家境变迁”部分。

当年3月初，马多次找我谈话，多方启发我要老实交代历史问题，并老调重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956年4月初，马写出历史结论初稿给我看。我看了大吃一惊！说我什么：一是1944年参加三青团，担任分队长，并参加平远县三青团集训；二是1947年参加国民党；三是1948年参加征帆社学生反动组织；四是1949年姚良禄被杀与姚良宗有关。

我当即说明，除一向已交代集体参加三青团外，其他都属于子虚乌有；并说明参加县集训的是姚史开，原名张开发，请求重新调查审议。马严厉批评我后，要我写书面交代。接着，我写了一份《申辩书》送上去了。

当年5月21日，马遇笑又找我谈话。批评我对党不忠诚老实，隐瞒历史。我申辩没有这回事。马火了，拍桌子斥责

我。我也火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拍桌子回敬。我气愤地说：“你有什么理由拍我桌子！论资格，我比你老；论官位，我比你高；论能力，我比你强！你算老几！”弄得不欢而散。马遇笑，女，时任粤北气象站副站长，先后借调至粤北区党委、韶关地委审干办公室工作。

翌日，韶关地委副书记李全善找到他寝室外间谈话。说：“你的‘三论’都说得很对，都是事实。但你有没有想过，她是代表组织审查你的？”我回答说：“没有。从这个角度看，是我错了。但代表组织也不能这样不讲道理，不讲实事求是，而态度这样粗暴！”他站在绝对权威的立场，训了我一顿。我只好沉默无言。他最后说：“好了，回去吧！”他没有叫我写书面检讨。

当年6月26日，地委审干办余英虎（韶关林业处副科长）找我谈话。还是以组织权威的姿势，拿出一份结论书给我看，把原来四点改为两点：一是参加三青团，任分队长，并参加县集训；二是参加学生反动组织征帆社。我一如从前，只交代集体参加三青团，其他都加以否定。并重申：参加县集训的是姚史开，原名张开发。

当年12月13日，余写出所谓“正式结论”，重弹上述两点，要我签字。我拒绝了，请求复查复议；并请求写明“未参加国民党”、“姚良禄被杀与姚良宗无关”。

过了10天，余又写出所谓“正式结论”，与上次无异。我依然拒绝签字，而且重提上述两点请求。

2、全面纠正历史结论

1957年5月30日，地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刘延瑞亲自审阅我全部案卷后，作出如下结论：一是参加三青团，但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二是没有参加县三青团集训；三是未参加国民党；四是姚良祿被杀，与姚良宗没有关系；五是征帆社是学生组织，但被反动校长所利用。

我阅后，写了如下意见：

“对于我的历史结论，关于参加三青团，但没有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参加县三青团集训、未参加国民党，以及姚良祿被杀与我没有关系等问题的结论，我同意。

关于‘征帆社’问题的结论，我也基本同意。但说明四点：（1）当时地下党同志陈超贤所领导的‘微光社’，主要活动是出版‘微光壁报’，但壁报内容并没有鼓吹革命，没有鼓吹反对国民党等。当时，同学们不知道陈超贤是地下党同志，只知道他是高春三班的班长，是全校学生会的干事。（2）当时，我们高秋三班的大部分同学（包括‘征帆社’），对‘微光壁报’极力支持同学们谈恋爱有意见，对它获得高中部壁报比赛亚军有意见，认为值不得，并没有涉及政治问题。（3）说‘征帆社’被反动校长所利用，我并不知道有这回事。我是反对校长丘民立的。（4）‘征帆社’6人除在1948年下期出版过一次壁报参加比赛之外，再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什么组织的。姚瑞尹不属于‘征帆社’成员。”

与此同时，我写了一份报告给韶关地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马一品，请求处分审干干部马遇笑与余英虎。马找我谈话，说他们还算文明的，没有动武；他本人经历过“滚石

头”，即躺在地上被翻来覆去地推搡，弄得遍体鳞伤，不是一样过来了？“你心胸要放阔大一些，‘宰相肚里好撑船’嘛！没有什么事情想不开的。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我又口头首次向林名勋书记说了马、余的粗暴，没提给予处分的事。他说：“他们无常识，一意孤行。你也是方有余，而圆不足。今后要引起注意啊！”

3、三番曲折回归真实

然而，好事多磨。8月下旬，地委审干办公室不同意上述结论。于是，派地委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吴国全等二人去平远核查。其结果是：以上四点结论不变，在五之后，加上一句：“与姚良宗无关。”

但是，地委审干办又不同意。于是，在11月上旬，再派地委办李道森等二人去复核。结论同上。

可是，地委审干办还是不同意。于是，又派地委办蔡永臣等二人去查对。这次，蔡二人在上海找到张开发，即姚史开。他早已向顶头组织如实交代清楚参加平远县三青团集训等历史问题，并证明：“姚良宗不是三青团分队长，没有参加县集训。”因此，维持上述结论不变，而且加上两句：“相信本人交代，历史清楚”。

4、审查三年多的原因

我的历史并不复杂，本应不难查清，却花了三年多反复审查才作出历史清楚的结论。

究其原因，主要是时值粤北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和机关内部肃反，深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致使马、余等审干人员及

有关领导的阶级斗争观念高于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偏听偏信了合意的调查材料（如平中训导主任姚泽尹诬我是三青团分队长、参加平远县集训），而坚持拒听拒信与之相反的不合意的调查材料和我被审查人的交代；同时，因我忍受不了委屈，以拍桌子和斥责来回敬，并请求地委常委给审查人员以处分，冒犯了她（他）们的尊严，伤害了她（他）们的感情，便揪住那些合意的调查材料不放，韶关地委审干办公室先后三次否决了地委农村部、地委办公室上报我的历史清楚结论，直至第四次上报才批准。

1953年11月，粤北区党委农村工作部党支部通过我入党，因表兄在台湾任职的社会关系，粤北区党委直属机关党委拖至1954年6月，才批准我为候补党员，候补期为一年。又因审查我历史三年多，所以，我当了四年多候补党员。其中，1957年12月，韶关地委审干办公室终于批准了给我作出“历史清楚”结论，但依然照旧不给我办理转正手续。此时，全国已开展整风反右派斗争，又拖延了半年，到1958年6月，我就被划为右派了。直到1979年3月“右派改正”时，才加以说明：“1955年6月转为正式党员，开始计算党龄。”

5、“你是不是想翻案？”

1957年3月初，我奉命到清远县进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调研。该县县委组织部部长林峰对我说：“对于杨松隐瞒地主家庭成份与伪造历史问题的处理，县委常委有两种意见：一是开除党籍，撤销宣传部部长职务；二是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因意见难以统一，所以，如实并报地委审批。地委批下

来的却是警告处分。除胡明书记（杨的丈夫）外，大家都有意见，请向林名勋书记反映。”

之后，我回到韶关，如实转告。林书记说：“就要开地委常委会议，你在会上汇报。”

我在会议后期照办了。但出乎意外，我还未说完，李全善副书记就气愤地站起身，指点着我说：“你是不是想翻案？”林书记接着说：“老姚是地委常委秘书，听了下面的意见，在常委会上反映，是正常的，不要说得那么重！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无人发言，林书记宣布散会。

坐在我旁边的左铭书记，用卷着的报纸拍了一下我的肩头，说：“我看你思想有问题！”就起身走了。

散会后，我回顾梳理了上述情节后，恍然大悟：此前，地委常委审处杨松的处分，想必也像英德县委常委那样，发生过意见分歧和激烈争论，最终少数服从多数，给杨松以警告处分。林名勋对此有不同意见，耿耿于怀，故他听了我的汇报林峰等大多数县委常委的不满后，就嘱我在地委常委会上反映，而李全善和左铭一听，就敏感地推测是林名勋的旨意，便借题发挥，分别给我扣上“想翻案”和“思想有问题”的大帽子。我当时已感到如此不知不觉地介入了他们的纷争，惹恼了李、左两位地委主要领导，今后前程叵测了！

（五）机关内部肃反

1955年约7月，粤北区党委直属机关开展反胡风学习，主要学习讨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

当年约9月，粤北区党委直属机关开展内部肃反工作。各单位都发有一定数量的“通行证”，只准五人以上集体外出散步，不准个人自由行动。我因负责审批《粤北通讯》发行的责任，所以，发给我一张个人“通行证”，允许单独外出。

粤北区党委农村工作部揪斗何某，因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国民党武工队少尉队员。粤北区党委办公室揪斗陆某，因说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曾认识胡风，怀疑是胡风分子。区党委直属机关共约揪斗六七人，关在一间大房内。机关干部轮流日夜值班看守。

10月上旬的一天晚上，我轮值。无意识地用脚踏在门口陆某睡床的横杠上摇动。他说：“老姚，请你不要摇脚好不好？弄得我睡不着觉。”我答：“好，对不起！我是无意识的习惯动作，请原谅！”

19年后，陆某任韶关地区计委主任，我拜访他，请他帮忙我胞妹玉英的工作调动问题。他爽快地答应了。笑着说：“凭你19年前说的那句‘对不起’、‘请原谅’的话，我就乐于帮忙，因为你一直没有把我当作敌人看待嘛！”结果，玉英从省五建石灰厂调至省饮食服务机械厂工作。

肃反运动后期处理阶段，上述被揪斗的六七人全部放了

出来，回原单位工作。实际上，是落实政策，平了反。

各县区的内部肃反工作，始于1956年6月初，不到一个月就结束了。

这里，还有几支插曲值得一唱，充分反映出张根生书记宽怀大量、知错必改的风格。

1、原南雄县委书记蔡雄，于1952年4月北江土改整队被撤销职务，下放清远县任土改单元组长。翌年7月，清远抽调几百名大军拟往海南岛安排工作，指定蔡雄带队。学习期间，有数十名大军闹事，要寻打华云县长，蔡雄没有出面制止。

此事反映到粤北区党委常委会上。张根生书记询问如何处理？几乎一致认为，蔡又犯地方主义错误，必须严惩。张听后说：“这次不是蔡雄又犯地方主义错误，而是被前次反地方主义整怕了，故不敢出面制止。我认为，应免于处分，另考虑安排工作。请大家复议。”议论结果，一致表示赞成。

2、原连山县委书记成崇正，于1952年4月北江土改整队被撤销职务；之后，又被揭发参加乌军反动组织而判处三年徒刑。

1954年9月，区党委巡视组朱开田等人从连山工作回来汇报说，据县委反映，县公安局清洗牢房时，发现有一块床板头刻有“成崇正”字样的印章，不知是怎么一回事？

张根生书记听后，叫我打电话给粤北行署公安处处长汤光礼，立即派人去调查，看此印与案卷检举的印是否相符？如相符，取得县委同意后，立即放人，使之来区党委组织部安排

工作。结果，成崇正被安排到工商处任副处长。

3、1954年11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我刚出宿舍门口，邝某守候见到我，要我带他去见张政委。他于去年7月内部审干时，因任三青团分队长的历史问题被开除出队，回原籍从化县务农。我说：“我不能带你去见张政委，这是违反纪律的。我在他办公室外间办公，过了半个钟头，你来就行了。”

邝某如约到来，我招呼他就坐，并端上一杯开水，就进去请示张政委：“见不见？”回复说：“见，带他进来。”约过了半个钟头，邝高兴地拿着批条给我看：“金任钦同志：请考虑安排邝××工作。张根生签名。”金是粤北供销社主任。由此可见，张不因邝的历史污点而遗弃。

（六）县省第一次党代会

1、县委落选者的处理

1956年6月上旬，各县（含韶关市）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先后召开，选举县（市）委员和候补委员，讨论制订农业生产计划和巩固发展高级农业社计划及其他相应工作。

原县委委员第一个落选的是连县。连县县委书记王文秀给我打电话，说：“原县委委员翟承烈落选了，请示林书记怎么办？”我转达了。林说：“调来地委组织部安排工作。以后，凡是落选的，都照此办理，不必再问我了。”

接着，乐昌原县委副书记兼县长高光歧落选，何祥书记打来电话，请示如何处理？林书记在批文件，我问他怎么

办？他不耐烦地说：“你真罗唆！已跟你说过了，何必再问？”我说：“高光歧不同于翟承烈，是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啊！”“哎，是呀，你考虑得仔细！以后，即使是县委书记落选，也调来地委组织部安排工作。”

2、省党代会花絮

1956年约8月间，省委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林名勋书记率韶关地区代表团参加。

会议期间，我遵嘱送去乐昌歧乐乡消灭“四害”的材料，并向林书记汇报全区工作近况。

他兴奋地说：“陶铸在会上检查了三次才过关。”我问：“是什么问题？”回答说：“工作中心不突出，这也重要，那也重要，使下面无所适从。”“陶铸怎么过关的？”他回答说：“后来，陶铸找我谈话，说：‘本来，打算你进入省委的，但广东老资格多，等下届吧！’我们就放他过关了。”

（七）巫大杰被安排工作

1956年11月下旬，我与妻子冯汉珍在卧室吃晚饭，房门开着。忽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问：“老姚，吃晚饭啦！”我侧脸循声望去，一个人站在门口，定睛细辨，连忙放下碗筷，边迎边说：“哎，原来是巫大杰同志！请进，请进！”

让他进房坐在靠窗的办公桌边，老冯端上一杯茶。巫谦恭地说：“不敢当，不敢当！打扰了，你俩吃完饭再说

吧！”我答：“吃饱了。有什么事找我？”“落实政策的事，你早已知道了？”“知道。原区级以上干部，即使本人未提出申诉，也要主动复议与落实。”“是这样：我前两天来地委组织部报到，被安排在地区供销社工作。我想请你转告林书记，抽空接见我一下，我有话同他说。”“你想说什么呢？能否先告诉我？”“可以，当然可以。是这样：我被安排当24级干部，太低了；又未恢复党籍，不好工作。”“还有什么要求？”“没有了。”他边说边起身告辞。“不要急，请再坐一下。您住招待所几号房？我明天上午9时左右去找您。”“不用了，你工作忙。你约定时间，我来找你。”“请不要客气，就此一言为定。”他告知房号后，就起身走了。

他的背有点驼，走路有点趔，没有昔日昂头挺胸走路的影子。他当年打游击担任副团长，敢冲敢杀，使敌人胆寒！解放初期，任英德县委委员兼三区区长，曾经是我敬佩的顶头上司，剿灭曾杨两股政治匪帮立了大功。他主要因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被逮捕，被开除出党，并开除出革命队伍。

翌晨上班，我向林书记报告巫大杰来访的始末。林听后感说：“我不见他了。你告诉他，工作还未开始，就提要求，这不好。先把工作搞好再说。”

我如期如实转告了巫大杰。他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好吧，我会去供销社报到工作的。麻烦你了。谢谢！”我话锋一转，询问他回乡务农的情况。获悉他实际耕种很少，主要养母鸭生蛋谋生。谈了一会，我就告辞走了。

（八）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调研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讲话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韶关地委接到此内部文件后，林名勋书记叫我据此精神，带了十多人，先后到英德、清远、佛岗、从化等县调研。

我回来后，到他住所先作简要汇报。他听完后，感慨地说：“我们的干部就是这样，左袋装着‘左’的材料，右袋装着右的材料。上级要‘左’的材料，就从左袋中拿出来，送上去；上级要右的材料，就从右袋中拿出来，送上去；而没有自己从实际情况中调研出来的真实材料及其观点，使上级难以判明是非，作出决断。这既可喜，又可悲！”当时，我感到突然愕然。后来猜想，他可能有感于去年6月间，《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并可能有感于去年12月《关于韶关地区发展山区生产的几个问题》的地委文件的夭折。

接着，我向地委常委和地委办同志汇报后，写成题为《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及其处理情况的调查报告》，刊登在《北江通讯》上；又由地委办副主任李子德用以在各县县委

办主任联席会议上发言，普遍反映良好。

（九）随马甫书记常驻连县

1957年7月底，省委调政法委员会副主任马甫，到韶关地委任第三书记。

同年9月中旬，韶关地委抽调地专直属机关干部1120人，由11名地委委员（含常委）带队，协助17个县（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民主整社运动。

1、马甫书记平易近人

马甫书记因不熟悉农村工作，征得林名勋书记同意，调我跟随他常驻连县，他还兼管连南、连山、阳山的工作。

连县县委安排他住书记楼，我与他邻房。但他为了方便商谈工作，要我搬到他房里，邻床而睡。他很谨慎虚心，无论在机关或在乡村，每次听完工作汇报，就会征求我的看法，共同讨论，取得共识。他在较大型会议上讲话，都要我写出讲稿供参考。他组织性很强，要我定期起草给地委的工作报告，经他阅改后发出。

他真不愧为“老公安”！仅相处几天，就问我：“你左腿关节患风湿病，是不是？”“是，您怎么知道的？”“你平时走路看不出来，下楼就显现出来了；右脚重，左脚轻，准患风湿病所致。”又说：“本来，你胆大心细，记性很好，很适合搞公安工作。但相貌很有特色，容易认出来；夜里又会讲梦话，容易泄露秘密。真是太可惜了！”有一次，我随他到连县

东陂工作，西溪中学一位领导来见他，请他莅校讲话，拒绝了；又请我去讲话，他也代拒绝了。此人走后，他说：“西溪中学没有正校长，只有三个副校长，由他主持校务，彼此闹不团结，所以来邀请到校讲话，以提高自己威信。”他叫我去了解一下，检验此看法对不对。调查证明，他的分析完全符合事实。

16年后，即1973年8月底，我到广州拜访省政法委员会副主任马甫。仿效他释疑方法，我手提一把青菜，从正门通过警卫岗哨，直入省公安厅内。寻遍大院，没有发现适于首长居住的小楼房。我丢了青菜，又从正门出来。我站在附近街上留意观察。从上午11时多直到下午3时多的上下班时段，发现有个街口有较多“红旗”牌小车出入，判定是首长居住地。我循路前往该地，迳直通过岗哨，进入院内，看见一位老太婆从小楼门口出来，我迎上去，问：“马甫同志在家吗？”她答：“他住隔离小楼，你去问一问。”我高兴极了！走前按响门铃，有个老太婆出来开门。我问：“马甫同志在家吗？”答：“他上班去了，也快回来了，你请坐。”她在拣摘蔬菜。我与她聊天。

不久，马甫同志真的回来了。他一眼认出是我，主动同我握手，说：“老姚，好久不见了！你找我有何事？”答：“是请求复职的事。”“好，上楼去谈。”他打开风扇，顿觉凉爽起来。他问：“你带来申诉书没有？”我双手呈上。他翻阅了一下，说：“如果我是韶关地委书记，可以马上批你复职。可是，现在不行，我刚从省政法委调到外事办工

作。我把你的材料加意见转给张铭，请他帮助解决。你去韶关找他，好不好？”“好，太感谢您了！”

说完，看见他夫人从寝室出来。我迎上去，说：“霞飞同志，您好！”她主动与我握手问好，并坐到沙发上去。寒暄了片刻，她儿子回来了。马上张口向父亲要阿尔巴尼亚的足球比赛入场券。马甫说：“已给你一张了，还想要？是不是搞投机倒把？”霞飞听了，说头晕。儿子马上关掉风扇，斜视了我一眼，说：“妈感冒，谁开的风扇？”马甫生气地说：“是我开的！客人来了，能不开风扇？是你妈出来坐在风扇对面。”我很不好意思，忙说：“对不起！对不起！”马上起身告辞。

我在广州逗留了几天，去拜见老首长们。然后，至韶关。一天，在地委院内，看见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张铭正要上车，我叫了声“张专员！”他站在车边与我握手，说：“老姚，你的申诉书我转给组织办了，你找他们去。我就要去党校听批林批孔报告。”由此可见，马甫主任是说到做到了，多么言行一致！多么平易近人！

2、张秀峰讲实话遭厄

在连县县委常委会议上，于新立书记与副书记兼县长张秀峰常发生意见分歧，在12月粮食统购问题上达到了顶峰。

张坚持粮食统购任务太重，农民留粮标准太低，有人均全年口粮仅360斤稻谷左右的生产队，太少了，应用县委名义，写报告给上级直至中央，减轻购粮任务。于不同意。张说：“你不同意，我就用县长名义写。”于说：“我也不同

意。”“那么，我就用我个人名义写总行吧！”于说：“这也不行！你是党员，应服从组织决定。”张火了，擅自离场而去。

会后，马书记叫我去同张谈心，摸清他真实思想是什么？

我与张漫谈了一个晚上。他总是坚持在会上说的，就是心里所想的。“农民口粮太少，怎么有生产积极性？老子是顶呱呱的‘双料工人’（指家庭成份与个人出身），又是响当当的共产党员，为群众谋利益，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向马书记如实汇报后，一天，马书记与我在于书记住房外间围炉烤火。马对于说：“看来，张秀峰需调离连县，才有利于工作。县委中能否提个常委？”于说：“没有合适的人选，还是请地委调人来。”不久，张秀峰被调任韶关地委党校副校长。

后来，据历任连县区委与公社党委书记、县计委主任、副县长、粤北医院党委书记的郭丰茂说，张秀峰因坚持实事求是而先后两次遭厄。

一是1958年冬，任地委党校副校长的张秀峰，到连县巾峰公社检查指导工作。问郭：“你公社晚造水稻亩产多少？”答：“大队报380斤，公社党委分析是450斤，但星子公社上报县650斤，我已向县委表态，我社不会低于星子。”张义正词严地批评说：“你的党性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最后上报3000斤？”郭答：“上面说要跟上形势，不认这个数就过不了关啊！”张气愤地说：“我要写信问省委的领导，为什么要

这样干？”果然，张先后给省委写过两封信，反映虚报浮夸的真实情况。翌年，张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典型，在韶关地委礼堂挨了批判。此后不久，我在韶城看见张，同他打招呼，叫了声：“张县长！”他立即回答说：“我不是县长，现在是曲仁煤矿采购员！”

二是在“文革”期间，任韶关地区革委会生产组组长的张秀峰，到连山县农村检查“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批评了当时学毛著的一些形式主义做法，又竟然捞到一顶“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戴在头上。

张秀峰其人其事，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不同的处理结果。岂不发人深思？

六、反右浪潮

（一）反地方主义

1957年4月27日后，全国各地逐步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韶关地委紧步省委反对古大存、冯白驹地方主义后尘，于1958年1月16日至3月9日，召开了地、县领导参加的扩大会议，进一步开展反地方主义斗争，决定地委第一书记林名勋为专区的地方主义头子。与此同时，地专直属机关也先后开展反地方主义斗争。地委办公室、专区青年团与专区妇联共组成一个临时党支部，先后对关惠明、官健及我进行批判斗争。

批判斗争我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几点：

1、执行地方主义头子林名勋指示，排斥北方领导干部。说什么乐昌县委副书记兼县长高光歧落选后，安排工作不当；对清远县委宣传部部长杨松的处理有意见。

2、污蔑丑化北方领导干部。说什么背后学左铭书记的习惯动作，用右手掌从上而下地边擦嘴边说：“没啥！”又污蔑他在晚上单独谈工作，先打倦了扑克才谈，搞到三更半夜累极

了；代起草报告，要三几次才通过，搞得精疲力竭；等等。就事论理，以上所提都是事实，但不能上纲上线为“污蔑丑化北方领导干部”。背后议论领导干部，则既不严肃，又多少会影响他的威望，是错误的，应引以为诫。

3、污蔑执行干部政策是“用人唯亲”，攻击胡明妻子杨松等。

4、片面农民观点，损害国家利益。说什么大笔一挥，仁化烟竹库存十几万斤稻谷变成米粉；竭力主张国家扶助阳山和尚岭农民迁居。

这对比我上面有关情况叙述，就不难看出，不仅事实有很大出入，甚至是无中生有，小题大做，上纲上线，使我难以接受。

（二）反右派斗争

反地方主义斗争之后，1958年4月，即转入反右派斗争。

对我的批判斗争，除翻炒上述四点外，还增加下面两点新内容。

一是说什么污蔑丑化社会主义。说我的英德岩洞经济调查，是“原则肯定，具体否定”，“污蔑岩洞农民吃不饱，穿不暖，衣衫褴褛”。而把原文“但是”与“有的人”删掉，代之以“农民”，完全歪曲了事实。

二是说什么反对“以粮为主”的生产方针，竭力鼓吹多种经营。这是有意歪曲。我一直认为，要因地制宜发展生

产。一般来说，平原与半山区，应以粮为主，发展多种经营。山区则应在粮食自给或争取少销的前提下，因地制宜，或以林为主，或以农为主，或以农林并举，或以农副并举，发展多种经营。我的本意是为了发展生产，添加社会财富，增长农民收入，与“反对”、“鼓吹”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我对如此歪曲事实、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上纲上线的做法，觉得比哑子吃黄连还要痛苦、委屈啊！在暗地里，在亲人面前，我不知流下了多少难过悲伤的眼泪！我一贯立志革命到底，决心终生为人民服务，在英德土改剿匪，随时有生命危险都不动摇退缩逃跑，怎么会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敌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呢！因此，我也一直被认为态度“顽固”、“抵赖”、“抗拒”！到后来，我看到“同类人”都被清洗出革命队伍，送去英德马口劳动教养。我权衡利害得失，于1958年6月下旬，才无可奈何地违心承认了“在客观上起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效果”，含泪签了字，而从未承认在主观愿望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为了适应我将被降4级、每月减30元的境况，我与妻子冯汉珍商定，说服琼姐让母亲回来照顾小孩，说服玉妹初中毕业后自谋出路。冯早于当年2月，已从地委办公室调至曲江周田中学任副校长；后于5月，因有人写虚假大字报，把老弱的岳母家庭成份“华侨小商”诬为“地主”，又被地委、专署行政科勒令送回原籍梅县隆文独居。

七、劳动改造

（一）在报批前后所见的“大跃进”

在划我右派报批前，即1958年5、6月间，我与余纯仁、杨军奉命借住曲江马坝韶钢宿舍，天天割青沤制绿肥；在批准划我为右派后，即同年7至9月间，被安排到韶关市二公里上官坝砖厂劳动。

在此期间，我们目睹了马坝区政府门前堆土如山的亩产“万斤薯”培育，搭架上落，常用多架电动鼓风机鼓风，又经常淋水，但终归失败。

我们割青沤制的绿肥，是党群、农村战线领导用以培育“万斤薯”呢，还是用于栽培水稻“双龙出海”？结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还亲自参与了砖厂土高炉炼铁，全部成为废品。

我又从《南方日报》报道中，获悉了连县星子区田北水稻亩产6万斤“卫星”上天，后来除连南、韶边少数民族地区外，全韶关专区农村都实现了公社化。

所有这些大跃进事实，都使我感到“山中方七日，世上数千年”，思想震动很大，深感落后于形势发展，又暗持怀疑

态度，心里吃惊于劳动未能改造好思想，越来越赶不上形势要求了。

8月31日，星期天下午，我回曲江乌石探亲（老冯已调回乌石公社工作）后，在返韶城途中，口占七绝《别离》三首。其一云：“天起风云雨电时，床前话别泪牵丝。叮咛万遍言无尽，相约重逢勿再悲。”其二云：“报国无门紧皱眉，黑红颠倒引深思。真金不怯武文火，路远方知马力奇。”其三云：“笛鸣搅动乱心揪，‘喀嚓’声嘶梦碎收。稳坐车厢随疾走，图强奋力乐为牛！”这是我当时真实思想的写照。

（二）在白石坪监督劳动

1958年9月下旬，我正式离开工作五年多的韶关地委大院，同党群战线一些同类分去始兴县附城公社安排到村劳动改造，派我住白石坪村。

我被安排居住一个上吊身亡的孤寡老妇的房间，因她生前炊吃住一体化，弄得该房四壁乌黑。夜间老鼠猖獗，爬上床捣乱，常被惊醒。一次，我伸手向床头响处一抓，竟然抓到一只斤零重的大老鼠，喜出望外，马上起床宰杀烹吃。当时，虽然吃饭不要钱，任吃饱，但只吃蔬菜，少油缺肉，难免会有饥感。

10月下旬，时值秋收大忙，多数青壮年都外出大炼钢铁去了，剩下连排长（农村公社化初期，号召学解放军和学军事化管理，把原来生产队队长、作业组组长分别称为连长、排

长)带领一些青壮年和老弱病残者收割。有些熟透了的稻谷跌落田,老农妇们见了,就说:“天哪,作孽哪!可惜不准养鸡鸭,不然,也不会这样糟蹋!”割禾名为昼夜苦战,其实是在夜间的稻田一角,吊盏汽灯,安排一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右派“五类分子”和青壮劳力在灯下割禾,其他人则躲在暗处睡觉。我常被安排在灯下割禾,连长说:“特别照顾你呢,给你机会劳动改造,争取早摘帽啊!”夜战煮番薯充饥,有些社员吃腻了,就拿起番薯互相摔打,借以取笑玩乐。十分浪费,令人痛惜!

我也常被安排与其他一些“五类分子”参与清厕所,出牛栏粪。有一个地主婆常拿我讥笑:“土改干部也会有今日!嘻嘻!哈哈!”这像一把尖刀刺入我心里那样剧痛!这是一种多么可悲的历史啊!

如此过了约两个月,连排长见我很听话,很老实,肯劳动,毫无怨言,对待我的态度就有了明显改变,调我到大礼堂(开会开膳两用)内一间房子居住,也不特别安排我做苦脏活了,享受到一般社员差不多的劳动待遇了。尤其有些正直的贫农社员,竟然树起一个大拇指,称赞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有文化、有头脑、敢讲实话的聪明仔!”

好景不长。任吃饱的日子只持续了一个月左右,食堂就限量供应了,而且饭量越供越少。到翌年5月,竟然供应粥了,社员们都说吃不饱,意见很大,上山挖黄狗头、搞野菜充饥的人越来越多了,有些水肿病人也开始出现了,终于宣布解散食堂。一直到夏收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我在白石坪劳动期间，妻子冯汉珍、胞妹玉英，先后带着食物来探望我，诸多鼓励，患难见真情啊！

（三）在马坝场强迫改造

1959年10月上旬，我们奉命返抵地委干部畜牧场（设在曲江马坝）报到，接受安排劳动改造。

我们到场第二天，王、陈正副场长就命令集合训话。他俩身配手枪，如临大敌，雄赳赳，气昂昂，厉声呵斥：“你们这班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要自觉摆正位置，一切服从场的指挥，积极劳动改造，争取早日摘帽，重新做人！”

接着，编班。之后，马上由班长（下放干部）发锄头，带去山下整地。分配每人的死任务，需要日夜苦战十四五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午晚饭还在吃，班长和个别下放干部就吼叫：“快吃，快开工！不要借故偷懒！”在劳动中，也常来检查，常责令返工；又不时抓“消极怠工，抗拒改造”的典型批斗。而每月仅配给20斤大米，其中2斤还说是支援了灾区，实配给18斤，怎能吃饱？怎能干如此长时间的劳动？

每个班都配插有下放干部，也要参加劳动。但与右派不同：一是安排种菜等轻劳动，即使安排整地，也不分配死任务，能整多少，算多少，可按时作息；二是可借故检查右派劳动而放松一下，或借口抽烟坐地休息一会儿；三是不用日夜苦战十四五个小时，除有午休外，夜战也是轮值者干到十点钟而已。

在如此境况下，仅过了两个月左右，就招致右派们普遍患了不同程度的水肿病，也有逃跑、自杀、累饿病而死等不正常情况发生。原地委同事余纯仁，就是为了保命而逃跑的，伍明、李淑明等，则属于不正常死亡。余纯仁被抓回场后，绑在人们必经之路的一根柱上示众，晚上又开全场大会，按其跪在地上，接受批斗，送去劳动教养。

我也患了严重水肿病和营养性肝肿大，常拉肚子，每天拉几次，折磨得我面黄肌瘦，精疲力竭，行路打踉，劳动晕倒抢救，险些丧命！从而深感不久于人世，悲痛欲绝。在忍无可忍下，适逢母亲送炒米糠粉来看我。我说：“阿妈，您下次送东西来，顺便带瑶玫姐妹给我看看！”彼此眼眶里都饱含着热泪，却强忍住，不让泪水流出来。

果然，1960年6月10日，端午节，母亲与妻子各抱着一个女儿，带着粽子等来看我。在工地上，大女儿含羞地喊：“爸爸！”我禁不住流下了泪水，伸手搂抱着，在她脸上亲了又亲。母亲与妻子转过脸，拿出手巾，偷偷抹眼泪。我用手背抹去泪水，强装笑容，又亲了二女儿，细声地说：“乖乖！要听话，莫在婆婆妈妈面前哭闹啊！”

幸得韶关地委发现了问题，采取了措施，对水肿病人给予治疗，并加发糠饼，停止了开夜工，保持每天劳动8小时，从而恢复了正常生活管理。同时，王场长病死了，陈副场长出了不正当的两性问题而受处分，所以，调整了领导班子，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工作作风。

（四）在西联摘掉右派帽子

1960年冬，韶关地委干部畜牧场迁至芙蓉山脚——韶关市西联开办，把附近农民吸收进来。成立了基建队，大搞基建。我因患严重水肿病，被调至基建队劳动，修理人力双轮板车，作为关照。我天天携带工具到工地，哪里车坏，就到那里去修理。

此时，政策放宽，允许个人开荒种作物。但只有我一个人响应，开垦二分多地种番薯、蕉芋、野姜、蔬菜等。当时，口占一首七绝《冒雨种番薯》：“政策开明私种薯，开荒整地待天时。劈雷泼雨蛮欢喜，戴笠挥锄不识疲。”这是1961年7月上旬的事。到10月下旬，收成了二百多斤番薯，每晚煮夜宵，自然消除了水肿病，身体也逐步肥壮了起来。

我经过近三年来的生活实践，深刻地感悟到“人强不如形势强，适应环境者生存”的道理，做到了“从干部到右派”的角色转变，决心“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争取良好表现，争取早日被摘掉右派帽子。到1961年9月，果然如愿以偿——被摘掉了右派帽子，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了，十分高兴！

原地委同事陈思平，家庭出身贫农，划右前是中共党员，一向搞肃反审干核心工作，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坚持上诉，请求复议。这次，特来找我“取经”。我说：“这个‘经’，就是一句话：‘适应环境者生存’。能进能退，能屈能伸，方是大丈夫本色。”他取得了“真经”，转变了角色，到1962年9月，他也被摘掉右派帽子。这年冬，我与他在

韶城邂逅相逢，他向我道谢。我说：“你不要感谢我，而要感谢生活！”他连声说：“对对，对对！哈哈！”他大笑了起来！

1961年12月，我搭乘陈迟的货车出韶城，共坐车头位置。我问他：“你还认识我吗？”“你是姚良宗，化灰也认得。”“为什么？”他反问：“你还记得我俩在从化一区的争论吗？”“记得。那是1954年11月下旬的事。”他说：“你的记性真好！我这个人素有雄心壮志，非常自负。别人说我是‘从化少壮派’，我也认同。但那次同你争论后，觉得你年纪比我轻，而看问题却比我深又准，受了很大震动！你从此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答：“‘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我不堪回首当年啊！”他说：“讲得好，我也有同感！可不是吗？我养蜂几年，统率了几百万大军，比前只管几万或三十几万人强多了，夫复何求？！”我心里震动了一下，想：这岂非阿Q精神和“适者生存”原理的反映吗？难怪他度过了挨整受处分的艰难岁月。

陈迟，解放前打游击；解放后，历任从化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部长、县委副书记，年仅三十岁左右。因在1959年响应党的“交心”号召，真心地交出严重问题，而被作为地专直属机关的典型批斗，后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下放地委畜牧场劳动，进山养蜜蜂。我俩进行上述对话时，他出任副场长还不久。

八、出山入场

（一）我的心跌了下来

1962年2月中旬，我到韶关专区人事局报到。工作人员和气地说：“朱厚芳局长开会前交代，要同你谈话。请你随便翻看报纸等她吧！”

朱局长开会回来，就主动同我握手，热情地说：“老姚，你身体胖了，健壮了，我很高兴！你对工作的安排，有什么想法？”我答：“服从组织决定。”“好，很好！现有四个县的县委书记：连县张廷槐、曲江李凌冰、南雄刘存国、翁源刘国安，都要你去工作，你看去哪个县好？”我立即想到去连县，却反问她：“你意见呢？”“我意见，还是去连县较好。因为，张廷槐同志对你很了解。”“好，我同意！”

“还有什么要求？”“没有了。”她交代工作人员写行政介绍信。我拿来一看，心跌了下来！因为，在“政治面目”一栏写着：“摘帽右派”！我推测，这绝非工作人员的偶然创作，而是来自上级的政策规定。

（二）鞠躬尽瘁愿为牛

第三天，我们带着简单行李，乘汽车抵达连县县委组织部报到。安排我和苏秉鑑（原地委统战部部长，也是“摘帽右派”）住县委红楼招待所二楼，其他三个“摘帽右派”则住大楼招待所。他们笑着说：“你俩当过领导的，待遇就不同。”我心想：“摘帽右派”的待遇，还是相同的。

当天吃完晚饭，苏邀我一起去拜见地委常委、副专员兼县委书记张廷槐。张热情接待，主动询问我俩想干什么工作？苏说：“想去连州中学教书。”我说：“我也想去连州中学教书。”张回答说：“老苏是教书出身，可以去连州中学教书。老姚没有教书经验，还是去农村部工作为好。”我刚想阐述不合适的理由，适逢有人进来，我俩就起身告辞了。翌日黄昏，我又去找张诉说，不料他到地委开会去了。

过了几天，组织部通知老苏去连州中学当教师，通知我到县委农村部工作。我请求改派去任何一间中学教书都行。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尚忠说：“这是张廷槐书记吩咐的，我们无权改变，等他回来后再说吧！”

我回到红楼，心烦意乱。两种思想在脑里激烈地斗争着：一是觉得“摘帽右派”不适宜在党委机关工作，何苦去冒政治风险呢？二是觉得这是个人打算，既违反自己参加革命的初衷，又辜负了张书记的信任。

我在骑楼漫步，眺望田野，漫天遍地，微雨霏霏，烟雾溟濛。披着蓑衣的农民们忙于犁耙田，驶牛的吆喝声，此起

彼伏。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在脑际盘旋；大院内，围墙外，梧桐、枫树脱尽了树叶，光秃秃的枝桠在空中摇曳；一棵老而大的榕树，枝繁叶茂，欣欣向荣；更令人神往的是，苍松翠竹，长年坚韧挺拔，神采奕奕。蓦然忆起三年前离开韶关地委大院的情景，时值秋天，风雨交加，一片萧瑟。一首七律《复出——凭栏眺望》，便在脑中跃出：“别时风雨入高楼，飘洒沾襟岂觉愁？梧弱怯凉黄叶落，枫强耐冷赤枝头。劲松韧拔精神在，柔李萧疏魅力休。易逝华年心未老，鞠躬尽瘁愿为牛！”于是，我摒除杂念，下定决心，克服困难，终于到县委农村部工作去了。

之后，我把这首七律诗，先后寄呈林名勋、李祥麟、张根生、张廷槐等老首长阅正，以明心迹。

（三）农业生产力调研

1962年2月下旬，我随县委副书记李明，到西江公社朱岗大队调研农业生产力情况。

调查证明，农业生产力破坏严重。据老农反映，其主要表现如下。

1、田地肥沃变瘦瘠。脚踩入田，拔脚一看，见原来泥不黏脚变成黏脚；原感泥软滑溜变成硬涩阻；原感泥深齐腿肚变成只齐腿下部，看见原来泥色乌黑变成黄褐色。因此，水稻亩产下降四五成。

2、原来山林郁郁苍苍，树冠蔽日，看不见山土；如今山

林砍光，山土暴露，活像和尚头；原来下大雨难见水流，流出的都是清水；如今下中雨都见满山四泻，泻出的是浊水；下大雨则水泻夹泥，泻水混浊得很。

3、水利失修，水量变少，水质混浊；河溪圳一遇较长时间天旱，就断流缺水。

4、耕牛减少，瘦弱多毛，行路不稳。

5、大农具，如水车、辘轴、犁、耙等缺少，不够用。

广大干群认为，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政策出错，措施失当。广大干群之所以敢讲真心话，是由于贯彻了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集中统一的结果。其具体原因如下：

一是大跃进大调劳力，大炼钢铁，大砍山林，荒工废业，劳民伤财。

二是公社化一平二调，大办食堂，统吃大锅饭，不准私人养禽畜，而集体又未办好禽畜场，未种好绿肥，无暇割青制肥，致使下田的肥料大减，严重破坏地力；耕牛未养好，大农具未管好，生产力受到破坏。

三是前三年经济困难，粮食连年减产，口粮锐减，受饥挨饿，水肿病人多，乏力劳动，加之未搞好经营管理，进一步影响了社员劳动积极性。

以上情况，都有具体数字和实际例子，写成调查报告，经县委李明副书记阅改，刊登在《连县通讯》上。李明说：

“我是黄河边上人，1958年家乡引黄河水改种水稻，土质变成

碱性，草木不生，损失可大呢！”

怎样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力呢？调查报告提出，现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基本解决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干部的浮夸风、命令风和特殊化；恢复自留地制度，有利于社员自行安排生产与生活，为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力打下基础，从而提出有关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多项措施。

1、恢复提高地力是当务之急。主要措施是：（1）养好耕牛。这既提高牛力，利于深耕，利于积肥，又有利于恢复地力。（2）养好猪。猪多肥多，肥质好。（3）养好三鸟（鸡、鸭、鹅），也可积肥。（4）管好人粪尿和杂肥。（5）冬种绿肥和稻秆回田。（6）积沤制绿肥。

2、明确山权，划分自留山，大力开展造林、育林的群众运动。同时，专人管理山林，提高造林成活率，制止乱砍滥伐山林。

3、兴修水利，专人负责管理。

4、搞好经营管理，定额计分，包工到组到人，提高社员劳动积极性。比如，耕牛包养到户，实行“五包一奖”制度（包饲料、包工分、包成本、包体重、包肥料和定期评比奖励）。对新生小牛，可大部或全部奖给养牛户，成长后折价归队或自行出售。养猪，实行以私养为主、公私并举的方针，公养猪也可包养到户到人。生猪完成派购任务后，允许自留肉自由上市。

实践证明，以上措施，有利于恢复提高农业生产力。如星子1958年实现大公社化后，体制几经变动，农业生产受到严

重挫折。1956年水稻亩产475.8斤，1961年下降为221.5斤，直到1976年才恢复到1956年水平，1985年跃为784.1斤，比1956年增长64.9%；1995年增长为935斤，比1956年增长75.4%。当然，其水稻增产的原因很多，地力提高只是其中之一，改进生产技术，如改良种子，合理施肥与排灌，精耕细作，除虫抗旱，等等，也有很大关系。

（四）调查纠正单干风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席在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讲话，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批判了“单干风”（包产到户）和“翻案风”。

这年10月上旬，县委农村部部长钟基年，带了十多人进驻瑶安公社清源大队纠正单干风。仿效土改发动群众的做法，一面召集大队党支部与大队干部开会，一面深入群众开会，并个别扎根串连，访贫问苦，进行“三同”（同住、同吃、同劳动）；在两会上和个别谈话中，大讲集体生产优越性，大批单干的坏处，启发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然而，广大干群一面点头称是，一面否认搞单干。只承认包产到户，包交公购粮，包上调公社、大队与生产队粮。生产从播种到收割，都以户为单位，换工互助，老弱病残者不“三包”（包工、包产、包上调），鳏寡孤独者适当照顾。向广大干群宣传中央政

策，不准包工包产包上调到户，要收归集体统一经营。他们对此口头答应，实际按兵不动，要求明年开始改正。到10月底，大部分人撤走，只留下4人驻守工作，直到12月底，还是劳而无功，不得不撤离。由此可见，违背群众意愿的事，难以办成。

11月底，老冯携三个女儿及阿妈的户口、粮食关系，从曲江转来连县，她被安排到县妇联工作。

（五）健全经营管理工作

1、解决重工分轻质量偏向

在不准包产到户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情况下，怎样纠正社员重工分轻质量的偏向呢？

1962年5、6月间，县委农村部派我们在附城公社协民大队进行“固定地段，包工到组到人，评比奖励”的田间管理责任制（简称“评比奖励”责任制）的试点工作。

这种“评比奖励”责任制，是把插秧后至收割前一段田间管理工作，包工到组到人。具体做法如下。

（1）组织好作业组

凡10个劳力以上的生产队，都应按劳力、田地、耕种习惯等情况，组织若干个常年作业组，每组一般有五六个或七八个劳力即可。

作业组的作用是：①保证按时按质完成本组包工任务；②组织协作，保证组内各人包工任务的完成；③负责安排被队

临时调出的人的包工任务。

作业组组长的任务是：①具体安排本组社员的农活；②协助队长检查验收本组社员的工作质量；③搞好组内评工记分工作。田间管理工作中，查苗补苗、中耕耘田、除草除稗、小量除虫等工作，按定额工分，一次连续包工到个人，不用组内评工记分。

（2）划分好管理地段

管理地段按照能参加田间管理的劳力进行划分，不能按人口划分。各种专业人员可少分或不分。生产队干部按同等劳力的七八成负担管理地段。对困难户（如有病、体弱、家务多等）可少分。管理地段由队分到组，再由组分到人。注意做到各组之间的平衡合理，操作方便，有利于生产队统一安排生产。

（3）严格执行评比奖励制度

评比检查验收的方法有二：一是日常的检查验收，主要由队长或组长检查工作质量，社员互相监督，偷工者，责令返工；二是生产告一段落，由队长牵头，组织群众性评比，兑现奖罚工分。

（4）实行责任制的成效

实行“评比奖励”责任制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一是充分挖掘出社会劳动潜力，全家老少都投入工作，普遍增加了二三成出勤人数。二是社员早出晚归，普遍提高了劳动效率，提早了三四天完成中耕耘田。三是实行有奖有罚，提高了田间管理工作质量。四是健全了定额管理，提高了经营管理水平，有

效地克服了死分死记、按时记分、按人头记分的平均主义现象，更好地体现了按劳计酬的原则。五是减少了队组干部派工喊工的事务，从而促进他们更好地参加劳动，进一步密切了干群关系。总的来说，克服了多年来难以解决的社员重工分、轻质量的不良现象，减少了彼此矛盾，加强了团结共事。

这种“评比奖励”责任制，由点到面地在全县开展起来，受到广大干群的欢迎。

2、只有躺着不说话

在协民试点工作期间，一天下午，乌天黑地，雷鸣电闪，狂风暴雨。我与叶英祥被困在大队办公室聊天。

他讲起1958年大跃进的往事，感慨万千。

那年春耕，他在协民驻队。因竭力反对水稻插秧推行小科密植——“双龙出海”，所以受到批斗，撤销工作，下放劳动。他同农民一起，种下的多穗高粱与两造花生，则取得了成功。之后，获得平反，恢复了工作。

今年2月，他听了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传达后，在讨论会上说：“我是工人出身，‘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当即受到几个人批评。他对此很反感，叹息地说：

“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做人了！右不是，‘左’也不是。‘稳坐’更不是，今后只有躺着不说话了！哈哈！”他苦笑了一下，却引得我“哈哈”大笑。突然，我想起唐朝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乃在笔记本上疾书，仿作《心声》而赠之：

“多穗高粱似迭台，花生两造众心开。‘双龙出海’归何处？前度叶郎今又来！”他看后，开玩笑地说：“你不怕我揭

发出来，重新戴上右派帽子吗？”“哈哈！”“哈哈”！我俩大笑了起来，我心里却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3、解决公私关系矛盾

各公社生产队中，普遍存在公私关系矛盾。严重的如麻步公社滑塘大队，因多数生产队未搞好经营管理，集体生产未搞好，使社员失去信心，所以，自寻出路，大力开荒种植，导致公私生产争农时、争劳力、争肥料的现象非常突出，公私经济收入为七三开。“过犹不及”，使拥有优势资源的集体生产进一步衰退，吃亏的到底还是社员自己。

由此可见，解决公私关系矛盾的关键，主要在于搞好经营管理，搞好集体生产，使人心归集体；其次，才是兼顾搞好社员自留地生产和家庭副业，做到两条腿走路，防止跛行。

怎样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矛盾呢？1963年3、4月间，县委农村部选择龙坪公社龙坪大队作为重点，先行一步，取得经验，推广全县。

首先，根据各生产队的不同情况，有重点有步骤地健全各项经营管理制度，推动搞好集体生产。如分别执行全年、两造或三造，每季、每月、每十天的生产计划，建立健全作业组，包工到组到人，按定额计分，减少评工记分，坚决杜绝天天排工、喊工、打大捞、底分死记的现象。

其次，建立健全定勤、定工分、定肥料制度，保证集体生产需要，正确调节公私关系。这是一项基本制度，必须认真搞好。

定勤。根据全年生产计划的需要和社员的实际能力而

定，做到切实可行。一般60岁以下的成年男劳力定300天左右，50岁以下的成年女劳力定240天左右。对一些有特殊情况的社员，应给予适当照顾。

定工分。根据社员的实际能力和全年生产计划的需要，并参考定额计分而定。要注意分别男女和特殊情况，不要一刀切。

定肥料。根据饲养牛、猪等实际情况而定。定肥任务一般可占社员家肥的六七成为宜。

对于以上“三定”任务，都要分别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奖罚制度，定期清理、结算和公布，严格执行，兑现奖罚。

4、乍暖还寒贵自持

我在龙坪工作期间，同住同吃同劳动的农户所在村，有一口鱼塘，塘边种有几株桃树，是我出入必经之处。

一天，春寒料峭，微雨纷飞。忽见桃蕊满枝，意态万千。联想到自己是“摘帽右派”，正处于阶级斗争日益强化的大环境，必须正心修身，适者生存。灵感一来，便成诗七绝《含苞竞放》：“嫩绿丛中蕊满枝，万千意态竞丰姿。冰霜凛冽痕犹在，乍暖还寒贵自持。”

过了一段时间，又经此处。看见桃花凋零，纷纷坠入水中，随圳水飘流，不知流向何处？联想“摘帽右派”的政策又何日终止呢？一种意境悠然而生，一首《凋花飘零》七绝跃然而出：“迎风烂醉乱摇头，影碎涟漪逐水流。洑泻朝东归大海，桃红浪迹几时休？”

（六）调研发展红花子

1963年8月中旬至11月下旬，我奉命调研全县山上山下的红花子生产与留种问题。

红花子是连县冬种绿肥的主要作物，以附城、西岸、东陂、保安等山下为普遍，山上公社则还未普及，而且产量不高。更为缺陷的是，本县没有留种，种子靠外省供应，时多时少，影响全县推广种植。

我以附城、西岸为调研重点，基本跑遍了山下山上大多数公社，从而写出了调研报告。

张廷槐书记对此十分重视。我写出第一稿后，他先后给农村部部长钟基年、宣传部部长饶英超修改出第二、三稿，又退回给我写出第四稿，最后由他修改定稿，在韶关专区县委书记会议上发言，并被地委印发至各县参考推广。

因红花子既怕旱，又怕涝，故主要措施，是在田四周开沟，田块大的，还要在田中间开沟，适时顺势排灌，才能长势良好；同时，还要适当施肥，以肥养肥，才能获得高产。新播种红花子的田，一定要拌根瘤菌播种，否则，长势不良，甚至试种失败。

留种的最大障碍，则是会拖长早造播种时间，从而连锁反应地影响早晚两造水稻增产，甚至于减产。决非连县自然条件不适宜于留种。为此，红花子留种田需要政府适当补助损失，一般每亩补助三四百斤左右，视原水稻产量多少而定。

顺便说一下。在1962、63年间，我除参与起草张书记

报告或讲话外，还先后参与起草副书记李明、潘强、孙玉明（兼县长）的报告；尤其是赵功才副书记，管政法出身，却分管林业工作，林业局的工作报告、请示等，都交给我去处理，经他过目修改签字就行了。我还参与县委召开大型会议的资料调研整理、会议期间的会议简报等工作。因此，我被人戏称为“县委大红人”，工作很繁忙，加班加点是常事，我也乐于去完成，从不推辞，也不偷工减料，尽心尽力，力争做好，真正践行“鞠躬尽瘁愿为牛”的誓言。

（七）患血吸虫病留医

1964年2月下旬至10月中旬，我因常患拉肚子带脓血的疾病，先后在连县医院、曲江马坝血吸虫病防治站、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此三间医院均诊断为患血吸虫病，先后两次注射针剂，都因严重头晕而拔针停治。在中山一院，经细菌培养检查，还诊断为慢性福氏杆菌痢疾，并自然形成了漏管排脓血。经中山一院中西医结合治疗，病情有很大好转，但还未治愈。该院认为，与患血吸虫病有关，因而办手续出院。

在中山一院出院前，获准先后拜见了李祥麟、林名勋老首长，得到真诚鼓励和热情接待。

李老首长时任省供销社主任，花了整晚时间，详细询问了红花子生产与留种问题，并作了笔录。他想调我去工作，询问张廷槐书记会否同意调出？我说：“不妨一试，但我不便主

动提出调离连县。”

林老首长时任华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知道我母校南方大学是该院前身，主动邀我一起游览校园，并带我参观了历史文物——南大礼堂和电子计算机室，并留我共进午餐。

同年10月至12月，我除总结朝天公社抗旱经验，发表于《连县通讯》外，还长住大路边公社调研，先后写出经营管理工作和安装水轮泵工作的调查报告，先后在《连县通讯》发表。

（八）下放示范场劳动

1965年5月，胡明在中共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与“援越抗美”声中，肩负省委书记陶铸的重托，怀抱改变连县落后面貌的雄心，疾车赴任连县县委书记。

他上任伊始，就在各级干部会议上，大讲特揭连县的“落后面貌”和传达陶铸对连县工作的指示。这是前所未闻未见的创举！

1、干部抵不上保姆

胡明与杨松（县委宣传部部长）夫妇，仅上任几天，就光临敝室。我与妻子冯汉珍以为“老相识”来访，便起身欢迎，热情地说：“请坐，请坐！”他俩只是点点头，回答说：“好，好。”边说边走边看四壁，既不握手，也不道别，就离房出去了，使我俩疑惑不已。

过了一会，县委、县府行政科科长朱怀宽，来到房里，要我俩立即搬家，从20多平方米搬至十零米的房里去住。说原住房要安排给胡书记保姆住。冯说：“搬去的房那么小，叫我们全家五口怎么住呢？难道我们两个干部还抵不上他一个保姆？”

朱科长早已知道，这房子给我住，是前任张廷槐书记对我的照顾，并给予两个优待：一是把原来木质百叶窗改为玻璃窗；二是准用40瓦灯泡，其目的是为了有利于我写作。他可能觉得胡明如此依势强占理亏，就黯然离去。他可能取得胡明同意，另行安排房子给保姆住，并特建一间厨房供使用。

2、“思想不清”改造去

过了三个多月，即8月中旬，我参加了“四清”工作队集训。我在“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检查时，被抓住政治不清与思想不清不放。我隐约意识到：这是胡明授意所致。果然，在总结大会上，胡明声色俱厉地点了我的名，说什么“写反动诗”，“政治不清”，“思想不清”，下放县示范场劳动。在全县“四清”工作队中，仅我一人享此“殊荣”。

当晚，我写了题为《下放农场劳动》一诗：“‘思想不清’岂不清？农场劳动待查明。‘青禾事件’心怀恨，近令换房拒执行。”我没有悲伤，没有悔恨，只有愤怒！

我作好思想准备：一是被抓去坐牢；二是被清洗出革命队伍。如是前者，我嘱老冯在适当的时候，去找张廷槐、李祥麟、林名勋、张根生等老首长告状。为了应付后者，我决定在

示范场白天劳动，晚上自学中医，既可自医，又可医人，为人做好事。“男儿百艺好随身”嘛！

3、盼思潮解放遍山川

我一到示范场，即被安排去农田生产队参加耘田。“入乡随俗”。我学样穿着短裤，赤膊上阵。没过几天，就晒得赤里透红，显得健壮了。

我又随队到县府招待所淘大粪，驾轻就熟，挑着两桶大粪，向农场方向健步如飞。适逢“四清”工作队严祖兴等人迎面而来。严热情如故，轻抓我的担竿头，说：“真英雄，赤膊上阵！”我说：“快松手，快走开，又脏又臭！”借以讽刺其阵中某些“斗争积极分子”，引得一帮人“哈哈”大笑起来。一阵快慰涌上我心头！

转眼到了10月下旬，天未亮，我们队就开割试验田中矮禾品种。割着，割着，蓦然天亮，一片叶绿穗黄的矮禾在眼前闪耀，美妙极了！联想到我的问题终有一天会得到澄清，真相大白，像这美妙的矮禾那样！收割完毕，亩产一千多斤。于是，一首《清平乐·割矮禾》突然在我脑海中闪现：“镰驰呼啸，喝破苍天曜。叶绿串黄身短妙，蓦地焕然娇娆！欢声笑语连田，频传亩产超千。更盼思潮解放，永生祖国山川！”

4、三番报告不受理

1966年3月，县委、县府直属机关开展“四清”运动。我立即写报告分别送县委与县委农村工作部，恳切地请求回原单位参加“四清”，弄清我的问题，但被置之不理。

同年4月，我又分别给县委、县委农村部及地委“四清”

总团写报告，再次请求回原单位参加“四清”，彻底弄清问题；并引用毛主席教导：“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接着发问：“难道我们能违反毛主席教导吗？”但是，仍然石沉大海，毫无回音。

同年5月初，我再三写报告给上述三单位，并再引用上述毛主席语录，迫切请求回原单位参加“四清”，便于彻底弄清问题。然而，依旧未被理睬。

九、“文革”风云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并发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文革”运动便迅速陆续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

（一）满堂大字报围攻

连县的“文革”运动搞得热火朝天。我被通知回县委参加“文革”运动。迎接我的，是贴满县委礼堂揭批我的大字报。其主要“依据”是在此前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被抄家没收的诗词草稿、民间谚语（良莠齐集）、平日闲谈等，采用掐头除尾，断章取义，捕风捉影，凭空臆想，捏造歪曲，上纲上线等手法，说成什么“写反动诗词”、“写反动谚语”等等。如我收集的谚语“乌龟爬沙”，被捏造成什么“攻击大跃进为乌龟爬沙”；又如我收集的谚语“竹篮打水一场空”，被创作成“污蔑社会主

义为竹篮打水一场空”；说什么“写反动诗，鞠躬尽瘁愿为国民党牛”；说什么“安女名记仇”。——大女取名瑶，谐音摇，意即“当官摇摇欲坠”；二女取名玫，谐音霉，意即“划为右派倒霉”；说什么“自称毛公公，丑化毛主席”。——这条大字报是源于同事查金明的三岁儿子查查，创造性地叫我“肥伯伯”，我开玩笑地说：“我不是肥伯伯，是肥公公！”他从此叫我“肥公公”了，其他小孩也跟着这样叫。一次，我去县委李明副书记家里商谈起草报告的事，他儿子小虎叫了声“肥公公”，李没有听清楚，问：“他叫什么？”我很尴尬地说：“我也没听清楚。”从而搪塞了过去。完全出乎我意外，这称呼经过高手的再创造，改“肥”为“毛”，就变成“自称毛公公，丑化毛主席”了。余可类推，不胜枚举。

不难想像，文革领导小组长要我按照大字报内容，作“深刻检查”，这岂非使我陷于“为难”、“难堪”的境地吗？怎么能依样画葫芦去“检查”？又怎么能臻于检查“深刻”呢？不检查也罢，一检查，就“跳入黄河洗不清”了。于是，我再次告诉妻子老冯：“抓我去坐牢也不检查！万一抓进去了，你就见机去找那些了解我为人的老首长吧！我相信他们不会置之不理的。”因此，我写了一份《说明》交了上去。

此后，次次斗我，我次次否认是“三反分子”（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和“黑帮分子”（所谓拉帮结派的‘三反分子’）；次次要我检查，我次次写《说明》。他们说得不错，我确实“顽固到底”，“死不悔改”。

（二）戴高帽游街

同年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提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因此，县委农村部对我的斗争加剧，我依然“顽固到底”，以不变应万变。

因此，在8月末连州掀起“戴高帽游街”的两晚高潮中，我都排行第一，犹如一只“带头羊”，边行边敲锣，边敲锣边喊，边喊边感气愤，边气愤又边觉好笑！更使我好笑而痛快的，是第二晚戴高帽游街的演出。我发现带头高呼口号的人换了，正在寻思昨晚大出风头的此人去哪里了呢？忽然听到带头呼口号的新人高喊：“打倒政治大扒手陈洁平！”我回头一看，原来“政治大扒手”正跟在我后面走，竟然荣居排行第二！上述揭批我的大字报，就是大多出自此公之手，可说是富有创造性的“多产作家”了！我脑海里蓦地闪过鲁迅的诗句：“城头变幻大王旗！”连带玩味了“政治大扒手”的内涵及其表现，觉得两者性质虽不同，但“变幻”形式却相似，这称号对他真是惟妙惟肖得无以复加了！

（三）衔命归乡学种田

1966年9月18日晚上，县委礼堂坐满了人，是开农村战线斗争大会。被斗的人是我，所谓“黑帮分子”，“老右派”；另一个是李显扬，所谓“老牌特务”。

对我的批斗，毫无新意，都是“炒冷饭”，就是上述的那一套，根本引不起我的兴趣。我听得既气愤又厌烦，便拿出烟丝卷烟抽，抽了一支，又卷一支，到点烧第三支时，忽被“斗争积极分子”从我手中抢走，用力掷在地上，还踩上一脚，把冒烟的星星之火踩熄了。场上有人带头高呼口号，一呼百应，喊声震动：“打倒三反分子姚良宗！”“打倒死不悔改的老右派姚良宗！”又有“斗争积极分子”把我一推，抽走板凳，罚我站着。还好，没有罚跪，显得很文明！老实说，我被揪斗以来，都没有被罚跪，更没有受拳打脚踢之苦，可说是一个幸运儿了！

最后，大会主持人宣布：“三反分子姚良宗清洗出革命队伍，遣回原籍劳动生产”；“天生一对冯汉珍，勒令退职，回原籍劳动”；“‘老牌特务’李显扬，清洗出革命队伍，遣回原籍劳动生产”。忽然，声调升高：“勒令三人明天6时前离开连县！散会！”

散会后，大会主持人等留下我们三人谈话。发给我夫妇明天乘车的4张车票（小女免票），还发给冯退职金1149.50元和我60元遣返费，以及各回原籍的户口、粮食关系等。

我夫妇俩一夜无眠，整装待发，准备回老家第一站——

韶关。

这一天，是1966年9月19日，难忘的日子。我们上车后，我脑海里像放电影似的，闪过一幅幅画面：惠州逃难，参加革命，土改运动，反右斗争，劳动改造，农场待命，清洗出队，顺逆起伏，逆多顺少，何以致此？今后怎么办？终于决定：如在韶关告状不成，就回老家去，天无绝人之路！一首《归途》七律，就蓦然跃出：“致力雕虫不记年，清风两袖缈如烟。何谋一枕逢翁吕，岂意三杯遇智仙？莫效阮郎悲末路，聊充陶令辟荒园。为牛休吝腰弯折，衔命归乡学种田！”

（四）“文革”烈火燃韶城

我们一到韶城，就感触到“文革”烈火在燃烧。西河大桥改名为“反修大桥”；曲江大桥改名为“反帝大桥”；风采楼改名为“东风楼”；风度楼改名为“红星楼”；许多主要街道和全市电影院都改换成具有革命意义的新名字，使人变得很陌生。

我们去地委机关，找不到熟悉的领导。据说，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去了。更主要的是，地委书记已换成刘俊杰，素不相识，既难见面，见了也恐不理，倒不如不见，省得麻烦。

更令人丧气的是，我胞妹玉英夫妇在南门的房子上了

锁。据邻居说，回曲江县山子背乐村坪——妹夫的原籍去了。

我们只好步行十多华里，到乐村坪探亲去。亲人相见，未言泪先流，强忍住伤痛，没有放声哭泣。

原来，我妹夫张幸芳的父亲张安养，在1939年曾任曲江县马坝镇警察分驻所伪警长；1948年又任乐村坪伪保长；其家庭成份土改被划为贫农，土改复查被划为官僚地主恶霸，被批斗致死；之后，家庭成份降为中农。因胞妹夫妇暂无固定职业，加之母亲户口在平远原籍（被连县勒令迁回去的），常受查询惊吓，便选择常住乐村坪了。

我们在他俩家里住了几晚，就乘汽车到梅县县城，再转汽车回老冯原籍——隆文公社横坑大队冯屋生产队了。

（五）三个女儿改姓冯

我们在同年9月24日抵达冯屋文安居。我原打算在冯屋落家，考虑到有利于入户，故把三个女儿姚瑶、姚玫、姚玲的姓名前添姓冯。但冯屋生产队只接受大的两个，要最小的玲女跟我回原籍入户，我便取消了落家的打算，由老冯申请隆文公社留下玲女的户口，公社批准了，而生产队却坚持不配口粮，变成半个“黑人”了。

隆文公社民政助理李焕章，因鉴于李荣招母子三人在解放前三年已分家，各人已分开田地房屋，乃坚持按政策办事，判定李荣招、冯汉珍母女在土改发的“土地房产所有

证”有效，所有5间房屋归冯汉珍继承，任何人不得争夺，并在冯屋生产队开社员大会宣布贯彻执行。

我在文安居住了一个月。天天上山砍柴，晚晚锄地种菜淋菜，菜长得很快，不到20天就有收成。有人上门求看病，便义务处方医治，无有不快见效的，名声大振。我安排好家庭日常生活后，就回原籍老家去了。

（六）重归故里生活

同年10月25日，我从梅县隆文乘汽车至梅城，买了几本中医书，又转车抵达平远大柘。

1、抵家瞬间

车到大柘站后，我挑着行李，边走边看边认路，虽然阔别了16年，但仍旧依稀可辨。在大柘食堂驻脚吃午饭。饭后续行，过了十多分钟，就到老屋前塘边，觉得鱼塘变小了，已非儿时模样。其实一点也没有变，只是眼界开阔了的缘故。

我从正门进去，走到大伯廊里，发现八妹嫂（已故堂哥的妻子）倚门掩面哭泣。大伯从房里出来，伸手接我的行李，忍恸一言不发。

我为了打破僵局，挥手一指“空空如也”的栏杆框，明知故问地说：“那些铁枝哪里去了？”大伯说：“被大炼钢铁吃掉了！”八妹嫂接着说：“山林也被吃光了，现在斩柴要到几十里外去了！”

“阿宗，回来啦！”“是回来耕田啦，七叔！满姨婆好

吗？”

七叔，姓姚，大名玄秀，是我先祖母同父异母满女的孩子，与我同龄，现任石灰塘（“文革”改名为“东方”）生产队队长，一贯大公无私，任劳任怨，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信。

我随即拿出一张小信笺给他看。他接过看了一眼，就归还给我，说：“看不看都一样。今后靠劳动吃饭，没有了风险，好！很好！你满姨婆身体很好，眼力也好，她看似是你，我就来了。你等一下，我去叫冬喜空出大房子归还给你住。”

俗语说：“广东人邪，说曹操，曹操就到。”冬喜立即踏出巷门，大声接话：“七叔！你搞错了！我原住的细房，才是土改分给他的。”

大伯忙说：“先住我的空房吧！”

“也好，先住下再说。”七叔回答；又面对我说：“阿宗，先去你潘姆家搭食再说。我今晚会来坐。”就起身走了。

接着，先后来了一帮青少年男女和儿童，个个睁大眼睛看我，我一个都不认识。忙说：“兄弟姐妹们！谢谢大家来看我，没凳给大家坐，真不好意思，请大家原谅！”

“不要客气，惠宗哥！”一个人开了口，个个嚷着，有的喊哥，有的叫伯，也有称叔的，热闹得很！

我已故堂叔的妻子——潘姆来看我，主动邀请我到家里吃饭，并同大伯、八妹嫂一起打扫清理房间，我心里热烘烘

的。

当晚，七叔果然来坐谈。叫我今后安排晚上辅导社员学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他离去后，我成诗两首。

一曰《归家》：“背井离乡十六年，变迁事物几多千？少童不识竹林灭，燕鹤远飞觉寂然。”

二曰《辅导学毛著》：“勤于毛著适潮流，红本珍藏日夜修。辅导三篇荣幸事，认真谨慎杜生尤。”

2、老屋新居

翌晨，自称岭下大队治保主任的姚良海来看我。我主动拿出一张小信笺给他看。他看得很仔细，而且把原文抄在笔记本上。

用复写笔复写的原文如下：

“兹有摘帽右派姚良宗，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予清洗出革命队伍，遣回原籍劳动生产。”署名是连县县委机关分团政治处，盖的大印是：连县人事科，日期是1966年9月16日。

姚良海不冷不热地说：“你以后好好劳动，不必参加五类分子开会。”说罢，起身走了。

他走后，我到大柘镇买米油菜等日常生活用品和担竿畚箕等生产工具。自己打米搭潘姆蒸饭菜，减轻她的负担。下午，就参加生产队秋收，分配踏打禾机打谷；空隙间，我主动下田担禾，忙个不停。

过了几晚，石灰塘生产队开社员大会，岭下大队党支部书记姚九尹、民兵营长姚良栋（本屋人）参加。

首先，玄秀队长提议通过我底分10分为满分。之后，良栋就叫姚良干、杨冬喜夫妇拿出“土地房产所有证”查看。两个大队干部认真看完后，良栋指着证件，对良干夫妇说：“你看，细房是分给你的，大房归惠宗，你要空出大房来！”

我又呈上冯汉珍代阿妈写给大哥接尹的信，信封邮戳印着：“1961.6.2”。同月2日阿妈给大哥的信写道：“接冬喜来信说，她不够房住，叫我暂借大房给她住。”“请你把我住的大房拿给冬喜嫫暂住一下。”此信，是大伯在我回家的当晚交给我的。

良栋读完全信后，说：“这封信更加证明大房是归惠宗的，你俩要尽快空出来给惠宗住。”全场响起一片讥讽声。冬喜垂头丧气，低声说：“过几天空出来。”会议到此结束。

果然，冬喜夫妇拖了几天，就空出大房给我住。当晚，我感想万千，写了一首七绝《壁上头印》：“老屋新居想万千，人情冷暖利为先。枕墙苦读暑寒假，头印鲜明耀眼前。”

1974年11月中旬，我接到连县复职通知后，拜见大柘公社党委书记龙均海，向他辞行。他问：“你的大房交给谁保管？”我答：“借给生产队队长卓大妹住。”“这就好了。如果交给你那个弟媳住，就变成她的了。她夫妇在八年前曾来公社告状，说你反攻倒算，霸占她的房子呢！”我恍然大悟，那时拖了几天才空房，原来如此！

3、独立生活

我老屋新居的第二天，七叔邀我去砍柴，柴是他放干了的，任我拣，任我担。该山林属江西省寻乌县管辖，来回50华里。

第三天，七叔送给我3块泥砖，在我后门屋背檐下靠窗处，立砖当作灶头，用钵煲蒸饭和煮菜。分给我位于兵营子的一块自留地种菜。我从此开始独立生活了。

七叔每天起码一次来看我，问寒问暖，坐谈一会，就起身走了。

一天，刮大风，下大雨。我戴着竹笠出后门去煮饭。七叔来了，看见了，站在门口观察思考。突然，他高兴地对我说：“阿宗，有办法了！挖掉房外那堵台阶，把大房的瓦面挥出去，变成了半间小房子，就可以打灶头煮食了。”我说：“那是人行路，群众会有意见的。”“不怕！房外边有空地可行，我会做说服工作，群众一定会通情达理的。”他很自信地说。

此时，大柘镇正在拆旧建新，废弃的旧灰墙任人搬走。桂妹姐的丈夫、儿子都是泥水师傅，愿意支持，乐于帮助。很快，就把半间厨房建成了。

（七）触目皆是“红海洋”

1966年11月初，平远县党政直属机关和大柘镇各单位的门面、围墙，都基本成为一片“红海洋”，即涂上红漆，鲜艳夺目。

岭下大队各生产队，也开始大造“红海洋”。水泉、良明和我，被安排干此工作。我们兢兢业业、认认真真、提心吊胆地每天工作着。花了近一个月时间，把老屋上下堂、5扇大小门都涂上红漆，描绘了毛主席头像，写了毛主席语录，面貌焕然一新，赶上了潮流。

晚上，我有时遵嘱辅导社员学毛主席语录，或学毛主席“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不管与会多少人，不管与会人听不听，我都照讲不误。老实说，根本做不到“天天学”、“出工前后学”，更做不到“人人语录不离身”、“思想不离毛主席的教导”、“说话不离毛主席的观点”、“行动不离毛主席的指示”了。

我们生产队有两个中学生：姚木双与姚士镇，以“红卫兵”身份，进行大串连。据说，他俩参加了毛主席在北京接见全国红卫兵，亲见北京红卫兵揪斗时为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并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到处都见“红海洋”。

我们生产队完成秋收冬种后，即同年12月下旬，我利用休闲时间，常到县图书馆翻阅《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南方日报》等，新闻旧息都阅览，以了解情况，开拓视野，充实自己。我一直坚持至1974年11月中旬接到连县复职通知为止。

（八）插秧收割逗心欢

1967年4月初，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家乡插秧工作。

石灰塘生产队已形成一个独特习惯：玄秀队长于前一天安排好工作；翌晨，社员们提前带着工具，坐在门口或禾坪上稍等候；玄秀队长必然准时出现，社员们就跟着他后面走；不用吹哨，不用打锣，不用喊开工。到了田边，就各自去干事先分配的工作，井然有序。

比如，队长安排我插秧，我就事先装好秧，跟着队列，挑秧到犁耙好的田边，抛秧下田，跟一排人插起秧来。随后，就有专人脱秧，保证供应挑秧者担去抛秧下田，从而使我们插完了一块，又插一块，连续操作，不会发生窝工浪工的现象。而且这样形成脱秧——担秧——插秧的一条龙操作，就可以互相促进，防止怠工。排队插秧，也起到了互相促进的作用：如一松懈，就落伍了，马上暴露出来，谁也不愿意做落伍者。

因此，当时潮流，虽是底分死记，但大家也一样出力干，劳动日值居全大队前列，社员们都保持着旺盛的劳动积极性。

我下田插秧，开始觉得有点寒意，过了一会儿，就适应了；我早已学会插秧，但涉猎大阵，一开始也觉得很吃力，过了一会儿，很快就适应了；插秧不久，觉得腰酸腿疼，咬紧牙关坚持，三天一过，就轻快舒畅了。这有诗为证：“浸水俄间寒意发，热情挥洒却欣然”；“汗流额背衣衫湿，腰膝酸麻自

忍藏”；“三天过后苦尝完，轻快如初不觉难”；“排队插秧同退步，盈田翠绿逗心欢”！这些，都是我插秧中的真实感受。

同年8月初，我第二次参加家乡收割与插秧工作了。

夏收夏种的情况，我有诗描述如下。

首先，“天色朦胧夏起床，肩挑尿桶下鱼塘；来回打水淋蔬菜，日晒无妨致死伤。”

接着，“饭钵扫光等出门，紧跟队长赶田园；快收猛插抢时令，早出晚归无怨言。”

我的装束和感受是什么呢？

“短裤赤身戴笠麻，头竖背黑雨风嗟。蒟挑割打皆尝试，‘战将’呼声播迩遐。”

“背黑发光滑过油，雨淋日晒等闲休。风吹露打难侵蚀，赤体下田觉爽悠！”

夏种后至耘田前这一段时间，我坚持天天上山砍柴，抽空到县图书馆看报纸杂志，既消磨时光，又增长知识，不脱离全国各地的社会生活。

（九）两大奇遇

同年8月中旬，为了节省车费，我步行两天至梅县隆文冯屋探亲，一直住到10月中旬。天天上山砍柴，管理菜地，学织谷箩。通过实践，改进了“过箴剑”工具，被当地群众采纳流行。同时，也给上门求医的群众治病，普遍反映良好。

一天，我上山砍柴，巧逢有生以来“晴雨分明”的奇景：我身站处天晴，手伸处大雨，乃赋诗记之。诗云：“砍柴山上起风雷，急走归程免水摧。步入彭安宫里歇，左晴右雨遇头回。”

又有一天，我下隆文圩给老冯买中药治病，在隆文公社附近站着看《陶铸论陶铸》的铅印宣传品。忽然，我觉得有一只手用力抓压肩头，转身一看，原来是横坑大队民兵营长冯权国，冯屋生产队人。他大喝一声，用身体挡住《陶铸论陶铸》，说：“地主分子不准看大字报！”我厉声问道：“谁是地主分子？”“你！就是你！”我从袋中拿出“探亲证明”，在空中摇晃着，向围观的群众说：“革命群众们！请大家看看，我是社员，不是地主分子！”

就近有一个青年接过我的“探亲证明”一看，马上指责冯权国，说：“你不应该诬陷好人！”围观的群众起来附和着，哄声大振！冯扑来抓我，我顺势抓住他的手，说：“到公社去讲清楚！”那个青年也仗义顺势抓住他另一只手，说：“对，到公社去讲清楚！”“好，去就去！”他大喊着。我俩就先后放开手，让他先行，我俩和一大群人随后跟着。

有一个领导模样的人站在公社大门口，问：“什么事？”我抢先说：“他诬我是地主分子，不准我看《陶铸论陶铸》。”一群人七嘴八舌帮腔起哄。我随即递上“探亲证明”。

那领导模样的人看过探亲证明后归还给我，生气地责备说：“冯权国！你真多事！”冯叫了一声“部长！我……我

……”，嗫嚅着。那个武装部部长不耐烦地说：“冯权国！你先留下。”又面向我和群众说：“你和所有人都可以离开了。没事了！”我悠然自得地离去。

我对冯权国依势凌人、贪赃枉法的恶行早有所闻，今亲受欺侮，更加气愤。为防止其今后反扑，加害于我们和群众，便支使老冯深入群众，进一步调查核实其作恶事实。我用“革命群众”名义，写了多张大字报和小字报，在我提前离开冯屋后，叫老冯请人到公社附近张贴大字报，并把小字报寄呈隆文公社领导。过了一段较长时间，公社果然撤销了冯权国民兵营长职务。横坑群众拍手称快，并传为茶余饭后的美谈。

（十）重返连县求复职

1、启程之前

1967年11月上旬，在全省各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浩大声势中，我夫妇俩接到原韶关地委办公室与农村部老同志陈祖玉等来信，说地委院内贴出许多大字报，批判地委“走资派”李某迫害我夫妻俩返乡耕田的罪行，动员我俩出去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

与此同时，我邻村“大夫第”的姚良宏，原是土改村干部，专来告我，说：“有两个解放军来调查你的问题，复职有希望了。”我问：“调查什么问题？”答：“一个是你参加革命时，家庭是什么成份？另一个是，你父亲一向干什么的？有什么民愤？”

我脑里忽然闪过，这分明调查我是否混入革命队伍？便急切地问：“您怎样回答呢？”答：“我说，1950年夏季征粮，是以中农成份计征。他父亲一向在惠州工作，家乡没有民愤。”“有没有写书面材料？”“写了，是调查人起草，读给我听，我说没错，就叫我盖章，打指模。”“好，十分多谢您了！”

我经慎重考虑后，认为外出请求复职的时机已到，便再次请假去隆文冯屋，与老冯商量详谈此事。

2、韶城遇险

同年11月中旬，我们全家5口从隆文抵达梅城。老冯发现忘记带粮票。我独返冯屋住了一夜，翌晨到梅城相聚。第三天，我送老冯母女4人上汽车赴韶关，再转车到连县。我则从梅城返回平远老家。

同年12月上旬，我获悉老冯已于上月中旬得到“东风”、“红旗”（分别是当时广东各地两派群众组织的简称）两派革命群众同意，并经连县武装部部长李培才批准复职复薪，已安排住大楼招待所，我便决定赴连县请求复职。

我先到广州，住食良兴哥家。当时，他所在工作单位的纸厂两派群众组织都邀请他加入。他问我说：“逍遥派当不成了，我参加哪派好？”我说：“待我出街看两派大字报后，再回答你。”第二天，我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推理后，回答兴哥说：“还是参加东风派好，但不要当头头。”果然，他后来因站对了队，而被转为“以工代干”（以工人身份代替干部使用）了。

第三天，我到韶关住食玉妹家。

翌日上午，我到韶关地区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信访室（简称地抓促信访室，下同）上访，接待我的是姓善的同志。他知道我是姚良宗后，就坦率地说：“你的问题，我去平远大柘调查过了，连县清洗你出队是错误的，应该复职工作。你现在住哪里？”我答：“谢谢您！我暂住胞妹家里。”他又说：“那好，先暂住一下。现在连县两派武斗很剧烈，你去会有生命危险。请你留个地址，在适当的时候，我会通知你。”我异常感动感激，再三表示谢意，然后，与他握手告别。

我先后访问了老同事蔡思义、何欣林、龙柏呈、黄志民等。先后访问了两派组织总部，都获得表态支持复职，并表示会与连县同派组织联系，给我以支持帮助。

一天上午，忽然枪声大作。玉英妹从外面回家，不见了儿子张毅，“哇”一声大哭起来。我开门冲出去，转弯向风度北方向跑。两边骑楼下，挤满了人，站着、坐着、走着的都有，大街“空空如也”。我跑到风度中路骑楼下，看见张毅哭着往南走。我急忙抱起转身往南跑。跑到南门十字路口，听见枪声杀声响起，我就地伏下，两掌两膝抵地，躬起身体掩护外甥张毅。看见东面向西冲锋的那队有一人中枪倒地，两个同伴用木板抬起往回撤，西面向东冲锋的那队也立即往回撤，拉开了距离，枪声沉寂了下来。我乘此空隙，抱起外甥冲回家。总算渡过惊险，平安无事了！

又有一天，我在玉妹家门口，看见原北江专区土委办副

主任、后任花县县长的林奕龙老首长，欣然应邀上楼畅叙。我才获悉他和周明老首长都曾被划为右派，都已摘了帽，令我惋惜之余，感到一些欣慰！他鼓励我说：“躺着就打不倒了！大胆去连县要求复职吧！”这给我以很大鼓舞！

1968年1月上旬，一天黄昏，地抓促信访室的善同志找上门来，叫我明天上午去找他，有事面谈。

善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他诚恳地说：“现在，连县斗接近尾声了，你可以去搞复职了。完全平静后才去，会被认为‘摘桃子’，印象不好。”我表示同意后，他说：“那好！你在这里先看看报纸，我进去用地抓促的名义给你出证明并盖章，才有效力。”

善同志回来后，交给我一封公函。信封上写着：“面交”，另行是：“连县抓促负责同志亲收”；左上角盖“密件”印章，封口贴着“私拆无效”封条。

他待我看完信封的字样后，真挚地说：“此信，你要面交644部队李团长亲收，他是县抓促主任，才有可能解决你的复职问题。你沿路要小心，最好戴一个大口罩，免被人认出你来，从而发生什么意外。”我再三向他致谢，握手告别。

3、见李团长

我到连县的第二天上午，就去644部队驻地拜见李团长。

我让站岗的警卫看过信后，警卫放我进入值班室，值班员看过信后，就打电话进去。

我坐着等了一会儿，出来一个矮个子军官，四个衫袋的，叫我把信交给他。

我委婉地说：“地抓促交代要面呈李团长亲收，请您通报一下，好不好？”

他一声不哼，就进去了。

忽然，附近连续发出“轰轰”两声爆炸，就沉寂了下来。

不久，李团长出来了，矮个子军官跟着。我站起迎接，互相握手后，坐下。我作了简要的自我介绍，呈上公函。

他拆阅了，把信交给身边矮个子军官。这时，有个士兵呈上两发已爆炸的炮弹，他接在手上，一边转动炮弹，一边说：“你看，还在打炮呢，武斗还未结束呢！你的复职问题推后再说吧！”“好，麻烦您费心了，谢谢！”我就起身告辞。

4、见李部长

当天晚上，我夫妻俩到县武装部拜见李培才部长。

我俩顺利通过守门的岗哨后，就进入一座小楼房的二楼，厅门开着，李部长坐在厅里沙发上阅报。

“李部长好！”我俩几乎异口同声说道。

“啊，老姚，你几时到连县的？”

“昨天到的。谢谢李部长关心！”

接着，我就把上访地抓促的始末向他作了简要汇报。

“好！把公函交给我，我批你复职。”他爽快地说。

“地抓促吩咐，要亲交李团长收，我今上午交给他了。”

“他怎么说？”

“他说，现在武斗还未结束，推后再说吧！”

“王八兔子，这是推卸责任！你去拿回来，我马上批你复职。我在北京见到张廷槐副专员，他谈起你夫妇被迫害回家的事，叫我帮忙给予复职。”

“谢谢你和张专员的关怀帮助！以后李团长不给我复职，我就去拿回公函呈您批示。现在，求您批给我全家5人口粮，看行不行？”我随即呈上报告。

他接过看了一下，马上批示：“同意按月供给口粮，请粮局解决。”

我俩再三表示感谢，便告辞走了。

5、面斥胡明

我经过几天收集材料，作了充分准备，就去找时为“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胡明分清是非。

胡明坐在房里抽烟。一见我进房，就显出惊疑的样子，说：“你来啦，请坐！”“胡明，我是谁？你还认识吗？”

“认识，认识，你是姚良宗同志。”“你清洗我出队，就不认同志啦！”“有这回事？我不知道！”我听了很气愤！但还是压下火气，问：“你在‘四清’大会上，点名批我写反动诗，处理我去农场劳动，你知道吗？”“这个，这个，我听信了下面的汇报，有错，有错，向你道歉！”“你叫我空房给保姆住，你知道吗？”“这个，这个，是朱科长的主意，被我拒绝了。”“你在清远指令下面割青禾，被我发现，被区党委通报批评了，你知道吗？”“这个，这个，我忘记了。”

我站起身，指点着他说：“胡明，你真狡猾！避重就

轻，避暗就明，推卸责任，嫁祸于人！这是什么态度！？”

“这个，这个，不敢，不敢，请息怒。”

我拿出油印资料，在他面前晃一晃，说：“这是红卫兵揭发你的罪行，一条条，一桩桩，写得清清楚楚。在搜出你的笔记本上，你白纸黑字写着：‘姚良宗，清洗。冯汉珍，退职。’这是明显报复打击，陷害无辜！你还狡辩抵赖？罪加一等！”

胡明哑口无言。不一会，声音颤抖地说：“我有错，有错。你和冯汉珍同志都应该复职。”

“好吧，你把错误和对错误的认识写出来。”

胡明慢吞吞地，拿起纸笔，边想边写。递给我一看，写着：“姚良宗同志应该复职，请组织部门给予解决。胡明。”我说：“这算什么东西！责令你写出错误，并作深刻检讨！我后来拿。”我收起字据，说完，走了出去。背后传来轻快的回音：“是，是，请慢走。”

我已打定主意，不屑与他继续纠缠下去了。

6、“回去搞点工分也好嘛”

1968年2月10日，我代老冯起草了一个报告，请求一家4口在梅县隆文的户口迁回连州镇，面呈李培才部长审批。李部长立即批示：“同意把冯汉珍同志户口迁来。”我俩马上办好手续，由老冯回隆文迁来了户籍，总算安居了下来。

从1968年1月中旬到6月下旬，我多次到644部队支左（支持左派的简称）办公室联系复职的事，都碰了软钉子。先说筹办两派大联合，后说筹办县革命委员会，无暇顾及。我请求拿

回公函回复地抓促，被拒绝；我写信给地抓促善同志，又没有回音。县革委会成立后，又说要调查事实真相，才能研究作出决定。

如此一推再推，一拖再拖，拖到6月30日下午，我在644部队支左办公室见到矮个子军官，是支左办主任，忘了姓名。此前已多次见面，都是不冷不热；这次，他趾高气扬，边指自己额头边说：“你的眼睛长到这里来了！不把我放在眼里。你等着瞧吧！”我解释说：“我当时不知道你是支左办主任，所以没有把公函交给你，请原谅！”他继续发火：“你以为那是什么信！是叫我们抓你的！”我不卑不亢地说：“那好吧，你就把信归还给我，我到地抓促投案去！”他故意拉开桌柜翻了一下，自言自语：“哪里去了呢？”抬头盯着我，说：“你不要太得意，看你怎样下场！”我说声“再见”，就起身走了。

我感到形势将突变，马上去找县革委副主任、原县委副书记赵功才，试探地问：“我复职的事，有新消息吗？”他答：“恐怕很难解决。我意见，老冯留下，你先回去，有新消息再出来也不迟，回去搞点工分也好嘛！”“好吧，我先回去，我复职的事，就拜托赵书记帮忙到底了！谢谢！”我告辞走了。

我回到招待所，立即收拾行装。老冯回来后，告知缘故，她表示同意。翌晨，我乘头班汽车回韶关，第二天回到老家，第三天，就看到省革委会的“七·三布告”（七月三日布告），清理城镇“造反”等闲散人员，我暗幸逃过了一劫。

（十一）炮声中送七叔治病

我回家后，即去看七叔。他已患病一个多月，症状是：牙齿疼痛，嘴唇麻痹，头晕头痛，呼吸不畅。他胞兄——我称四叔秘告知，县医院疑七叔患鼻咽癌，建议去广州复查。但因武斗不止，时局纷乱，特别缺人护送，所以，拖延至今。我自告奋勇，建议四叔的儿子豹哥头同我一起护送。

7月上旬，我们3人乘汽车赴广州。我安排3人的行装全归豹哥头背着，我负责照顾七叔；并叮嘱如遇武斗，豹哥头要紧跟我，我跑也跑，我伏也伏；要机警沉着，不要慌张。车到老隆，司机因收到广州武斗的信息而决定折回，退回老隆至广州的车费。我出面与乘客并与司机商谈的结果，是汽车改道至樟木头，转乘火车到广州。

火车到广州已是晚上12时，听见“隆隆”炮声。我们3人不出站，取得工作人员同意，留在旅客厅过夜。天一亮，就乘汽车到肿瘤医院看病。经过检验，确诊七叔为晚期鼻咽癌，医生给药3个月，我们就立即乘汽车回家了。

七叔在病中很坚强，很乐观，忍痛不哭、不泣、不闹，只是不停地唱山歌。经常对探病者说：“我今年38，掉转来，就是83了。人生总有一次，何必悲伤呢！？”

果如医生所断言，药将尽，七叔也逝世了！全屋（队）人都觉得很难过，尤其是妇女感伤流泪。几乎全体青壮年男子都为他守灵通宵。全队人翌日随棺送别后，我与豹哥头护棺至埋葬地——慈铺里。入葬地的一段路狭窄，容不了前后抬棺者

双人并排走，我与豹哥头就一前一后抬棺进山，含泪看着棺木入穴，心里在祈祷：“但愿好人永垂不朽！”

（十二）全家团圆共渡难关

1968年7月中旬，我们在鱼塘边的一块田里斩甘蔗。忽然，靠田边的人喊：“惠宗哥！阳二姆回来了！”

我从蔗林中钻出来，看见阿妈左手牵着外甥张毅，右手拿着一袋行李，背着张德，缓步走来。我迅速迎上去，叫了声“阿妈！”便接过那袋行李，转身往老屋走。塘边路上，站满了人，有的喊阳二嫂，有的叫阳二姆，打着招呼，像欢迎远路客人似的。

我大房里放着一张空床，铺上草席，就供她祖孙三人住宿；半间厨房建有炉灶，放有炊具，可供煮食；全家4人就可以生活下去了。

母亲回来第二个月，即8月下旬，曲江乐村坪个别干部，乘“文革”之机，以“革命群众组织”的名义，把胞妹夫妇及2个儿子的韶城户口迁回农村，强迫在农村劳动，直到翌年1月上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逐级审批，把全家户口迁回韶城。

10月中旬，老冯在“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声中，也带着3个女儿回来了。在大房里铺上第三铺床，全家8口住在一起。靠窗的床边，还放了一张圆桌，摆上几盏小煤油灯，就可以供小孩晚上学习用。

我玉英胞妹每月准时寄来2个小孩粮票和30元伙食费，就解决了全家油盐菜钱，帮了大忙。

但更艰难的，还是来自外部压力。清查“5·16”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平远大柘各机关单位和农村陆续开展了起来；揪斗之风盛行，无地不斗；打死人现象，时有发生，不以为怪。其影响所及，有个别人竟然在我家房门口贴上了一副对联，左联是：“接受改造”；右联是：“重新做人”。横批是：“遵纪守法”。我发现后，即找队委、退伍军人姚若煌，告知此事。他说：“乱来！我马上去处理。”不一会，所有门联、横批都不翼而飞了。他真情地对我说：“无得（原是我习惯用语，后被群众当作‘绰号’，即‘花名’），以后万一有人来揪斗你，你就躲进我老屋去，没有人敢去搜查的。‘好汉不吃眼前亏’嘛！”但终于幸得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后来，毅、德两个外甥上学，被评为“三好”（思想品德好，学习成绩好，身体好）学生，分别当二、一年级班长，我们都很高兴！

一个星期天下午，我砍柴回来。我说：“阿德，拿书出来，背给我听，看你学得怎样？”他答：“书给我扯来抹屎了，我背给你听好了。”说罢，就从头到尾背了起来，朗朗上口，没有停顿。这既使我高兴，又使我心酸，穷俭得连大便纸也买不起！我们大便又何尝不是用废纸或劣质草纸呢？！

张毅外甥也受到鼓舞，自动背诵前几天我仅教了他一遍的毛主席《长征》，一字不漏，显出良好的记忆力，更使我兴

奋！

我们苦中作乐，除上述者外，就是在晚上几个孩子做完功课，欢迎最小的张德表演唱歌。他一上台（床），恭敬地向观众一鞠躬，就扯开稚嫩的童音，唱起“沙石峪，山连山，当代愚公换新天，毛泽东思想来武装，青石板上创高产……”；唱完后，又行鞠躬礼，观众一齐鼓掌，使整间房子充满了阵阵歌声、笑声和掌声。其乐融融，消除了一切苦闷！

（十三）适应环境克服困难

我赴连县请求复职回来后，生产队长期没有分给自留地，吃菜靠买，只能养些鸡，不能养猪，两人劳动供养老幼四人，难以保证不超支。

在这样的窘境下，为了生存，忍痛让两个大女儿停学。她俩除参加队里劳动外，又利用空闲时间拾狗屎交队记工分，还要上山割“芦箕”（属蕨类）供炊用。阿妈也早起拾狗屎记工分，并料理家务和照顾小孩。我夫妻俩则外出搞副业，既要交钱归队记工分，又要养活自己，并非易事。如此全家总动员，全力以赴，竟然做到了年年分配有盈余，总算活了下来。

1969年5月，我开始随大流到东石畲脑芋坑村挑木炭。从山下挑上一里多的芋坑岗，继续上落山坡，行走十多华里才到达收购站。每百斤付脚钱1元左右，一天挑两担，除交队和伙

食外，所剩无几。过了几天，同来的人都回去了，只剩下我一人坚持着。我开始挑长担不会换肩，磨损了颈背。就采用“打驳”的办法，即一次挑两担，放下第一担后，再回头挑第二担。如此轮流前进，就不用换肩了。直到向别人学会换肩为止。开始挑七八十斤，后来能挑120斤，完全靠毅力坚持下来。

有一次，我在山路上碰见一个读高中邻班的同学。他主动让出一座炭窑给我试烧。我就回家带老冯一起住山寨。我砍树栽树，她运树下山。在那个同学指导下，烧出了第一窑炭，夫妻俩挑炭去卖。一估算，经济效益强于单纯挑炭。我就包下了这座山林和炭窑，自烧自挑自卖，夫妻俩坚持了约半年时间。

我独自烧出了第二窑炭，因技术不过关，炭头长8寸，不合2.5寸收购要求，全部打掉，共计出炭2300斤。我反复观察琢磨，试行新招：在“虾蟆洞”口放上一枝短木，临近刹火时，抽出短木测量，估算全窑炭头合乎收购要求时才刹火。结果，这窑木炭重达3200斤，打破了原来最高2800斤记录，从而掌握了烧炭技术，荣登“老师傅”宝座。

1969年11月，山林烧光后，我夫妻俩又到泗水学割松香，我也变成了“师傅”，松香产量不比别人少，而且为人义务治病出了名，获得山民好评。

此前，我在此地首次为人义务治病，发生了一场虚惊。一个晚上，有个壮汉带着10岁的女儿求我诊治。这女孩病得没了精神，连头都抬不起来，老是用手压腹，说疼痛难忍。我诊

断为严重湿热病，处了方。第四天，那壮汉提一包东西独自来见我，吓得我心脏急跳，以为出事了，上门算账来了！谁知他提来的是糍粑，说女儿病好了，特来酬谢。从此，村里来看病的人就多起来了。

（十四）县社帮扶安居乐业

1970年春节后，鉴于外出搞副业，既辛苦又挣钱少；阿妈既搞家务又照顾小孩，力不从心；家人病了，我又要回来料理，得不偿失。从此，我夫妻俩决定留家务农；并与良添堂弟共买了一辆手扶双轮板车，共同拉车载石赚工钱，增加收入。

怎样拉车载石呢？是从大柘最高峰的河岭嶂石场，两人共载着千多斤石头，一人肩抵一条车杠，使木制车掣均匀触地，阻挡着车轮缓进，两人则沿路一步步后退，迂回曲折地下山。如万一失手失脚，就必然墜落深谷，一命呜呼了！多么惊险啊！

我们也用此手扶双轮板车，全家出动，到十多华里的田螺纽割芦箕回家。我们也曾全家出动，帮林佩群（学友林振西妻）割芦箕，用手扶双轮板车送回东布岭她家里去，分文不取。她尝到了甜头，想买良添名下半份40元，但因丈夫反对而作罢，并没有预先付款。

这年12月，岭下两个民兵于深夜来访，说：“全公社实行突击搜查，你属例外。”我说：“公事公办，你俩还是上楼

查看，那里放着梯呢！”在我再三坚持下，其中一人勉强上梯，在楼门口望了一眼，就下来了。我泡了茶，与他俩边饮边谈，毫无拘束。我想起去年8月初，我在东石畲脑烧炭，民兵营长事先告知：“明天上午奉命突击搜查，我们不会去干扰你，你可照常劳动，不要当一回事。”可见，忠厚为人，老实办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会记得关照你的，世上还是好人多于坏人呢！

1971年2月1日，我夫妻俩联名写报告给平远县委和大柘公社党委，“请求领导同志在百忙中，抽空解决我们一家六口的自留地问题，使我们能生活下去，更好地参加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过了一个多月，即年宵后不久，县社两级工作组驻队调研，终于分给了我们一家六口的自留地，大小共12块。尽管很分散，但可供种菜自吃，又建了猪栏养猪。我们还种黄豆，年节磨豆腐吃。县社的帮扶，终于使我们安居乐业了，心里万分感谢！

这年冬季，我都在兴建河头三级发电站劳动。天天担石，打石，积极主动，毫无怨言。一次，我不幸被滚石砸伤脚跟，回家休养，幸得县社两级先后派人来家探视慰问，使我倍感温暖！

1972年2月初，即春节前，大队召开了社员大会，宣读了中央4号文件，主要内容是揭批林彪（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原定毛主席接班人）篡党夺权、谋害毛主席的罪行，在叛逃当时苏联途中，机坠人亡。同时，宣讲了《“571工程”纪

要》，使我既感到惊愕，又内心大快！我预感到，国家政治形势可能有所变化。

果然，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正确方针，并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我坚信，只要张根生、李祥麟、林名勋、张廷槐等老首长出来工作，我夫妇俩的复职归队就大有希望。

同年4月底，潘姆打算全家迁居梅县女婿家里，把一间旧房和一块屋迹地卖给我，不料发生了产权争执。我夫妻俩又分别写报告给岭下大队、公社及县委。

他们又派人来调研，按政策办事，宣布我买房、买屋迹地的契约有效，并以县计委名义，配给杉头尾建房。这使我们以后做到了住房与厨房分离，并使我夫妻俩从大房搬去单房居住，从而进一步做到了安居乐业。

这使我们万分感动感激！直到2001年10月，我还赋诗述怀：“解放离乡动乱回，耕田八载未心灰。建房配木推寒去，伤足专人送暖来。突击搜查无险阻，学教毛著有安裁。富贫祸福时轮转，水涨滩头舸自开。”

当时，除杨冬喜和个别人谩骂“各级干部走地富路线，不配木材给贫雇农建房”外，全队人都说：“好心有好报，歪心天不容。”大家拍手叫好！

（十五）省地督促复职归队

1972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夺取新的胜利》的社论，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

我阅后，觉得“沉舟侧畔千帆过”，“似曾相识燕归来”！——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又要归来了！10月14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三篇文章，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我更感到上述判断是正确的。

1、明拒暗拖终破解

我立即代老冯起草了两封信，分别寄呈韶关地区革命委员会和连县革命委员会，阐明将返连县搞清勒令退职等问题，请求尽快复职。

接着，我写了一篇题为《论“宁‘左’勿右”》文章，署名“牛田”，寄给《南方日报》，没有发表出来。

1972年10月6日，首先接到韶关地区革委会政工组给老冯的复信。信中写道：“现将你来信转到连县政工组，有关提及问题，请与县联系。”

10月22日，接到连县革委会给老冯的复信：“1966年四清期间，组织上根据你所犯错误以及你对错误的态度，给予勒令退职处理。望你认真看书学习，正确对待自己的错误，安心农村，为建设社会主义做出新贡献。”“望你不要来连县，组

织上对你的情况是了解的。如果硬要来连县，一切费用拒不负责。”而《勒令退职书》上写的只是一句话：“不适合革命队伍工作。”令人啼笑皆非！

为此，我写了一信给张廷槐老首长进行试探。信中写道：“对处理我的问题，想提出申诉，但已成惊弓之鸟，顾虑重重，请老首长指示。”

11月初，我接到张老首长复信。称我为同志，直截了当地说：“来信收到。你要相信组织会按党的政策办理的。”仅此两句，就消除了我的重重顾虑。因此，我叫老冯去韶关，相信张老首长等会帮忙的。而我自己的问题，则按兵不动，见机而行。

老冯于11月中旬，带着我代拟的报告，携张德乘便车到广州，住食舅母家，探亲访友，查询内部落实干部政策的情况。之后，才到韶关住食玉英家。继续探亲访友，并拜见张廷槐、陈尔恭等老首长。

前任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向管组织的副书记郑群介绍了我夫妻俩的情况。然后，冯于12月15日找到郑，面述后呈上报告。郑即批示：“此件反映情况如属实，冯汉珍同志可以复职，可以恢复工作，请地区组办与连县组办联系，尽快解决。”组办，是当时组织办公室的简称，下同。这是过了几天后，地区组办李克学科长主动给老冯看的。

地区组办即写信并附郑群副书记批示，寄给连县组办，责令研究解决。连县组办接函后，竟敢退回，写道：“此问题牵涉面广，请地区研究解决。”所谓“牵涉面广”，是连县

于1966年9月，“四清”与“文革”交叉期间，听说先后处理了约八百名干部职工回家，或辞职或勒令辞职，或处分后辞职，或开除，或清洗，不一而足。

地区组办取得郑群副书记同意及老冯赞成，于1973年1月2日，写了一信给老冯赴连县。全文如下：“连县革委会组织办公室：关于冯汉珍同志的问题，本人要求去连县向组织面谈，请接洽。”

老冯到连县后，被安排住招待所，发给饭菜票，供住供食，就是不予复职和安排工作。住了一段时间，不得不返回韶关，住食玉英家。

在老冯恳切请求下，地区组织办向连县组织办调来档案审查。审查后，于1973年7月10日致函连县，认为应予复职，并恢复工作。

然而，连县竟然置之不理。

1973年7月22日，韶关地委组织部叫老冯返连县施加压力，写了这样的函件：“连县组织部：兹介绍你县辞职干部冯汉珍同志返你部联系复职问题。关于冯同志的复职，请按我部1973年7月10日给你部复信办理。”

老冯到连县后，被安排住招待所，只给饭吃，不给复职和安排工作。

一直拖到11月15日，老冯晋见县委书记张建勋，适逢组织部部长谭力行在座。张对谭说：“老谭，安排冯汉珍同志到清江公社工作，马上开行政介绍信。”这才把久拖不决的复职问题解决了！

翌日，老冯到清江公社报到。上午到，下午就请求下乡工作，获得黄文华书记的表扬。

7天后，黄书记批准老冯到连县办理迁移户口问题。县委组织部只开出迁老冯一人户口的证明。老冯找到县委副书记赵功才，请求按政策办事，把3个仍在读书的女儿户口一起迁出来。赵作了“同意”的批示，县委组织部才加以执行。

2、八载工资总结算

我的复职归队问题，就更艰难曲折了。

我一直按兵不动至1973年8月底，老冯住进连县招待所等候安排复职，我随即决定送瑶、玫复学；之后，才带着写好的报告：一是申诉书；二是胡明报复打击材料，并携张毅外甥乘岭下大队中型拖拉机先到广州，拜见了李祥麟、林名勋、马甫老首长，分别给予两个材料，请予帮扶解决；然后，到韶关住食玉妹家，见机而行事。

此前，岭下大队党支书姚良忠获得县委保送华南师范学院当“工农兵大学生”，我应其所请，写了一信托呈林名勋书记。信中除提及我拟进行申诉外，还侧重介绍了良忠的表现情况，请予关照培养。后来，良忠来信说，获得了林书记热情接待，挽留共进晚餐，详询我回家后的情况，鼓励提出申诉，转告此次就不复信了。

我到韶关后，访谈老同事老朋友，掌握了有关情况，才拜见张廷槐老首长。他表示会将我写的两个材料转给郑群副书记，叫我先找地委组织部面谈，并送两个材料。我照办了。接着，我拜见郑群副书记，并呈两个材料。

郑副书记既热情又坦率，主动用客家话与我交谈。他说：“你的历史情况和一贯表现，我很清楚，应该复职工作，我可以签字，但没有用。我批了你爱人复职，一直拖到现在还住连县招待所，没有解决问题。你曾任张根生秘书，他现任省委副书记，你去找他。他批示了，我们就压下去，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表示遵命去办。他又说：“还有一个情况，你要向张根生汇报，不知李海涛书记那里有无阻力？要他加以解决。”李海涛书记是地委第一把手，曾坐镇主持连县“四清”工作。我告辞，郑副书记主动与我握手，说：“再见！”

我又拜见了张廷槐老首长，转告郑的谈话。他认为，应该这样办，并嘱咐不要去连县了，把材料寄去就行了。我表态照办。

9月底，我到了广州，住食良兴哥家。晚上，先去拜见李祥麟老首长。告知郑群的谈话，了解张根生住所。他告诉我，已向张谈了我的问题，张说：“应该复职。”这增加了我的信心。

翌日，拜见林名勋老首长。他详告与张根生的谈话情况。林问：“还记得姚良宗吗？”答：“印象很深。他情况怎样？”“被胡明清洗出革命队伍了。”“这不行，应该复职。”

林老首长叮嘱说：“你去见他，带三个材料去。一是申诉书；二是胡明打击报复；三是写一封信，什么都不说，只说请求落实无产阶级给出路政策，安排工作。由他考虑选择用哪

个材料批示。千万不要写老首长，也不要写问候全家好，用公事公办口气。”我表态照办不误。

我询问姚良忠的情况。林书记回答说：“他来过两次。一次是交你的介绍信；另一次是十多天前，恰逢我要传达落实干部政策，我叫他去听，便于转告你。他告诉你没有？”

“写信告诉我了。谢谢老首长关怀帮助！”

林书记留我吃午饭。饭后，互相握手告别。

我去学生宿舍找到姚良忠，互相交谈了近况，我就告别走了。

第三天，我在张根生老首长住家附近踟躅，想利用他午睡后上班前这段时间，拦车见他。

我看见一辆“红旗”牌小车在他家门口停下。我急步走到车边。从小楼房出来的是杜清岩同志，即张老首长夫人。我叫了一声“杜书记”。当年，她任韶关市委副书记。她站住，问：“你是谁？”“我是从韶关来的，叫姚良宗。”

“姚良宗，姚良宗”，她自言自语；突然，伸出手，与我握了一下，说：“我想起来了，你原来是老张的秘书。他不在家。”“我今晚来拜见他行不行？”“不行，他不回来。你有事找他吗？”“是，关于我复职的事。”“那好，你去青年大厦七楼找他，他主持知青工作会议。你知道去吗？”“知道，谢谢您了！”她又与我握手，钻入车内，坐着，摇着手说：“再见！”车开走了。

我在青年大厦七楼逐间房寻找。走到中间那间房门口，听见熟悉的声音说：“等一下。”正在讲话的张老首长走到我

身边，问：“老姚，是找我吗？”边说边与我握手。“是，张政委！”“你的问题，林名勋、李祥麟告诉我了。你带材料来了吗？”我把三个材料双手呈上。他边接边说：“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我答：“李海涛书记在连县搞‘四清’，不知道有无阻力？”“好，还有什么要说？”“没有了。”“好，我会处理。你要耐心等待一下。”我与他握手告辞，走了。

我从大厦出来，看了一下表，还有充裕时间，便乘车到省革委接待站上访。轮到我进去，看见接待我的人穿着军服，四个口袋，是军官。我把被处理的情况简要地汇报了，问他：“能复职吗？”“恐怕很困难。因为，要保卫‘四清’成果，你又是摘帽右派。”“摘帽右派还是右派吗？”“是这样。”“请问：我被划右派前是共产党员，划右派后，被开除了党籍。按照你的逻辑，应该是‘被开除了党籍的共产党员’，对吗？”他愕然，吱唔着，面红耳赤，哑然无语。我说声“再见”，就走了。

我看到“告示”写着：“明天由师级领导接见来访群众”。

第二天，我一早等候，是第一个接见。我首先提问：“摘帽右派是否还是右派？”他用好奇的眼光瞧着我，显示出昨晚已听过汇报了；然后，不慌不忙地回答：“摘帽右派不是右派，开除了党籍的党员，就不是党员了。”我树起大拇指，说：“回答得好！我还是第一次听见。请你向上反映这个真知灼见！”接着，我简要地汇报了我被清洗出队的情况，问：“能复职吗？”答：“如反映情况属实，应该复职。”

“不用保卫‘四清’成果吗？”“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党的政策，错了就要纠正。”于是，我呈上两个材料，请帮助解决。他收下了材料，说：“我们会研究处理。”我起身告辞，满意地走了。

我回到良兴哥家里，写了一篇题为《论摘帽右派与保卫“四清”成果》的文章，署名为“向阳”，分别寄给《人民日报》和党中央办公厅，希望上层能听到不同声音，制订出正确的方针政策。但《人民日报》一直没有刊登，中央办公厅究竟如何处理，则不得而知了。

当晚，在良兴哥引领下，我到省林业厅拜见周明老首长。我先告良兴哥，不要问人，自己寻找。在大院内走了一会儿，良兴哥害怕，怕被人怀疑干坏事而发生意外。我鼓励他不要怕，不会出问题的。走到一个角落，看见有几座小楼房。我说：“周伯就住在这里了。”靠近小楼房时，有个青年出来，我问：“周明同志在家吗？”他盘问我怎样认识周明的，我以实相告。他听后说：“周明是我爸，我带你去。”

22年没有相见了，像张根生老首长那样，周伯马上就认出我来，显得非常高兴！我俩打破了上下级关系，互诉衷肠，真诚坦率。周伯夫人说：“幸得群众认为老周已是虾仔，不是大鲢鱼，没有怎样揪斗他，乐得安静。”周伯被摘掉右派帽子后，被安排当省林业厅副厅长。畅谈了一晚，在良兴哥催促下，我们互相握手告别。

翌日，我拜见了林奕龙老首长后，第三天就回老家去了。

我遵照张根生老首长所嘱，耐心地等待着复职归队的消息。直到1974年8月中旬，搞完夏收夏种后，仍音讯杳然，只好请假外出探寻缘故了。

我先到韶关，住食玉妹家。

我直接找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张中林，探询复职的事。他说：“连县有阻力，你还要耐心等待。”

我获悉原连县县委书记张建勋，调任副专员不久，已不用管我复职的事，可能会讲实话。果然，他实话实说：“我调离连县前，张中林在县委常委会议上，传达了张根生的批示，一致通过你复职，很快会通知你了。”我非常高兴！

我回头找到张中林，笑着说：“你不讲老实话，听说你亲自到连县传达张根生批示，县委常委已通过我复职了。是不是？”

他笑着问：“是张建勋告诉你的吧？”我笑而不答。他说：“是有这回事。因不知连县下面办事效率怎样，所以，叫你耐心等待。”

我又拜见郑群副书记。两人都用客家话交谈，显得真诚亲切。他主动告诉我说：“张根生亲自来了地委，当面问李海涛：‘姚良宗是怎样回家的？’李答：‘不知道。’说明不会有阻力了。你复职问题，会很快解决。”我感谢他的关怀和帮助，不说连县县委常委已通过的事。因为，我肯定他早已知道，他不说，我就不便说了。

说来真凑巧。翌日，我在街上碰见专区科协副主任李木盛，是干组织工作的老手。他同我握手，说：“在连县哪个部

门工作？”我答：“你怎样知道？”“前十多天，我去找张中林，看见了张根生批示，还盖了省委组织部大印，故肯定你已复职了。”“张根生怎样批的？”“就是一句话：‘请予考虑安排工作。’在你毛笔写的信纸上批的。”“谢谢你告知真实情况！我已找过张中林了，说连县县委常委已通过，但还未通知我复职的事。”“那是早晚的事了，耐心等一下吧！”

我呈送张根生老首长的三份材料，是用不同的笔写的：“申诉书”用复写笔；“胡明报复打击”，是用钢笔；“请给生活出路”，则用毛笔，仅一页纸。我从此推测，张老首长是考虑舍难从易，力争尽快复职，避免借口拖延，夜长梦多，故叫省委组织部加盖大印，真是用心良苦了，使我十分感激！

接着，我拜见张廷槐老首长，告知复职的实情后，就专程到连县清江公社，与家人团聚。住了一个多月，回到平远老家，还未接到复职通知。这是工作效率问题呢？还是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我不敢随意猜测，更不敢妄加评论了。

一直拖到11月中旬，才由平远县大柘公社送来“连组监字（1974）036号”文件：《关于姚良宗收回当干部的决定》，还不忘揭批我的“错误”：“原我县农业办公室干部姚良宗同志，因忽视世界观的改造，犯过错误，受过处分。1966年文化革命初期被清洗回家生产。”竟然把“清洗回家生产”的责任，归咎于我“因忽视世界观的改造，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言下之意是与组织无关，与领导无关，与别人无关，完全是自作自受！这究竟是什么逻辑？这究竟是什么道理？这究竟是什么政策？真是匪夷所思！

1976年6月10日，连县县委组织部发出“连组监字（1976）53号”文件：《关于补发姚良宗同志工资问题的通知》，写道：“现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经县委研究决定”，“从1966年10月至1974年10月共97个月的工资，予以补发。除扣除离职回家的劳动收入外（按每月定勤26天乘当地当年的劳动日值），共实补工资3242.19元。”

由此推知，如非“上级指示”，连县未必会给我复职，更不会补发97个月的工资。这已被上述事实所证明。正因如此，所以，《通知》对补发我97个月工资的真正原因——其实是“清洗回家生产”搞错了，应予平反补偿了，但却讳莫如深。

与此同时，连县县委组织部发出“连组监字（1976）54号”文件，关于冯汉珍同志“从1966年10月至1973年10月共84个月的工资，予以补发。除扣除退职回家的劳动收入（按每月定勤24天乘当地当年的劳动日值），1973年回来复职在大楼招待所的住宿、伙食费和已领的退职金外，共实补工资2633.54元。”同样不提及补发84个月工资的真正原因。

补发工资后，我拜见原清远源潭土改根子、现任连县县委副书记潘坤，请求帮忙调出清江公社，另行安排工作。潘说：“你复职前，我见到张根生书记。他问：‘姚良宗复职了没有？’我答：‘没有。’他马上沉下脸，说：‘我看着姚良宗成长的，什么问题也没有！你回去传达，立即给他复职！’我在县委常委会议上传达了，起到很大促进作用。你在清江还未坐热板凳，我不便帮你调出来重新安排工作。”可

见，我复职归队的阻力有多么大啊！

3、违俗归真的异音

我破天荒第一次听见违俗归真的异音，是出自一位老领导、老共产党员之口，这个人就是1950年冬土改认识并提拔我，三年后任粤北区党委办公室主任、我顶头上司的王士英老首长。他1954年2月，调去包头钢铁厂工作，1965年调回韶关专区冶金局任局长，受到“文革”冲击，下放西联地委畜牧场劳动，1974年调任韶关市委副书记。

1974年8月中旬，我拜见郑群副书记的当天下午，前往拜见王士英老首长。

他一开门，20年没有见面了，马上就认出我来，用自信肯定的语气问：“老姚，你现在哪个县当部长，还是当书记？”我“唉”了一声，说：“连饭都没得吃了，是从家乡出来搞复职呢！”“哎呀！是怎么一回事？请坐着说。”我简要地介绍了别后经历，就有两人进来了，我马上起身告辞。他送到门口，说：“老姚，明天上午9时，我在家等你。”说罢，同我握手告别。

我翌日应约而至。他泡茶斟茶给我，迫不及待地说：“老姚，我昨夜睡不着觉，一直捱到天亮。老是想，你，还有陈廷坤、彭清藻等人，都被划为右派。我知道，你们都是忠心耿耿为党工作，连匪寇横行，随时有生命危险都不怕的人，怎么可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呢？老是想不通！想来想去，最后想出一个原因：你们这批热血青年，有文化，有政治水平，有能力，有干劲，就是缺些做人处事的经

验，难免与领导发生工作意见分歧，产生矛盾，伤了感情，反右一来，就乘机划你们为右派了。你看，我这种想法对不对？”我答：“十之八九，不会有错。”“唉，我们党的干部政策出了大问题，打击了一大片啊！你怎样去搞复职呢？搞得怎样了？”

我简要地汇报了上述搞复职的情况后，说：“我准备明天就去连县清江与家人团聚。然后，回老家等待复职通知了。”

“好，祝你尽快复职成功！”

“谢谢！请您保重玉体，并代问候夫人钟天真同志好！”就起身握手告辞了。

4、值得深思的遭遇

1974年12月上旬，我在批林批孔、批“请隐士、举逸民”声中，整理行装，准备赴连县复职。因而把锅头、水缸、干柴等放在大房楼上，上了锁，以备万一被处理回家之用。然后，带阿妈一起到韶关玉妹家，独自赴连县县委组织部报到。

该部在我行政介绍信“政治面目”一栏，写着：“摘帽右派”。我对此已是司空见惯，不以为意。该介绍信写明：“安排公社办公室工作”。

我在12月13日到达清江公社。这里，正开展以批林整风为纲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我投身于其中。

当时，我感赋两首题为《恢复工作》七绝之一记其事：“八载从农此日休，清江复职乐悠悠。雕虫小技重新试，吃透

精神赶大流。”并借《咏枣林》抒怀：“悬崖峭壁乐居巅，果实呈完孕异年；骨损筋伤浑不怪，枝桠挺拔耀苍天！”

1975年5月，公社机关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在大鸣大放大字报中，有人鸣放了一张大字报，大意说，摘帽右派姚良安安排在公社办公室工作，“清江社会主义江山难保”。待大女儿通知我前往礼堂观看时，已被其他大字报覆盖。过了一会儿，只听见县工作队指导员刘尚忠在干部大会上说：“组织上用人，是经过调查研究的，应该相信组织。”公社书记廖承和则干脆说：“不准鸣放组织用人问题，故用大字报覆盖了！”

我顾全大局，为了缓和领导与某些人之间的矛盾，经过协商，取得共识，我暂到公社所在地——唐家大队参加运动，有紧急写作任务，就随时回公社。

我到唐家大队不久，黄滔工作组长决定突击查抄上角坪生产队队长私砍收藏的杉木，出于好心，叫我不要参加行动，免被抓住“摘帽右派”把柄，发生意外事故。

然而，我无私无畏，心胸坦荡，为了群众的实际利益，甘冒风险。1975年6月，我与唐家大队干部秘密商定，把公社铲除社员开荒地作物的指示，即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改为按面积补给工本费，收入归集体统一分配，受到广大干群的欢迎，成为全公社唯一没有铲除农作物的大队，维护了集体的群众切身利益。

也许正是“摘帽地主家属”和“摘帽右派”的劣势，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家乡借人住的大房楼上所有的东

西，两千多斤干柴和炊具等杂物，被借居人破锁扫光，连门杠、木窗门、楼梯等也搬走，只交回空壳房。而借居人与我还有一定血缘亲戚关系呢！

（十六）风雨过后又晴天

邓小平继1973年出任副总理、军委总参谋长之后，又于1975年选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从整顿铁路交通入手，进而开展对军队、地方、工业、农业、商业、文艺、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各方面的整顿。每前进一步，都要打破“四人帮”的阻挠破坏。如在“批林批孔”中，江青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在“抓革命、促生产”中，张春桥就组织编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强调要对商品制度、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接着，张春桥又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姚文元马上应和：“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江青则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大敌”。他们把矛头指向周总理、邓副总理等老同志。张春桥更进一步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提出所谓“全面专政”的理论。但在毛泽东主席反复强调要安定、要搞马克思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的批评下，才使“四人帮”稍有收敛，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因此，在1975年9月下旬，我感赋题为《整顿复兴》七绝

一首：“俄晴乍雨转秋天，整顿健全在动员。百业复兴民警觉，国防巩固美于前。”诗中“俄晴乍雨”和“民警觉”，就是对上述政治形势的概括。

这年11月初，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主席对该校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问题的批示，从此就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随后，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运动就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地、各部门，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不幸病逝。1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首都上百万人伫立在十里长街，为周总理灵车送行。接着，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于2月中旬，全国各地就公开陆续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了。

连县清江公社对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只是停留在传达中央（1976）2号、（1975）23、26号文件和学习讨论上，少见于行动，我没有留下多少印象。

我印象较深的，是从报纸和小道消息传来3月下旬至4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进行悼念周总理并声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从而引发了所谓“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其次，就是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的先后逝世。尤其是毛主席的逝世，清江公社开了三级干部会举行追悼，场内哭声一片。我都分别写了悼念诗，收入《诗词拾零录》，后又选入《诗词拾微集》。

而使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10月中旬，华国锋任中共

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粉碎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我先后写了《满江红·粉碎“四人帮”》和《欢呼“文革”结束》，借以抒怀。我殷切期盼着：“振中华，上下一条心，坚如铁”和“莠草除清防再长，安心建设发奇光”！

十年“文化大革命”到此结束，中国历史开始谱写新的篇章。

十、平反改正

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并相继下发其三个罪恶材料之后，在全国各地陆续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和罪恶历史，并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连县也坚持这样做了。

但由于中央华国锋等领导受“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思想束缚和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因此，直到翌年8月党的十一大还未能完成从理论和党的指导思想方针上根本拨乱反正的任务，只是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

在邓小平多次强调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恢复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最根本的传统作风的推动下；在胡耀邦率领中央组织部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新局面的影响下；在全国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声势下，思想、政治、社会等历史条件臻于成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隆重召开。会前，又召开了中央

工作会议，作了充分准备。

三中全会在坚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基础上，坚决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不合时宜的口号。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前的“左”倾错误，从而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全会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战略决策。原则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两个文件；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他们对党对人民所作的贡献；着重提出了健全党规党法和民主集中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任务。三中全会增选了陈云为党中央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些标志着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使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里程碑。

（一）连县县委落实办通知

连县县委于1978年12月2日召开了直属机关落实政策平反昭雪大会，为36位同志进行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

同年12月27日，县委又召开了直属机关落实政策大会，为16位同志公开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并为被迫害致死的两位

同志平反昭雪。详见《连县通讯》第42期，发至生产队，1978年12月28日印发。

上述公开平反的16位同志中，包含我一个。

接着，连县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又发出“连落办字（1978）155号”《关于姚良宗同志的平反通知》，全文如下：“姚良宗同志，原是县委农村部干事。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于1966年间被定为‘三反分子’，经查实属错案。经县委于1978年12月23日讨论决定，给予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强加在姚同志的‘三反分子’帽子应予去掉；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不实材料予以清理、销毁；并通知由此而受株连的家属、子女所在单位，以清除影响。1978年12月27日。”

我接阅此“平反通知”时，正住连县干部招待所，为将召开的县委三级干部会起草工作报告。

（二）韶关地委落实办通知

1979年3月3日，韶关地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发出“粤韶（地办）改字第1号”，题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通知书》，全文如下：“姚良宗同志：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经复查你在1958年6月25日被划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现决定予以改正。希望你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

此外，地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分别给连县县委农村工作

部、连县林业局各一份《通知》，其中，写道：“给姚良宗同志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19级，恢复党籍，党龄从预备期满一年计起，建议适当安排领导职务。”

当时，我在县委重点——东陂大江大队蹲点，接阅此“改正通知”后，感赋一首七律《再赏桃花》：“当年曾赋赏桃诗，慎独浮沉信有时。百萼凋零红特艳，千枝损害绿犹持。一朝乍起风飘雪，十夕连绵雨拂澌。此日重来葩灿烂，前程美景竞丰姿！”

（三）知遇图报愿为牛

韶关地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为什么要分别发《通知》给连县县委农村工作部和连县林业局呢？这里，要加以必要说明。

此前，1978年8月下旬，韶关地委常委、副专员兼连县县委书记张乐民，第四次来清江公社检查工作。像前三次一样，听取公社党委工作汇报后的当晚，就找我去他招待房单独谈话。从工作谈到生活，从现在谈到过去熟人熟事。因为1955、56年，他先后任粤北行署公安处副处长，韶关专署公安处处长，有时会来找张根生、林名勋书记汇报请示工作，从而同我认识并聊天，互相有一定了解。这就有了许多话题可谈，并不拘束。

他又一次提出要我去县委农村部工作，说：“老姚，咱俩是老相识了，彼此有一定了解，你就帮帮我，到农村部去工

作吧！”

我坦诚地说：“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当丞相，使天下三足鼎立，成为古今美谈。当然，我不是诸葛亮，您亦非刘备，只是比喻而已。您是第四次来清江找我谈心，第三次提出要我去工作了，使我内心十分感动感激。我之所以不愿到农村部工作，主要怕冒政治风险，尤其怕牵累您。实践证明，谁起用我，谁就倒霉，张廷槐书记就是如此。他在‘四清’和‘文革’中，被指责重用摘帽右派，是犯了政治性错误！这点，请您慎重考虑。”

他恍然大悟，说：“啊，原来如此！”接着，冷静而坚定地说：“但我不怕倒霉，相信也不会倒霉！你就大胆来农村部工作吧！”

我说：“县林业局已决定调老冯去县林科所工作，就请您把我调去那里，把编制放去那里，再由农村部借用。您看，这样行不行？”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样做的好处，一是不会树大招风，惹人眼红嫉妒，避免牵累您；二是运动来了，我可回林科所避风去，缓和一下矛盾；三是进退两便，两全其美，既可工作于农村部，又可回林科所工作，狡兔三窟嘛！”

他听了，笑逐颜开，表示同意。

就这样，我被调去林科所工作仅三天，就由县林业局借用，整理写作《连县林业发展概况》，于9月下旬完成交卷后，又被县委农村部借用。

为此，韶关地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发通知，就需要分发县委农村部和县林业局了。

（四）“先满足你权小职低要求”

1979年3月中旬，县委农村部通知我从东陂回去，张乐民书记与我作了一次长谈。

他询问我蹲点工作、生活情况后，说：“现在，你文革‘三反’的事平了反，你1958年错划右派的事也改正了，应该从林科所调出来工作了。我考虑，有三个单位适合你工作：一是县委办，二是县委农村部，三是农办。我意，你到县委办去工作。看你意见怎样？”

我想了一下，说：“还是去农村部工作好。”

“为什么？”

“县委办上面正副书记多，难以处理平衡，权力也过大；农办的正副主任多，权力又大，处理问题复杂；农村部权力较小，业务权较大，我较熟悉，也可就近帮您一点忙。”

“到农村部担任什么职务好呢？”

“农村部已有一正一副，经管组只有一个副组长，就由我担任组长吧！”

“那不行，比你以前的职级太低了，起码要当个副部长。”

“我多年没有担任领导工作了，还是从低做起，看能否胜任？”

张书记“哈哈”大笑起来。说：“我代表地委常委找落实政策的人谈话，都要求权力大，职位高，没有你这样要求权力小，职位低的。好吧，就先满足你权小职低要求，当个组长吧！”

他又问：“需要调整什么人？”

我说：“副组长林超，原任农办副主任，虽然今昔同属副科级，但职权差距较大，不利于调动工作积极性，建议是否升任县委办副主任，以发挥其笔杆子专长？”

“可以考虑。还需要调整谁？”

“不用调整了，暂照旧不动吧！”

于是，我当上了连县县委农村工作部经营管理组组长。

不久，冯汉珍从清水县林科所被调至县府招待所任副所长。

（五）急令回部主持工作

1979年4月中旬，我与老张组织共蹲的点——大江八队干部全面检查水稻生长情况，便于针对逐块长势，采取科学追肥或科学排灌，力争均衡增产。我们发现一块田青绿异常，怀疑播插了下造种子。会计回去一查种子，果然如此。马上犁掉改播，从而挽回了一些损失，并在干群中建立了工作威信，使工作开展很顺利。

我时而在八队蹲点，时而回农村部工作，两头兼顾，以点带面。

当年7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张乐民书记突然派车到八队，司机要我马上收拾行李回县。我问：“究竟出了什么事，这样紧急回去？”司机答：“不知道。”

我回到县委，放下行李，就马上晋见张乐民书记。

张书记焦急地说：“连县夏收预分工作不妙，受到地委点名通报批评，决定你回来主持农村部工作。”

我忙说：“上有县委常委兼部长和副部长，我怎么能主持工作呢？”

“县委常委已讨论决定了，宋伙元驻管东陂，吴记成驻管附城，你就可大胆放手主持农村部工作了。你看，怎样扭转被动局面？”

我考虑了一下，说：“危难受命，责无旁贷。请您授给我三权：一是用人权。把农村部外调的人全部尽快调回来。二是批评权。主要对行动迟缓的大公社，点名批评。三是工作权。选择附城公社一个大队为预分试点，我亲自率人进驻工作，取得经验，在《连县通讯》发表，以指导全县。同时，要求各公社选一个大队为试点，以点带面。还有，农村部除派人经常检查督促大公社工作外，又组织全县定期检查评比，即：每个公社定两个点，试点和另一个临时指定，进行检查评比，以鼓励先进，敦促后进。您看，这样工作行不行？”

张书记高兴地说：“行，这样行。但点名批评要搞准，点名批评的公社不要多。”

“对，遵照执行。我是用县委名义发通报批评的，肯定会呈您批准后发出。我据以上精神，先用县委名义发一个电话

通知给各公社，行不行？”

“行，先打个招呼吧！”

于是，我分清主次缓急，有序地组织实施。

仅过了七八天时间，农村部搞起夏收预分试点，开展重点检查，并以县委名义，发通报批评了保安等几个大公社。

保安公社党委书记给我打电话，说批评错了。我说：“我马上派人去复查核实。如批评错了，立即通报纠正。”后来呢？派去复查的人还未回来，他又来电话作检讨，汇报如何落实县委通知精神了。

就是这样，各公社很快行动起来，全面开展了夏收预分工作。不到半个月时间，地委发通报表扬了连县，并在《韶关通讯》发表了连县夏收预分试点文章，而且此后连县试点的经验介绍，几乎篇篇都在《韶关通讯》上转载了。张乐民书记看了十分高兴！

（六）评分调资皆大欢喜

1980年1月底，我接到中共连县委员会组织部“连组干（80）008号”文件，写道：“接中共韶关地委‘韶地组干字（1979）40号、425号、（1980）10号’文件通知：‘……姚良宗同志任中共连县委员会农村工作部副部长；……1980年1月25日。’”

同年2月，接连县直属机关党委通知，农村部党支部改选。我建议不提候选人，放手给党员自由投票。选举结果，并

报直属党委批准，我任党支书，副部长吴记成、会计辅导组副组长黎志明任支委。

约3月，县委奉上级指示，决定全县干部职工调整工资。按规定，在各单位总人数中，七成可提资，三成不动。农村部不动的，计有六七人之多，相当于多年未提工资的人数，增加了工作难度。如搞不好，势必影响团结和工作积极性，局面严峻。

怎么办？我据实向张乐民书记汇报，请求增拨县机动调资指标，他答应给3个；又逢县委指令我部2名青年干部调至县法院工作；就剩下2名没有调资指标了。

在支委会上，我鉴于两名支委工资偏低，而前次又已调资，为了减轻部内竞争压力，并增强向县机动指标争取名额的竞争力，我动员他俩带头自报退让，保证以后设法给予调资，从而起到了示范教育作用。

在调资方法上，摒除领导一槌定音，采用把德才效的调资标准具体化，逐项打分，共计100分，自报公议，民主初评，领导掌握5分机动权，用以照顾多年未调资的人，从而做到了民主集中相结合，公开公平，有利于减少矛盾，加强团结共事。同时，这种自我评价、民主公议的评分调资方法，也促使人人扬长抑短，共同取得进步。在全县讨论使用机动调资指标时，我又以一个副部长、一个副组长未调资的条件，争取到2个机动指标。这样一来，农村部人人都提了一级工资，皆大欢喜。

（七）处理分队的方针

1955年连县农业合作化以来，在体制上，经历了从初级到高级又到公社化越“公”越好的变动；在规模上，经历了从小到大、又从大到更大的越“大”越好的折腾；在经营管理上，经历了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四人帮”破坏，从而搞乱搞杂了农村干群的思想。

粉碎“四人帮”，思想大解放，1976年10月以后，各地都或多或少地掀起了分队热潮。群众要分，上面要并，分队工作成效甚微。

1979年7月，我主持农村部工作后，派出专门调查组，花了20多天，分别山上山下的不同情况，进行深入调研。调查组写出调研报告后，我又主持部内全体工作会议，进行汇报、讨论、研究。在此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我综合写出专题报告，题为《关于分队问题的处理意见》呈县委审处。《意见》分三大部分：一是分队的基本情况；二是分队的主要原因；三是处理分队的方针。

报告认为，分队规模虽然变小了，但生产队的社会主义性质始终不变，仍然生产资料归集体统一所有与支配，生产统一归集体经营，劳力归集体统一调配，收益归集体统一分配，社员继续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因此，提出处理分队的十六字方针，即：“承认事实，坚持方向，解决问题，发展生产”。

所谓“承认事实”，就是承认分队的客观现实，承认并

尊重群众分队的意愿，不要花气力搞并队了，要承认过去大搞并队而收效甚微的客观现实。

所谓“坚持方向”，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即：坚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并支配；坚持各业生产归集体经营；坚持劳力归集体调配；坚持收益归集体分配，坚持社员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所谓“解决问题”，就是帮助解决分队后的一切遗留问题，如生产资料和公共积累要合理分配；公购粮任务和银行借贷等所有债务要合理分担；使之做到干手净脚，不留矛盾问题，避免发生纠纷。

所谓“发展生产”，就是彻底放下以上包袱，放手大力发展集体生产。

张乐民书记审阅报告后，对我说：“报告是马列主义的，是正确的。但地委马一品书记坚持要并队，而且要各县成立并队办公室专门抓。我不能唱对台戏。你看怎么办？”

我说：“我理解您的苦衷，县并队办公室要成立，建议宋伙元常委、农村部部长兼主任。他要我多少人，就给多少人，剩下的人归我管，抓好经营管理。请示这样行不行？”

“好，就这样定。”张书记作出决定。

不久，韶关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陈遐瓚带人来连县视察工作。我除向他汇报全面工作外，还谈及处理分队的问题。他很感兴趣，要处理分队的调查报告。他阅后说：“让我带回去刊登《韶关通讯》。”但一直没见发表。他又接着对我说：“我很想调你来地委农村部工作，但张乐民专员一句

话：‘你是不是想挖我的墙脚！’就调不成了。”我只是笑了笑，什么也没有说。

（八）全面推行劳力分口粮改革

我主持农村部工作后，在执行上级不准包产到组到户的前提下，着重抓好三条：一是实行包工到组到人，定额计分，严禁打大捞、底分死记；二是建立健全“三定”（定勤、定工分、定肥料）制度，兑现奖罚，以调节公私关系，用两条腿走路；三是积极全面推行劳力口粮分配改革，提高集体出勤率。集中到一点，就是为了巩固壮大发展集体经济，引导社员走社会主义道路。

从1955年农业合作化至1980年以来，一贯实行基本口粮分配制度，劳力不参加集体生产，也一样可吃基本口粮，显得很不合理，社员意见很多，严重影响了集体出勤率，不利于巩固壮大发展集体经济。因此，连县山上山下都有生产队试行劳力口粮分配改革的实践，有的取消劳力基本口粮，按劳动工分分粮；有的按两者比例分配，对半开，或三七开，或二八开，等等，不一而足，很受广大社员欢迎。

我发现此情况后，在农村部干部大会上，提出要积极全面推行。只有二人赞成，属于少数派。经过激烈争论，大家互相了解分歧所在后，我不作结论，决定除个别留家应付日常工作外，全部分头下去实地调研四五天，再回来讨论决定。结果，这次未经争论，就一致同意了积极全面推行。

于是，我用县委名义，起草了全面推行劳力分口粮制度改革 的指示，呈县委副书记兼县长谭力行审批。他阅后退回，说等候张乐民书记开会回来决定。

张书记回来后，我先作详细汇报，然后呈指示草稿。他阅后，慎重地发问：“有没有把握？”

我答：“这是群众通过实践发明创造的，有利无弊，完全有利于巩固发展集体经济，符合过去和现在中央精神，不会有错。”

张书记就签发了积极全面推行劳力分口粮制度改革的县委文件，并在《连县通讯》上刊登，发至生产队。

《南方日报》驻韶关记者站发现后，经过实地调研，写成报导，在《南方日报》上发表。接着，《人民日报》也全文刊登。

不久，河南省委农村部组织了三人来连县考察。我正在县委党校主持年终分配办班，张乐民书记让出专车，要我陪同他们下乡调研了几天。他们很感兴趣，表示回去后仿行。

（九）李显扬问题获解决

1980年11月，县委召开公社书记和部委办领导联席会议。

会议期间，我去楼下空地一间厕所小便。原农村部会计辅导室副组长、被清洗出党出队的所谓“老牌特务”李显扬，拦路问我：“姚部长，我的问题落实得怎样了？”我

说：“老李，你何必这样守株待兔，拦路‘抓’我呢？你又何必先叫女婿假冒上级来‘训’我呢？这是不当行为！你又不是不认识我，光明正大来农村部找我不是很好吗？你的问题，过几天，我空闲一些，会去县落实办调出你的档案来看。半个月后，你来农村部找我，就有结果了。你有什么话要当面对我说吗？”“姚部长，对不起，我被落实办的人骂怕了，所以才那样做。”“不对，县落实办的人说，是你态度一直很不好，一见就吵，伤了感情，才懒得理你。请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心平气和地诉说，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说对吗？”

“对对，请你原谅！”“不是请我原谅。我是过来人，理解你的心情。是你应该争取主动，请求县落实办的同志原谅。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呢？”“没有了。半个月后，我来农村部找你。”“这就对了。再见！”我伸手与他握了一下。

我调出李显扬的档案后，花了一个上午，认真仔细地看完李显扬的全部档案材料。其实，问题很简单。有一个人交代了自己于1947年参加“乌军”，并揭发李显扬也参加了，但两人都没有反革命活动。李借口自己揭发了那人而被反咬，一直拒不承认，又提不出其他证明人。

我认为，这错误性质是属于对党曾有敌意，隐瞒历史，态度恶劣。但“文革”期间，采用清洗出党、清洗出队的处理偏重，我建议改为给予开除党籍，行政21级降至24级，饬令退职处理。

我同县落实办领导谈了此看法，他表示同意，要我写处理意见并签字，我照办了。之后，我同李显扬面谈了。但他坚

持没有参加“乌军”，不应这样处理。我劝说无效，叫他直接找县落实办的人诉说理由并请复议。

直到1981年5月，我已调韶关师专工作。李显扬来校找我，说同意我提的方案解决，要我签字。我说：“我早已签字了，你直接找县落实办就行了。不过，你要端正态度，作深刻检讨，取得县落实办的同志谅解。”

后来，他的问题已按我提的方案解决了。

（十）林名勋书记获平反

1979年10月底，我接到林名勋书记来信，写道：“我已彻底解决问题，堪以告慰。”

所谓“问题”，就是1958年1月16日至3月9日，韶关地委扩大会议定林为地方主义头子，给予留党察看两年，行政9级降为13级处理。现给予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后调至省人大常委会任副秘书长。

11月3日，我感慨万千，呈奉七绝三首，请予斧正，题为《祝贺“彻底解决问题”——呈林名勋老首长》。

其一：忽闻错案获新评，悲喜交加眼泪盈。荣辱浮沉如逝水，祝君康复迈征程。

其二：话别当年叶落时，秋风萧瑟发深思。是非功过谁评说，历史公平不在辞。

其三：日丽气凉枫渐红，劲松翠绿暑寒同。沧桑历尽悲欢事，挺拔英姿耀碧空！

林书记“12月10日于病中”的复信写道：“大函及赠诗三首已奉读，谢谢关怀！”“阅后感到有过奖之处，愧不敢当。信迟复了，请谅！”谦虚得很，令人敬佩！信末还提到：“问候冯同志好！”关怀备至，令人感动！

（十一）张安养恢复政治名誉

我在1980年12月奉调韶关师专后，1987年3月的一天上午，与韶关市农业局副局长付南安邂逅于韶城南门井巷，应邀随他回家。因为他诚恳地说：“有重要的事情商谈。”

付南安泡茶品尝后，感慨地说：“老姚，我背历史包袱已有40多年了，现在应是卸下包袱的时候了！”随即拿出一本《湛江文史资料》，翻开一页递给我看。是湛江军分区某领导（忘了姓名）写的文章，文内提及张安养如何援助他打游击的史实。

付南安又介绍说：“张安养就是你妹夫张幸芳的父亲，是地下老党员，打入国民党任警长、保长，暗中帮助游击队。1948年，我参加游击队。一次，在回家探亲的路上，被国民党驻军逮捕，幸得他设法保我出来，半路放我归队。他土改被批斗致死，没有了证明人，致使我被捕的问题下不了结论。这本《湛江文史资料》你拿回去，代写个报告给你妹夫往上送，请求为张安养落实政策。我也会从中作证明，一举两得，拜托你帮忙了。”我满口答应下来。

于是，我代妹夫兄弟写了请求落实张安养政策的报告，

由张幸芳分别送给曲江县委和马坝镇党委。

1988年11月9日，马坝镇党委发给乐村坪村党支部、村委会一份文件，题为《关于恢复张安养政治名誉的通知》。其中写道：

“经县委党史办的调查报告核实，乐村坪张屋村的张安养同志（已故），在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3月至1938年初，因曲江地下党组织遭破坏，党员都停止了活动。1938年8月，张安养同志恢复了党籍。1946年以后他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

“1939年春至同年冬，张安养同志由党组织派遣，任国民党曲江县马坝镇警察分驻所警长，在职期间，为我党搜集情报。1945年曲江沦陷后，他担任曲江联乡抗日自卫委员会第一大队乐村坪独立小队队长，积极参加打击日寇和剪除汉奸的斗争。1948年间，经我党组织同意，充任乐村坪伪保长，曾掩护罗玉麟（烈士）等同志活动，并协助当地游击队筹集钱粮、枪支。”

“土改时，张安养同志的成份定为贫农。1952年土改复查期间，错划为官僚地主恶霸，遭批斗致死。之后，其家庭成份才降为中农。”

“我们认为，张安养同志生前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解放前所任的伪职均是经我党同意派遣的。根据党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有错必纠的方针，经镇党委研究决定，给张安养同志恢复政治名誉，希在党员大会、村干部会、村民大会宣

布，特此通知。”

在马坝镇党委派人参加下，乐村坪党支部书记在村民大会上，宣读了镇党委《关于恢复张安养政治名誉的通知》。

